

中国四大家族

陈 伯 达



中 国 四 大 家 族

陈 伯 达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中国四大家族

陈伯达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厘米 $\frac{1}{32}$ · 印张 $4\frac{3}{8}$ · 字数 90,000

1946 年 10 月第 1 版 1955 年 10 月第 3 版

1964 年 4 月北京第 9 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1·63 定价（六）0.40 元

印数 176,001—316,000

目 录

題 記	1
一 旧中国的最后統治者	4
二 从反革命的內戰和买办起家	7
一 “一双滿是血腥的手”	7
二 追逐內戰的利潤	10
三 首先是軍火的大买办	14
四 以“民死”为目的	16
三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金融王朝	18
一 四大家族和四大銀行的結合	18
二 金融独占的地位和財富集中的速度	22
三 “法币”的性质是封建、买办、軍事的强制掠夺	29
四 金融的軍事独裁、封建搜括和买办事业的新 发展	31
五 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	37
六 加速总崩溃的速度	38
七 层出不穷的阴谋詭計	41
四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商业独占	47
一 四大家族商业独占的开端	47
二 商业投机的領头者和商业独占的組織网	49
三 买賤卖貴的野蛮掠夺	54
四 和敌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武装走私	63
五 劫收之后，心更狠了	65
六 美国貨的总买办	69

七	“只要有油水可捞，先捞了再说”	76
五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工业独占	79
一	和法西斯德国合作为主的独占活动	79
二	在吞併民族工业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迅速地 建立了暴力的独占	82
三	独占网因“惨胜”而扩大	88
四	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工业边界”	91
五	民族工业遭受毁灭的打击	94
六	腐烂的东西不能够有生命	99
六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农业独占	104
一	全国性的、最大的封建奴隶主	104
二	全国性的、最大的高利債主	111
三	几种掠夺农民的农业公司	115
四	农业經濟的衰落和殖民地化	117
七	新聞和出版及其他 的独占	119
八	四大家族的財富	123
九	四大家族的統治是中国的耻辱和灾难	128
书	后	134

題 記

本书写作的目的，是在于根据一切无可爭辯的事实，揭穿以蒋介石为首的蔣、宋、孔、陈四大家族如何窃盜我們中國這個國家為他們的私产（化公为私），如何以“國家”、“政府”等名义，无情地掠夺人民的所有（假公济私），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并为历代帝王所望尘莫及的、以吸血为生活的最大富翁。这四大家族的統治是在大地主大买办的經濟基础上形成起来的。这个統治彻头彻尾地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資产阶级服务，极端尽致地对人民进行封建买办的血腥掠夺。十九年来四大家族用“官”“商”形式，在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聞、出版事業等等各方面所独占的財产，以及他們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根据粗略計算，至少当在两百万万美元左右。但无量数的中国人民則因四大家族的掠夺，以至破家蕩產，顛沛流离，饥饿死亡，而且死无葬身之地，甚至有很多原来是中产人家也竟因此而一旦变成赤貧。凡是我們能够接触到的重要材料，已尽可能包括在本書里面。全書所分析的各問題，都可說沒有一句話沒有来历。蔣家宮廷对于新聞自由的絞殺，并不可能掩盖天下皆知的事实。历史是早已不断地嘲笑了一切独夫企图一手遮天的愚蠢的。

从本書关于事实的分析，便可以知道：第一、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所以对內戰“乐此不疲”，便是因為他們是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勢力服务而从反革命的內戰起

家，他們的財富堆积，是和战争完全不可分开的。他們认为只有战争，战争，又战争，才是他們得到更便利于用各种形式以搜刮人民的机会。因此，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放棄反革命的內战，实行和平，乃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二、所謂国民党一党专政乃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法西斯专政；四大家族对于經濟独占的貪欲既是无穷无尽，要造成四大家族經濟独占的清一色，当然他們也要坚持四大家族政治独占的清一色，而要坚持他們这种政治独占的清一色，又就要不断地从事反革命的內战和恐怖。因此，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放棄法西斯专政，实行民主，乃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三、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財富堆积，是和买办活动完全不可分开的，并且他們为着自己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独占，而同全体人民作战，在人民中是絕端孤立的，他們只能依靠出卖中国主权，以取得外援来屠杀人民，而把中国变成外国的附屬国和殖民地。因此，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不当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实行民族独立，乃是一定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之間的斗争，乃是全民族和四大封建买办寡头的斗争，乃是生和死的斗争，也由本书所展开的各种事实所证明出来了。或者是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独占統治繼續下去，那便是中国民族的灭亡；或者是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独占統治的瓦解和終結，而由人民的統治来代替它，那便是中国民族的更生。中間的道路是没有，也不可能。

当然，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愚民政策，四大家族独占的中央社及其他新聞机关的欺骗，中国人民当中，还有不少的人是被蒙蔽着的，而在上述的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等問題

上，对于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抱有某种幻想；即在民主陣綫里面，有一些人因为沒有去搜集材料，或者沒有可能得到搜集材料的机会，而从主观的好心善意出发，也因此存有一种或多或少的幻想。搜集材料，加以分析，提供給大家，这就是本书的責任。为着把真相說得明白，本书不能不征引相当多的数目字，但这类数目字并不是干燥无味的数目字。这类的数目字正指出来：四大家族每日都在吞噬无数中国人的生命。

过去和現在的历史事变說明了本书所說的問題，而此后发展的历史事变必将繼續加以证明。

中国人民求生的道路，正如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是极端明确而坚定的。更大地怒吼罢！偉大的中国人民！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

一 旧中国的最后統治者

全中国人口大概的数目是四万万五千万。除了中国解放区一万多四千万人口已經由人民自己做了主人之外，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还是在四大封建买办銀行系統的統治之下，而这四大銀行系統的統治者乃是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四大銀行系統就是中央銀行、中国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国农民銀行；它們的集中組織就是四行联合办事处。四大家族就是蒋介石的蔣家、宋子文的宋家、孔祥熙的孔家和陈果夫陈立夫的陈家；他們的“最高領袖”就是四行联合办事处主席——也即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

这个四大封建买办銀行和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統治特点，是經濟的統治和政治的統治实行赤裸裸的、直接的合而为一。四大銀行系統直接支配着国民党政权，并且以国民党政权的“国家銀行”名义直接操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經濟，而四大家族的主人也不但直接統治四大銀行，并且直接集中国民党政权的軍务、党务、特务、政务、財務的大权，形成了以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政治形式的、封建买办的法西斯寡头独裁制度。

近代中国所謂“官僚資本”不是别的，正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他們在大地主和大买办的經濟基础上，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一方面加速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工

业^①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資本。这四大銀行和四大家族便是这种官僚資本最集中的代表。这种官僚資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金融資本，它和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金融資本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活动，是完全不同的。它只能是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金融資本的附屬物，由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持起来。所以，它又是买办資本。它是近代中国买办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混血儿，是大买办和大地主在經濟上的联結物，而以这四大銀行和四大家族为它最集中和最后的主要結晶。

这四大銀行和四大家族是出現在毛澤东同志所分析的中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是中国人民和反人民、革命和反革命、解放和牢獄、光明和黑暗的相互間斗争最剧烈、最后要决定胜負的时代。中国民族在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英勇地站起来，反帝反封建，为自由的生存而战斗，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这是絕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新中国已站在每个人面前。但帝国主义者、大洋行买办和封建奴隶主为着維持它們在中国的統治，企图使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永远成为它們足底下的奴隶，因此也就扶持和鍛炼出了这种以四大家族为集中代表的反革命，并建立了旧中国統治者的最后一个封建买办的朝代。这四大家族依靠外国独占金融資本的援助，极残暴地集中了全中国的財富，威胁了全中国人民每个人的生存，成为破坏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的和最残酷的力量，但这些都是表現了帝国主义者、大洋行买办和封建奴隶主在中国統治的垂死的最后的掙扎。这是腐烂透頂

① 这个小冊子所說的“民族工业”，即是指民族資产阶级所經營的工业。
民族資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資产阶级有区别。

的封建买办寡头統治，不管它还如何倒行逆施，穷凶极恶，但都是在自掘坟墓，其生命已完全不可救药，而人民必将成为独立、和平、民主的全中国的主人翁。这是历史不可抵抗的規律，因为人民的新生的、觉悟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

二 从反革命的内战和买办起家

一 “一双满是血腥的手”

我們在这里不准备給四大家族写家譜。蔣介石的“中國之命运”自称他的血統是文王的子孙，还有一个姓蔣的給他写的傳記更具体地說他就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孫。孔祥熙也說过他是孔子的第几代孙，等等。虽則他們很想从历史上找出证据——正如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所玩弄过的——来证明他們有优秀的血統，因此應該成为中国統治者，但这些法西斯神話最多不过可以归入“笑林广記”这类的书里面，对于我們要做的科学的研究，却毫无趣味可說，因为这些血統的神話和現在四大家族的现实生活絲毫沒有关系，而科学的研究却必須从现实的生活出发。

蔣介石是出身自盐商的家庭，自己又“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充經紀人”（据“蔣介石傳記”所写：他当时“周旋商場，无不中的，……經營不半載，迭获巨利……儼然富商矣”。見該书三十四頁。秦瘦鵝編，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印行）。孔祥熙是出身自山西的票号商，自己原先也做过不少的生意。至于宋子文和陈果夫，也都經營过交易所，陈果夫并且是“上海交易所正当全盛时代”的蔣介石同事人物。然而那些时候他們的財富和現在比較起来，是真微小不足道，算不得什么的。他們現在的財富，已不但是民国以来一切大軍閥大官僚的財富所望尘莫及，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一切帝王也所不能够望其項背。毫无疑义的，他們这种出身

以及他們的交易所或經商的經歷，是引导他們后来走上反革命的政治道路。但是，仅仅这些，也还没有說明为什么他們成为現在中国这种特出的、独占的封建买办金融寡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富翁。

有一个新聞記者这末写过：“……‘既得利益阶级’，‘搶得利益阶级’，实則两个即是一个；‘既得’原是‘搶得’的，任何一个‘既得利益阶级’者，都有一双滿是血腥的手。”^①这个記者可能是企图說明四大家族起家的历史，但沒有說到四大家族的“一双滿是血腥的手”本身的經濟基础。

这四大家族的主人都是从軍从政的人物。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之前，他們也都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财富。这四大家族成为真正財閥的家族，乃是在“四一二”清党的血腥苦迭撻之后。这个血腥的苦迭撻本来是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大买办、大銀行家們对于蒋介石所要求的。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一个外国人所写的“出卖黃浦滩”对于这段历史作了以下的回忆：

“上海的……买办阶级，因为亲眼看見蔣总司令确在那里誠意的清除共产党，也便改变了他們的态度。……他們立刻筹了三百万元給总司令，并答应繼續籌集。……”

“蔣氏的反共行为，大班們很乐聞。……蔣总司令居然显出手段了。他选定南京为首都的所在地，設立了一个反共的国民政府，……因此一来，上海的金融界对于南京政府更加肯热烈的加以贊助了。”

蒋介石代替了北洋軍閥，成了大买办、大地主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新政治代表，而以所謂“江浙財閥”为中坚，

^① 重庆“大公报”，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

建立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买办法西斯軍事独裁的新朝代，同时又依靠于这种血腥的法西斯軍事独裁的政权，在經濟上造成了以他为中心、而和他的姻亲及有特殊关系的孔、宋、陈等相結合的四大家族独占的封建买办金融勢力，逐步地、但却很快地压倒了那原来扶他起来的旧封建买办金融勢力，并使那些原来所謂“江浙財閥”分解，而变成四大家族的附屬物。

經濟變成政治，政治又變成經濟。封建的买办的財產制度是因，蒋介石的法西斯軍事独裁是果；但是，果又变成了因，蒋介石法西斯軍事独裁就造成了这个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最集中的封建的买办的財產制度。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完全是直接由蒋介石軍事集團的刺刀和枪杆在保护封建买办的財產制度的反革命內戰中造成起来的。就是說，是有一双滿是血腥的手的“搶得”階級，沒有蒋介石的反革命武力，就沒有四大家族。蒋介石的反革命武力到了那里，四大家族的独占金融勢力也就到了那里。所以，这是封建的、买办的、而又是軍事的金融資本，也即是現在大家所說的最集中的官僚資本。

中国银行业本来是由官僚資本占有主要的勢力，一开始就表現出其封建的和买办的性质，但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时代，这种勢力，这种性质，却更加特別强烈了。这种官僚資本之封建的和买办的性质，在北洋軍閥統治时代也表現着軍事的性质，但到了以蒋家为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时代，这种軍事的性质又更加特別强烈，而且是表現得最为直接。

当然，这四大家族在蒋介石的封建买办法西斯軍事独裁的統治集團中，并不一定都是直接負責軍事的职位，而且

在金融势力中的位置及其发展的先后也不一样。四大家族的統治內部有一定的分工：蔣介石是軍事統帥和金融統帥，又是行政首領；宋、孔直接掌握財权，但时常以財政寡头的身份兼管一般行政（或行政院长，或副院长）；陳家兄弟直接掌握党权，在金融权力方面，原来不及宋、孔，但却已利用CC系的党棍特务組織的力量，步步打入宋、孔的財庫里面，直接分掌宋、孔两家的財权。这四大家族不但在統治地位中有分工，而且也互相矛盾。例如：宋、孔之間对于財权的争夺，此起彼落，彼起此落，这是众所共知的。十年前宋子文全副新式武装的稅警团被蔣介石所接受，并失掉了財長的位置，这也是众所共知的。陳家現在已实际上支配了交通銀行和中国农民銀行（交通銀行總經理屬於陳家CC系統的趙棣華，中国农民銀行的董事長現在為陳果夫），而且“做賊喊賊”，要以“打倒官僚資本”的口号，有时拉宋反孔，有时又拉孔反宋，計謀获取更大的压倒的財权。但是，不管这四大家族的分工和他們之間的矛盾百出，这四大家族的經濟利益，他們的命运，都是一致地和蔣介石的軍事独裁相結合的。他們狼狽相依，都把发财的捷徑放在蔣介石的反革命軍事活動的軌道上。同时，也不管四大銀行的总裁、董事長或總經理这类位置，时而落入这家，时而落入那家，或者还可以自己家系下的異姓充当經紀人，彷彿那真是什么“國家”的，但这四大銀行的支配权总是沒有脫出四大家族的掌心，当然，更是沒有脫出蔣介石这个集中表現四大家族經濟利益的軍事独裁的掌心。

二 追逐內戰的利潤

从历史說來，蔣家朝廷乃是中国第一个最好戰的朝代。

北洋軍閥是好戰的，但比起蔣家朝廷，不过是小巫見大巫。中國人民覺悟的力量已遠非昔比，這就使得這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集中的代理人——以蔣介石為首領的四大家族政治集團——要加強對人民作戰，而四大家族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封建和半辦的獨占性，一方面既要加強對人民作戰，另方面也要加強和一切異己異派異系作戰。曾經有人計算過：北洋軍閥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共有十一次內戰，平均一年不到一次，時間總計為八百八十五日。但蔣家朝廷自从南京開府，直到西安事變為止，對人民作戰，對一切異己作戰，首尾十年，簡直沒有間斷過一天。這正是蔣介石這個封建半辦法西斯軍事獨裁的大特點。

蔣家朝廷軍事的活動越廣，越持續，軍費當然也跟着擴大。比如，蔣家朝廷的軍事費（按即內戰費）所公開的數字，秘密的軍事費支出還不在內，在一九二八年度為二萬一千萬元，一九二九年度為二萬四千五百萬元，一九三〇年度為三萬一千二百萬元，一九三二年度為三萬二千一百萬元，一九三三年度為三萬七千三百萬元，一九三四年度的數字則為四萬四千余萬元^①，七年間竟增加到一倍以上。蔣家朝廷這種龐大的軍費，全部壓在中國人民身上，而籌措軍費的方式是很多的。賦稅的增加是一種來源，借內債是一種來源，借外債又是一種來源。四大家族在這一切方面都是一箭雙雕：一方面既得了內戰的軍費，一方面又增加了自己的財富，而後者更成為推動四大家族不斷好戰的一種力量，因為他們要從內戰的持續和擴大中，追求更大的財富，而他們追求財富的慾念沒有窮盡，他們對內戰的興趣也就沒有窮盡。

① 千家駒：“中國當前的財政問題”，“東方雜誌”三十二卷十三号。

这里特別以內債的发行为例。蔣家朝廷建立以来的內債，主要的都是和內战相联結的。有个经济学家于一九三三年曾就公債問題指出如下的事实：“政府发行債券的用途……計用在軍政費上的占 86%，用在金融事业上的占 9%，用在賑災上的占 4%，勉强能視為建設事業的（疏濬海河公債和江浙絲業公債）仅占 1%。”^①蔣介石当权以来发行的公債都带了这种最强烈的一貫的軍事性。承购这种公債而取得其利的，就是財閥。大家知道：承购公債的折扣，普通是五六折，同时公債利息定为六厘至八厘不等，所以銀行购买公債实际所得的利益，約在年利三四分之間。“例如自民国十六年迄二十二年所发行的國內公債額为十一万四千一百余万元，而財政報告的实收額仅六万四千五百余万元，約等于五折七扣。二十三年发行公債三万二千万元，而該年政府仅实收一万六千四百余万元，等于五折一扣”^②。可是，还本付息呢？那就需要按照債券票面十足支付了。这种高利貸实际上也即軍事的利潤，內战的利潤。蔣家朝廷的軍費既一年一年地扩大，而蔣家朝廷公債发行的速度，也远非北洋政府所可比拟：“自民国元年到二十五年，共計发行公債二十八亿八千八百余万元，其中在民国十六年以后所发行的占 80% 獨，約二十二亿六千八百余万元，民元到民十六年的十五年間，倒反只占 20% 强，約六亿二千万元。”^③就是說：蔣家朝廷九年的公債等于北洋政府十五年的 400%。这正是說明了蔣介石发动的綿延不絕的十年內戰規模远比北洋軍閥時代的內戰更大和更残酷。这种內債的

① 千家駒：“最近兩年度的中國財政”，“東方雜誌”三十卷四號。

② 寿进文：“戰時中國的銀行業”五十一至五十二頁。

③ 徐雪寒：“中國財政問題”，見“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发展，大大地增加了封建买办财閥的內戰利潤。这种內債的发行使封建买办财閥們和蒋介石政治集团的軍事利益直接联带在一起，使四大家族政治集团的軍事利益直接变成財閥的利益；但是，蒋介石政治集团在其取得原来的財閥們援助之后，又迅速地把四大家族变成独占的封建买办金融寡头，因而也把公債的大部利益变成四大家族独占的利益。

据一九三七年“全国銀行年鑑”所載：四行的有价证券在一九三四年占全国銀行有价证券总数（主要或几乎全部是公債）的45%，一九三五年为59%，一九三六年为30%（一九三六年减少，主要是中央銀行，因为它集中到发行鈔票方面去了）。以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四行乃是那种和內戰利益相結合的公債利益之主要壟斷者，正由这些数字所充分說明了。事实变成这样循环：蔣、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了內戰的家务，而代表国民党政府向自己家族所独占的銀行借款，又代表国民党政府为自己家族用債，还再代表国民党政府向自己家族还債。借时是主要由四大家族得利益，用时又是主要由四大家族得利益，还时仍是主要由四大家族得利益。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及其他有关的財閥从公債所得的巨大利益，堆积了更多的官僚資本（同时又是买办資本），不能天外飞来。“內債发行，須以租稅的收入为担保，故內債发行愈多，則租稅之增加亦必愈甚，而一般民众之負担，亦必愈重”。“……中国的租稅，大部分都轉嫁在农民身上。所以，內債的发行愈多，民众的貧富将悬殊愈甚；內債发行的結果，遂有一种征貧济富的作用产生，小民始終沒有些微的益处可得的”^①。甚至一九三四年出版过一本反动的

① 吳承龍：“中國的銀行”八十一頁。

书，也不得不这末写道：“各銀行……此种盈余大部屬於公債，直接虽取自政府，間接实来自农村。”^① 公債大量发行，实际的意义，就是在于把大量平民——主要是农民——的財产加速轉移为四大家族及其他有关的財閥的財产，而这种掠夺的基础，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

三 首先是軍火的大买办

在近代中国，封建制度和买办制度是不可分的，反人民的內战和买办制度更其是不可分的。四大家族从反革命的內战起家，又就是从买办的活动起家。蒋介石是很了解的：反革命的內战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所要求的，而沒有外国反动派的援助，他是不可能进行內战的。因此，他必須結合一切样式的外国反动派。并且也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就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买办，而首先是軍火的大买办。一九三六年有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說过中国反革命內战的一个本质的問題。他写道：

“中国的軍火几乎全部要仰賴外国，因此中国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軍火顧客。……日本在一九三〇年所供給中国的軍火，占中国軍火總輸入的 37.5%……禁運軍火虽曾喧騰于一时，实則凭借了中介人和上海自由港的便利，中日双方对于軍火的供給，毫不感到困难。

“‘密勒氏評論報’曾謂各国如能不以軍火供給中国，則中国的許多內亂，可以自動終止。中国的軍閥倘无外援，就很少能有作为。……

“……不論軍火是向日本买的，还是向英國、美国

① “江西農民經濟”九十一頁。

或德国买的，中国的内战必须借重于外国的军火，是铁一样的事实。”^①

这里所说的是事实，是真理。对人民好战的北洋军阀是这样，对人民更特别好战、而进行内战更多、更残酷的蒋家朝廷当然更是这样。如前所述，蒋家朝廷发行的内债有86%用在内战上，这种用途，完全可以断定：很大量是和购买军火不可分的。蒋家朝廷惯于用新式武器，如飞机大炮等等，向中国人民骄傲，四大家族当然都不能制造这些东西，而是从外国运来的。这就是说，内战的刽子手必定是军火的买办，因此，四大家族不但在内债上发了财，而且还在军火的买办上发了财。同上书有以下这一段报道：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英国工党议员琼斯（Morgan Jones）向下院报告，有一家军火公司的一部分替日本制造军火，另一部分则为中国制造军火。有一天日本与中国的经手人同时到那个军火公司，相遇于会客室。他们并不怒目相视，却彼此比较价目。结果两位代理人同去晤见该公司的总裁，要求减低价目。如今据说已经减低40%了。”^②

日本买军火，是为侵略中国，蒋家朝廷买军火，是为反革命的内战，二者有一个共同目的，即屠杀中国人民，因此，他们并不怒目相视。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见蒋家朝廷在这种购买军火的事业上，得从外国老板那里“减低价目”，但他们再他们的“国库”上记账，是不会记下“减低的价目”，那也是必然的。长期的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军火接济，所以军火乃是蒋家朝廷的重要的（但绝大部分）

① 赛而特斯：“战争、军火、与利润”，邵宗汉译本，七十六至八十页。

② 同上书，一百二十四页。

部分是秘密的)大宗国际貿易,这种大宗国际貿易的回扣或其他种种利益,主要地或大部地是由四大买办家族所壟斷,那是不会有什麼疑問的。

除了这种軍火买办的利益外,当然,四大家族还有很多其他种类买办的利益。比如:一般商业买办的利益、借債买办的利益。一九三三年有名的美国棉麦借款,对于支持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內战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借款一度使宋子文“声价十倍”,也使蒋、宋之間因此鬧得不欢,这就是一种大的买办利益。这里不一一說了。

总之,四大家族是从反革命的內战和买办的活动起家,在四大家族那里,反革命內战的利益和买办的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反革命內战和买办活动使四大家族发财,又使四大家族取得独占的經濟利益。四大家族所以是对人民极端好战的家族,以反革命內战当成生命,而对于帝国主义者則卑躬屈膝,就是为的他們所貪得无厌的封建买办独占的經濟利益。当然,前面所述的一些历史事实,不过是举例,是他們从反革命內战和买办活动起家的某些方面,某些节目。

四 以“民死”为目的

为保护少数財閥,而以公开的最阴險殘忍的暴力,打击人民的民主力量,随着又把自己变成更寡头的財閥,从而继续和扩大它的公开的阴險殘忍的暴力,把全民族的命运作为残酷的牺牲;——这一切本来是法西斯蒂发财的方法。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法西斯派,走的是同样的道路。但在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和資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派有分別,中国法西斯派是以掠夺农民为其財富的主要源泉,以保护封建的殖民地化的农业生产关系和当外国独

占資本的买办，为其主要的經濟基础，所以这法西斯派的性质乃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派，其发财的方法带有特殊的性质和特殊的形式。这就是蒋介石的“中国經濟學說”的所謂“不以一个人或一个物为本位，乃是以人类和社会的全体为本位，与西洋各派經濟學說截然不同”，以及所謂“以人性为出发点，以民生为目的，一切經濟制度与政策，都要順应人性，服务民生”。用科学的言語翻譯出来，在蒋介石这本中国法西斯“經濟學”里面，所謂“以人类和社会的全体为本位”，并不是别的，而是以四大封建买办家族为本位；所謂“以人性为出发点”，便是以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杀人性格和吃人性格为出发点；所謂“以民生为目的”，便是以民死为目的；所謂“順应人性”，便是順应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杀人性格和吃人性格；而所謂“服务民生”，也就是服务于四大家族所企图达到的民死的目的。

三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金融王朝

一 四大家族和四大銀行的結合

中、中、交、农四大銀行的首行——中央銀行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这是和原来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中央銀行完全区别的，而是蒋介石集团开始建立封建买办的金融独裁的产物。銀行的資本是由蒋介石政府发金融公債撥給的。蒋介石集团利用了他們所建立起来的封建买办朝廷的政治强制力，使它享有經理“國庫”、发行兌換券、鑄发国币、經募內外公債等特权，因而在銀行界得到独占的优势。蒋介石政府把它叫做“国家銀行”，但那“国家”是全中国人民所沒有份的“国家”，而只是蒋介石封建买办法西斯軍事独裁朝廷的“国家”，因此，蒋介石所謂“国家銀行”，不过是蒋介石及其一伙的封建买办金融寡头的私家銀行，所謂經理“國庫”，也不过是經營蒋介石一伙的家庫。那里面所掌握的东西尽管是人民的膏血，但却不是任何人民或其代表得去過問或查賬的。这个銀行的第一任总裁就是蒋介石的姻亲之一宋子文，第二任总裁就是蒋介石的另一个姻亲孔祥熙，現任总裁則是宋系的異姓員祖詒。

本来蒋介石初在南京建立法西斯軍事独裁朝廷时，已开始利用了政治地位，控制那原来創建于晚清、而成为北洋封建买办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也即北洋統治时代的首要銀行）的中国銀行和交通銀行。一九二七年中國銀行总管

理处移到上海，被加入所謂“官股”五百万元；一九二八年交通銀行又由蔣家朝廷在總資本中擔任了20%（二成），總行也移到上海。這樣，蔣家朝廷就在这兩大銀行中滲透了自己的力量。但是，這些都還是不夠的。一方面，中央銀行原定的資本還只二千萬元，比起中國銀行合“官股”的二千五百万元，反而居在下面，因此，還需要在資本上增加它的獨占力量；另方面，蔣政府對於中國銀行的“官股”付了五百万元，只占投資的五分之一，而對交通銀行一千萬元資本中所認定五分之一的“官股”，只付了一半（一百萬元），因此，對於這兩行也還需要繼續增加“官股”，以便于蔣系獨占。一九三五年春天，蔣政府就利用了那由於美國白銀政策所引起的金融危機，發行了一萬萬元的金融公債，以充當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基金；中央銀行增加資本，總數為一萬萬元；而中國銀行則增加“官股”一千五百萬元，合起原來的“官股”五百萬元，於是“官股”就當該行資本總額的半數；交通銀行則增加“官股”一千萬元，合起原來的“官股”一百萬元，於是“官股”就當該行資本總額的55%。這是蔣介石的封建買辦集團利用政治強制力以加強其經濟獨占地位的結果。這種所謂“增資”不過是“買空賣空”、巧取豪奪的戲法：蔣政府所撥給的，并不是現金，而是依靠政治力量發出的公債。“賬面上數字雖見增高，而庫存之現銀，則依然如故”。在這時候，“三行之實收資本，雖如賬面所載，但其中以公債抵充者，中央銀行占五分之三稍弱，交通銀行占二分之一以上，即中國銀行也占37.5%”^①。盡則如此，但是，這兩大銀行却從此大踏步地落入四大家族的手里。宋子文的中央銀

① 王宗培：“中國金融業之今后動向”，“申報月刊”四卷五號。

行总裁位置在一九三二年被孔祥熙所获得，但是这时却获得了中国銀行董事长的位置，而和孔祥熙平分中央、中国这两大銀行系統的春色（按：一九四四年一月間，孔祥熙又夺取了宋子文的位置，兼任了中国銀行的董事长，但实际上，宋系一直在中国銀行仍有左右一切的地位）。

四大銀行之一的中国农民銀行原为一九三三年开幕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銀行”在一九三五年改名的，是由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特許設立”的，就是說，这个所謂“农民銀行”不但和中国农民毫无关系，而且是直接为反对农民而在內战戰場上設立的。这更是公开的、极端血腥的、在刺刀尖端和枪口上的法西斯独裁保护封建制度的直接产物。这个銀行不消說也只是四大家族的私产，陈家CC系占了主要的勢力，先是孔祥熙当了董事长，蒋介石接任过一次，又由孔祥熙轉任，而现在则是陈果夫。

中、中、交、农这四大銀行都成为蔣家朝廷进行反革命內战的金融活动中心。

除了中、中、交、农四大銀行外，还有一个在一九二九年創立、而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良任總經理的中国国貨銀行，另还有一个在一九三一年便根据蔣政府财政部的命令，由中国、交通两行加股改組的新华信托銀行。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蔣政府“又还以人事改組和实力补助的方式控制了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大銀行”。蔣政府利用了这三行发生挤兑的危机的时候，“予以救濟”，于是中国通商銀行的總經理便換为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长的顾詒谷，四明銀行的便換为中央銀行常务理事的叶琢堂，中国实业銀行的便換为中央銀行国庫局长的胡孟嘉了。后来蔣政府又以“官股”加入三行，“使三行实际上变为政府銀行的支屬”。就

是說，这三个“本都是历史悠久而又具有相当实力的二流銀行”，已落在四大家族的控制之下了^①。一九三六年，还有一家由宋子文任董事长而在香港重新复业的广东銀行，則成为宋家在华南活动的金融中心。

前述各銀行，中央銀行是完全“官股”，广东銀行完全沒有“官股”，其他都叫做“官商合办”，又有“官股”，又有“商股”。但是，如大家所知道，所謂“官股”既是代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王朝，而另一面，四大家族又是这些銀行所謂“商股”的主要代表。比如：在一九三五年中國銀行改組之后，董事长宋子文及其弟宋子良是所謂“官股”董事，而財政部长兼中央銀行总裁孔祥熙却是“商股”董事。在一九四四年中國銀行股东大会之后，宋子文也和孔祥熙一样地变成“商股”董事了，但他的弟弟宋子良却仍是“官股”董事。陳果夫在交通銀行和农民銀行里面，也都叫“商股”董事。至于四大家族的經紀人在各銀行中当然也时而“官股”董事，时而“商股”董事，或者这里是“官股”董事，那里又是“商股”董事。例如宋子文門下的現任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及中央銀行总裁貝祖詒也是中國銀行的“商股”董事，陳家CC系的趙棣華原来是交通銀行的“官股”監察人，現在則是“商股”董事了。总之，四大家族是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蔣家朝廷一九三五年公布的“中央銀行法”认为必要时“得招集商股”，原来也不过是为四大家族在中央銀行里面准备“商股”的地位。

四大家族和四大銀行的結合以及他們的金融勢力的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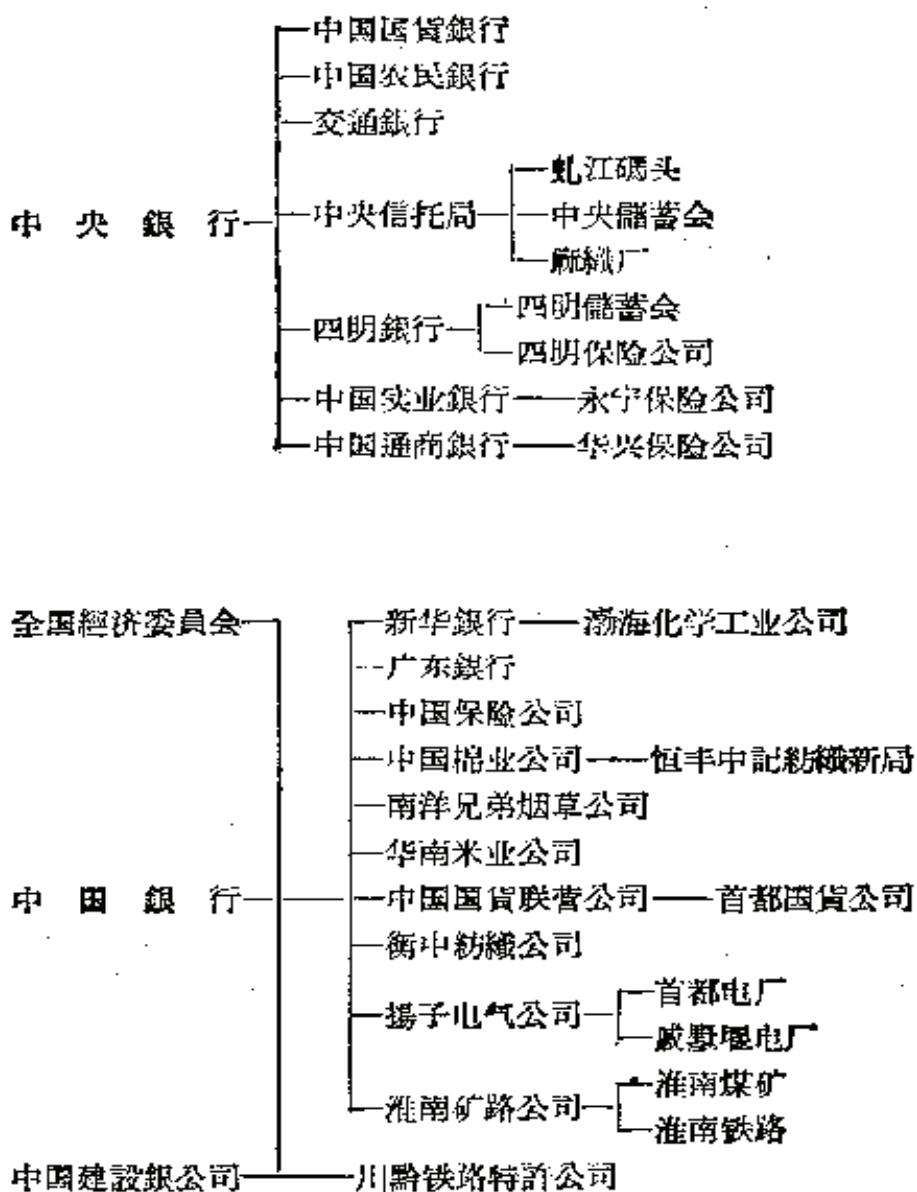
^① 參考吳承禧：“民國二十四年度的中國銀行界”，‘東方雜誌’三十三卷七號。

張，也就把原来金融界一批比較有地位的人物放在四大家族的門下，把他們拉入中、中、交、农四大銀行的彀中，或者給以一官半職，使他們也公开地变成四大家族統治下的“亦官亦商”的人物。例如，張公权在中国銀行的原来地位被宋子文夺得之后，蔣家朝廷就給他当了一位官职，而且还給他一个中央銀行副总裁的位子。吳鼎昌是盐業銀行總經理，北四行儲蓄會主任，也被拉上了官职，还兼了中国銀行董事。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被拉上當了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董事，又當了中国銀行常务董事，还替蔣家朝廷奔走过金融的外交。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李銘也是中国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董事，又當了中央銀行的監事等等。另方面中、中、交、农的主要人物則兼任了各種所謂“商办”銀行的职位，例如，孔祥熙當了上海商業銀行的董事，貝祖詒當了浙江實業銀行監察人，等等。差不多所謂“中等銀行”，都和中、中、交、农四大銀行形成了这种“亦官亦商”或“官商不分”的人事交流，而实际上这許多“中等銀行”就因此更變成四大家族和四大銀行的附屬品。所謂人事交流，乃是四大家族在金融界統治和集中金融力量的綫索。这种綫索联結而成为四大家族的全国金融統治网。

二 金融独占的地位和財富集中的速度

直到抗日戰爭之前，在实际上受四大家族直接支配、而以孔祥熙領班的中央銀行和宋子文領班的中国銀行居首的独占金融系統，可于“申報周刊”下列二表看出来^①：

① 王宗培：“最近之中國金融業”，“申報周刊”二卷二十三期。



表上有关系于工商业部分的組織，在这里暫且擱下来不說。現在根据一九三七年“全国銀行年鑑”，从实收資本、資产总额、各項存款、发行的兌換券及其純益，来看一看四大家族所直接支配的四大銀行在全国一百六十四家銀行中所占的地位。列表如下：

中、中、交、农四行在全国銀行所占的地位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实收資本	实 数 (单位元)	136,715,650	166,915,750	167,500,000
	指 数	100	122	123
	占全国銀行的百分比	40%	45%	42%
資产总额	实 数 (单位元)	1,904,930,406	3,072,686,046	4,288,150,128
	指 数	100	161	225
	占全国銀行的百分比	44%	56%	59%
各項存款	实 数 (单位元)	1,267,514,962	2,106,260,976	2,676,366,658
	指 数	100	166	211
	占全国銀行的百分比	42%	56%	59%
发行兌換券	实 数 (单位元)	408,937,936	676,841,045	1,270,221,400
	指 数	100	166	311
	占全国銀行的百分比	66%	78%	78%
純益	实 数 (单位元)	17,959,326	14,537,622	21,998,020
	指 数	100	81	122
	占全國銀行的百分比	45%	39%	44%

从上表看来：中、中、交、农四行在一九三六年实收资本占全国銀行的42%（如果加上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中国国貨、新华、广东六行就占47%）；資产总额占59%（如果加上中国国貨、新华、广东三行——其他各行沒有材料——就占61%）；存款占59%（如果也加上同上述三行也占61%）；四行发行的兌換券占78%；純益占44%。假使再加上一些和四大家族有关的省市立銀行，当然上述的比例又要更大。四大家族所支配的中、中、交、农四行在全国金融業的独占地位，是明显极了。

至于四行財富集中的速度，也可以从上表看出。以一九三四年資产总额的指数为一百，一九三五年四行則为一

百六十一，省市立銀行則為一百十六，全國其他各種銀行合計却由一百退為八十四；一九三六年四行為二百二十五，省市立銀行為二百九十，其他各種銀行合計則仍限在一百。以一九三四年存款的指數為一百，一九三五年四行為一百六十六，省市立銀行為一百七十一，其他各銀行合計退為八十七；一九三六年四行為二百十一，省市立銀行為二百零九，其他各行合計則退為九十八。以一九三四年發行的兌換券的指數為一百，一九三五年四行為一百六十六，省市立銀行為一百八十九，其他各銀行退為五十八；一九三六年四行為三百十一，省市立銀行為四百五十七，其他各行則為六十七。就是說，以四大家族為主要代表的官僚資本的財富迅速增長了，而其他不是屬於四大家族系統的銀行所占的地位則逐步下跌。

但如果還要較詳細地知道四大家族集中財富的猛進，最好還特別看一看中央銀行從一九二八年起它的資產總額、存款、發行兌換券和純益的每年進度。現在根據手頭關於抗日戰爭之前的材料，列表如下：

中央銀行從1928年到1936年的進度①(以元為單位)

年 度	資產總額		各項存款		發行兌換券		純 益	
	實 數	指數	實 數	指數	實 數	指數	實 數	指數
1928	47,470,796	100	15,410,468	100	11,712,923	100	239,360	100
1929	86,869,794	183	39,984,707	259	15,379,292	131	1,692,683	707
1930	124,336,245	262	66,042,175	429	22,669,228	194	2,726,343	1139
1931	145,321,820	306	89,750,920	582	25,173,349	215	4,870,404	2035
1932	216,424,748	456	133,803,743	868	35,160,996	300	6,468,475	2702
1933	368,561,179	765	244,678,864	1581	71,063,301	607	10,724,245	4480
1934	478,240,246	1007	272,592,827	1768	86,048,617	735	14,821,505	6108
1935	931,542,769	1962	634,000,095	4114	179,923,546	1536	9,048,340	3780
1936	1,231,236,273	2594	757,043,176	4912	340,375,372	2906	17,095,868	7145

这里可作一个历史的比拟。

中国銀行研究室发表过全国二十七家最重要銀行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之营业的統計和報告^②，那二十七行除了中央、国华、星业等三行是一九二八年后开设的，一九二七年前則为二十四行，那二十四家“最重要的銀行”在一九二一年的資产总额为七亿五千九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十七元，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十四亿六千二百零九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元，如以一九二一年的指数为一百，到一九二七年不过是一百九十二点五七。但中央銀行一行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九年間的积累，它的資产总额，已为十二亿三千一百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三元，就是說，差不多已将近在四大家族代替北洋軍閥統治之前的全国二十四家重要銀行的資产总额，指数則由一百到二千五百九十四。

二十四家重要銀行的存款在一九二一年为四亿九千六百八十九万七千零四十一元，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九亿七千六百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元，如以一九二一年的指数为一百，一九二七年也不过为一百九十六点四一。但中央銀行一行在一九三六年的存款已达到七亿五千七百零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六元，指数为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到一九三六年的四千九百十二。

二十四家重要銀行发行的兌換券在一九二一年是一亿零二百七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元，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

① 岩双：“中央銀行之进展与銀行制度之将来”，“东方杂志”三十卷十四号。又王維朝：“最近两年中國各銀行之业务”，“东方杂志”三十二卷十五号。

② 此系摘引自“东方杂志”三十卷二十一号，“中国的銀行之特质”。

二亿七千八百七十三万零四百一十元，如以一九二一年的指数为一百，则一九二七年为二百七十一点一七。但中央銀行一行在一九三六年的发行額已远远地超过了二十四家一九二七年的总数，达到三亿四千零三十七万五千三百七十二元，指数則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到一九三六年的二千九百零六。

二十四家重要銀行的純益在一九二一年为一千三百二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五元，指数为一百，到一九二六年为一千六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七元，指数为一百二十七点六二，一九二七年則減为一千一百四十四万二千元，指数为八十六点三三。但中央銀行一行的純益在一九三六年已达到一千七百零九万五千八百六十八元，超过了二十四家在一九二六年的总数，其指数則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到一九三六年的七千一百四十五。

你看！四大家族的暴发戶的性质及其独占的性质，不是由这个四大家族吸血的中心金融机构的这些数字反映出来了嗎？（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反映，而不是全部的反映）

是否因为四行——特別是“中央銀行”——乃是蔣家朝廷的所謂“國家銀行”或所謂“銀行的銀行”，它有種什么特别的营业，那种营业既不是买办的性质亦不是封建的性质，因而特別致富呢？不是的。很久以前已有一些作者不断輕描淡寫地指出了下列一些事實：

“名称上尽管有什么銀行什么銀行的分別，实际上各銀行所做的营业还不是一样？”^①

“各国中央銀行之习惯，……不与普通銀行爭夺存

① 蒋庆三，“中国金融問題之回顾与前瞻”，“东方杂志”三十卷四号。

款。……中央銀行之存款业务，实有相当之发展，……若其存款业务之发达，由于高利，是为畸形之政策。”

“国民經濟雕敝已极，各銀行之鈔票相繼歸籠，惟中央銀行之兌換券流通數額反見增長，此有背于常情。”

“現时中央銀行之資本，純為國庫之所出，多置政府证券何用为？”

“中央銀行……不应以營利为目的。……中央銀行純益之增加，……不足以示中央銀行之健全发展……。”^①

“……百业不振，破产續出，惟銀行独見繁榮。上海各銀行二十二年度（即一九三三年）的決算盈余，中央銀行多至一千二百万，其余小銀行，至少也有五六万，我們考察这种盈余的来源，其中不少銀行，除了公債的經營之外，便觉无法可以解釋。”^②

凡此一切，只是說明了四大家族所支配的中央銀行及其他所謂“國家銀行”的业务，和一切其他为买办的封建的性质所規定的银行业务，沒有性质的差別，即同样地在基本上不是一般資本主义的性质，而是更集中的封建和买办的性质，其发展并不是反映国民經濟和資本主义的发展，而恰是反映了国民經濟的破产和資本主义的不得发展。四大家族支配的銀行所以能够特別迅速集中全国的財富，压倒了非四大家族系統下的銀行，显然是由于蔣家朝廷的封建买办法西斯軍事独裁的力量起了特殊的作用。他們这种暴发的龐大财富的来源，当然是来自全体人民，至于其主要來

① 岩双：“中央銀行之进展与銀行制度之将来”，“东方杂志”三十卷十四号。

② 叶作舟：“中国金融之危机及其当前問題”，“东方杂志”三十一卷六号。

源，当然也和其他銀行一样，正如前章所指出了的，是来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压迫下的农民：“吾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5%以上，凡百事业，何者不建筑在农民大众的基础上。而况金融事业，更是水銀泻地，无孔不入嗎？”^①

三 “法币”的性质是封建、买办、軍事的强制掠夺

“法币”政策是四大封建买办家族进一步地完成其金融独占的很重要的、而且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法币”政策使四大家族得以更残酷地集中全国人民的财富，而且使在蒋家朝廷統治下的金融界不能不进一步仰其鼻息。发行“法币”的这个蒋政府，是全力拥护封建剥削的社会制度，并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对人民吸血、又由此建立其財政制度的恶政府，是只向人民无穷尽地要东西，而絕對不給人民任何甚至小小的一点东西的恶政府，是用一切野蛮方法压迫农民解放和反对民主的恶政府；这种“法币”的发行，是建立在大地主大买办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和窒息国民經濟发展的社会基础上的。“法币”只是大地主大买办——特別是四大家族剥削人民的一种工具，是剥削农民的一种工具。它的发行絕對只是表示蒋政府統治下人民穷困的增加，生活的更恶化，而主要地是由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农民承受这痛苦的负担。因此，这种“法币”的性质是封建掠夺的性质。

沒有英、美帝国主义财閥的援助，四大家族不可能施行这种法币政策。在一九三五年間向蒋政府建議施行这个政策的，是英国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罗斯。他于該年九月来中国，曾途經日本。“当时論者謂：在近十年來到华之人

① 許宝和：“银行业最近之业务与农村經濟之影响”，“东方杂志”三十一卷六号。

物中，以李氏使命为最大”。該年十一月三日蔣政府財政部长孔祥熙与英國大使賈德干及李滋罗斯会晤后，即于当晚十一时发表“金融改革令”，規定以中、中、交三行所发之鈔票为“法币”，并实行“白銀国有”。蔣介石的“国家”既然只是四大家族的，只是反对人民的，因此，所謂“白銀国有”即是集中这全国人民血汗的結晶物，变为蔣家朝廷和四大家族的私有物。四日晨英大使也頒布命令，勸侨华英人服从蔣政府改革币制之命令。就是說：蔣介石朝廷实施这种所謂“币制改革”和集中白銀，是由握有中国金融霸权而实际上左右蔣政府金融命运的外国銀行——首先是当时英國在华的財閥——所策动、决定和支持的。蔣政府既建立在封建的、买办的經濟制度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与國民經濟的发展背道而馳的寄生制度和反人民的軍事制度的基础上，因此在人民中孤立起来，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援助，而它的政策只有依靠外国的金融太上皇的决定和支持。但是，蔣政府当时給英國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使中國貨币变成英鎊集团的一員。蔣政府規定了对外汇兑華币一元合英鎊一先令二便士半，这样把法币和英鎊联系起来。以外汇为本位，它所代表的价值由外汇决定，这是法币买办性的基本特点。因此，这种法币的性质是买办掠夺的性质。中國貨币权的丧失，經過蔣政府的法币政策，变成“合法”的东西了。

除了依靠英國的援助之外，四大家族为取得美國財閥的援助，就不惜給予更大的代价，把中國人民数千年来血汗的結晶品——白銀——以“合法”的方式大量向美國輸送。以下是官方刊物的一段历史回忆：

“……更有甚者，新貨币制度下，为維持汇率之稳定起見，必須厚集外币准备，政府当局曾与美國財部談

判，乃收五千万盎斯白銀，以当时銀价每盎斯六角五分出售美国，因而获得大量外币。宋子文在中国銀行報告书中，曾有說明。……继而中美更締結具体之协定，由美国向中国中央銀行购买大量白銀。因而在半月之中我国运赴美国之白銀共值六千四百万元。此系中国政府及銀行家与美国財政部折冲后之結果。”

对人民搜括，对外国进貢，而进貢又是为着保持四大家族搜括人民的重要工具——“法币”的信用。英國帝国主义在中国原来有捷足的优势，但美国財閥的压力究竟是比較占上風，因此，美元和英镑就很快在蔣政府“法币”的統治地位中平分春色，并且美元获得更多利益，而在抗日戰爭时期中，美元就逐步在“法币”中攫得独占的統治地位。現在已是美元支配了“法币”一切。四大家族已完全由美国的財閥当家了。

蔣家朝廷利用了法币政策，以維持其日益龐大的軍事支出。就是說，法币的发行，同时又是为了供应蔣家朝廷的反革命軍事活動的需要，以便于使四大家族达到其扩大掠夺規模的經濟目的。法币的发行是在蒋介石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武力保护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武力，法币必然成为廢紙；同时，法币的发行又是用以充实蔣家朝廷的軍事費用，而成为蔣家朝廷力求加强其法西斯武力的手段。因此，蔣政府的法币是封建掠夺、买办掠夺的性质，又是軍事掠夺的性质。

四 金融的軍事独裁、封建搜括 和买办事业的新发展

在抗日戰爭中，四大銀行变成四大家族更集中的金融

統治机构。四大家族为着利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大发国难财，就依靠其軍事的压迫制度，更加集中金融的权力，并在人民中更加强烈地推行这种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法币。四行联合办事处便是蔣政府的金融集权組織。蔣中正、孔祥熙、宋子文、后来又加上陳果夫——这四个金融寡头便是这个集权組織的集权人物，而蔣中正则是总处主席。“主席总攬一切事务”。“財政部授權聯合辦事處理事會主席，在非常時期內，對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可為便宜之措施，並代行其職權”。所謂“國民政府特派”，所謂“財政部授權”，当然都是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自己特派自己，自己授权自己。在他們那里，私相授受和公相授受只是一个东西。这样，蔣介石就由政治、軍事的公开独裁者，进而兼为金融的公开独裁者。这种依靠軍事独裁作支柱的公开的金融集权和金融独裁，一方面就是为的更便于利用法币这个工具，去作“合法”的封建的搜括独占，一方面又就是为的更便于发展和外国財閥的联系，去作“合法”的买办独占。到了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起，中央銀行便独占了集中发行与集中准备的特权，其他三行又各增加資本到六千万元，中央信托局則增資到五千万元。四大家族的金融独占体制，又更进一步了。正如一些參政員所提：“中央銀行既由政府授予种种特权，而普通銀行又以存款准备率集中于該行，其資本之雄厚，自非普通銀行所可比拟”。但是，在这种独占的体制之下，中央銀行仍未“放棄以往与普通銀行相競爭之业务”，“平常所經營之业务，仍与普通銀行无異”。“以如此龐大之力量与普通銀行相競爭，普通銀行必无立足之余地”了^①。

① 參政会第三屆第三次大會提案。

四大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由金融体制的独占到财富的独占，发展的过程又是很迅速的。当然，秘密的数字是很難知道的，因为四大家族不論任何方面都是很严密隱匿自己“不义之財”收入的数字。我們現在只能就四大銀行某些公开的数字，測量其某个方面。比如：战时各銀行存款數額，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增加最速，四年之中，約增加六倍，且數額也最大，平均每年約占全部銀行存款80—90%^①。这和前面所述一九三六年四行存款占全国銀行的59%的情形比較起来，是增加得很多了。

又比如：根据“中央銀行月报”公布各行局（即四行二局，二局之一为中央信托局，又一为中华邮政儲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儲蓄存款，外币和黃金的儲蓄在一九四〇年占总数的1%，一九四一年占0.5%，一九四二年占16%，一九四三年占26%，一九四四年占32%，一九四五六年六月占75%，同年七月占74%^②。这又可見：那种被认为比較稳定可靠的財富代表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是年又一年地迅速地集中到四大家族手里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在金融上大量集中全国人民財富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如众所知的等于天文学数字的法币发行。据蔣家朝廷新任的財政部长俞鴻鈞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参政会”公布：“抗战八年內政府共发行紙币十万零三千一百九十九亿元。”^③当然，实际的、秘密的数字，当会比这个数字要大。

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原来是暴发戶，是中国最大的富翁，

① “金融知識”二卷二期七十八頁。

② “中央銀行月报”新一卷二期一百零一頁。

③ “財政評論”十四卷五期八十六頁。

而自抗日战争以来，由于发国难财，他們更暴发了，他們更富了。他們发财的方法，出奇地多，但是外国財閥所批准的“法币”的方法，却是“合法”的一种方法！以絞殺國民經濟，破坏社會生产力为目的的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用“法币”这个工具，大量地征发蔣政府統治下人民（包括社會各階級，但主要是农民）的物产及各种財富（有些人是这末說：“政府（指蔣政府）拿着一張紙币，像符籙一样，不动声色，便把老百姓手里的錢变走了”）。四大家族用通貨膨胀的办法，以加强其发财的各种投机活动。在这种封建买办的“法币”的无限制强迫征发、通貨膨胀所促进的投机活动之下，四大家族的肚皮就日益膨大，而蔣政府統治下的人民的收入和生活，就极其可怕地恶化下来，并空前大量成批地破产。

英、美財閥們繼續支持四大家族这种掠夺中国人民的“法币”信用。当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英、美帝国主义者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望着日寇（而且以物資供給日寇）进攻中国，这和苏联的急公好义积极援助中国抗战的行动是极端相反的，当然也和英、美人民从事积极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态度相反。但是，“法币”既以外汇为其信用的基础，成为英、美金融集团的附庸，英、美財閥們就很願意支持“法币”的信用，因为这是四大买办家族的利益，同时也是他們的利益。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二年二月，英國給蔣政府的借款，是一亿一千八百五十万鎊，其中用途指名为“整理中國內債”、“維持法币穩定汇价”、“法币平衡基金”、“平准外汇”、“增强財力”的，先后达八千八百万鎊，占全部借款的74%以上。在同时期中，美国給蔣政府的借款是七亿四千七百八十万美元，其中用途指名为“支持中國外汇”、“調整中國通貨”、“平准外汇”、“增强財力”的，先后达六亿

二千五百万美元，約占全部借款的 85%（大家要知道：美国大量的向中国輸送軍火，却正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是为援助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內战！）。

总之，上述这些借款的数字說明了：英、美借款的基本方向，乃是要繼續經過四大买办家族控制中国的金融和財政，也因此就不能不支持四大家族的私币——“法币”以吸取中国人民的膏血。除了上述这类財政性质的借款之外，英、美其他性质的借款，也都对于四大家族的法币起了救命湯的作用，有如官方刊物所述：“对外……各項借款，无论为币制借款，外汇平准基金借款，易貨借款，建筑借款，乃至商品借款等，类皆直接間接有助于法币之安定。”^①就是說：英、美的借款对于四大家族摧毁中国社会生产力、劫夺中国人民生命的法币之无限制发行，給予了外来的保护。至于美国借款的数字大于英国，也就指出了四大封建买办家族依靠的重心为什么要由英国轉移到美国財閥的怀抱。

抗日战争之前，蔣政府的內債數字大于外債數字。但自从施行法币政策，蔣政府得到了英、美財閥的保护、可以自由发行紙币之后，于是，一方面，发行紙币就步步变为主位；另方面，外債也步步变为主位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債的數字反过来，大大地超过了內債的數字。比如到一九四四年为止，蔣政府的內債為法币二百二十三亿零六百万元^②，而到一九四四年为止，蔣政府的外債，按当时汇率折算，約共合法币四百三十八亿元^③。外債对于內債的“喧宾

① 前述借款各項均見“財政評論”七卷二期，一百三十八至一百四十一頁。

② “財政評論”十四卷五期六十七頁。

③ “金融知識”三卷四期五十五頁。

“夺主”，说明了蒋政府的买办性的加强。这种外債既保护了和促进了蒋政府的法币无限制发行，而由外債所获得的外汇，事实上又为四大家族所壟斷的发财捷徑之一。这样，中国人民被四大家族加上了外債的鎖鏈，又在这外債关系上被加上了、且不断地被加强了法币的鎖鏈，而四大家族则在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全部的利益。其次，这种外債在一定場合又变成內債，比如：一九四二年蒋政府所发的两种內債（同盟胜利美金公債和同盟胜利公債）就是以当时美国的五亿美元借款和英国的五千万鎊借款为担保的。这样，中国人民欠了一个外債，跟着又欠了一个內債，而四大家族则发了外債財，同时又发了內債財。

戏法还不只是这样。蒋政府所有內債又都同样地成为发行鈔票的“保证准备”。“……大多数公債，几皆由政府以总預約券方式交予四行，再由四行垫款予政府”。“四行給予政府的大量垫款，既非出自各种存款，亦非源自銀行的資本和公积金，则势必出自增发鈔券一途……。因四行固可以政府債券为保证准备，增发紙币。因是，政府如以此种方式，发行公債，其发行額愈大，则四行对政府的垫款愈多，四行因是所增发的鈔券亦愈增”。“发行公債其名，而通貨膨脹其实”^①。这样，人民既欠了四大家族“內債”，要以賦稅去納还，同时又因“欠內債”的关系被加重了另一重的压迫——即“法币”的压迫，而四大家族則絲毫不費什么本錢，但却从人民的膏血中得到了內債的本息，又得到一种“根据”，可以在另方面更大量地用法币的形式去征发人民的財富。

① “金融知識”三卷四期四十六至四十八頁。

外債變成法幣，法幣變成內債，內債又變成法幣——四大家族金融王朝這種複雜交錯、循環不絕的掠奪的貨幣政策，利用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災難和困難，而有了更新的發展，但也因此更尖銳地擴大了四大家族和人民的分裂，和各階級的分裂。四大家族更孤立了。同時，四大家族的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雖然使他們自己大發其財，却引起了和擴大了四大家族統治下的經濟大混亂，並且大踏步地促進着四大家族統治下的經濟總崩潰。

五 搶奪人民勝利的果實

日本投降以後，四大家族依靠美國反動派的援助，依靠他們那由外國武裝起來而在日寇面前望風而逃的軍事力量，用內戰的方法，乘機搶奪人民抗戰勝利的果實。四行二局劫收了敵偽的各種金融機構以及敵偽所掠奪中國人民的金銀財寶。比如：在南京上海區，關於日寇金融機構，據蔣政府的規定：“（一）朝鮮銀行由中央銀行接收，（二）正金銀行及德華銀行由中國銀行接收，（三）台灣銀行由中國農民銀行接收，（四）住友銀行、上海銀行株式會社、漢口銀行株式會社上海支店由交通銀行接收，（五）三菱銀行及帝國銀行和其附屬企業機關等由中央信託局接收。”關於偽金融機構，據蔣政府的規定：“（一）偽中央儲備銀行，偽華興銀行，偽滿洲國銀行上海支店，偽省市地方銀行由中央銀行接收；（二）偽中央信託公司，偽中央保險公司，偽中央儲蓄會等由中央信託局接收；（三）偽郵政儲金匯業局，偽中日實業，偽中江實業等銀行由郵政儲金匯業局接收。”^①這是南京、上

① “中央銀行月報”新一卷一期二至三頁。

海的情况。当然，凡是蔣家軍所达到的地方，都毫无例外，由四行二局劫收了金融方面的一切。这一切由敵偽用极残酷的暴力和敵偽紙币所强制集中而来的中国人民的金融財富，全部再由四大家族用暴力的方法霸占为己有，一点也不再落到民間。在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这点上，四大家族和日、偽完全一致，而日、偽掠夺的东西現在已轉移为四大家族的东西。

日寇替四大家族做了一番掠夺集中的工作，很大地增益了四大家族的財富，扩充了这四大家族的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金融王朝的經濟独占的規模，难怪乎四大家族要对日寇感恩感德，而蔣介石要发出“爱敌人”的指令。但当蔣家朝廷向日寇施行仁爱的时候，国民党統治区的中国人民在这个金融王朝压榨之下，是日益陷于死无葬身之地的境况。

六 加速总崩溃的速度

四大家族因为发了胜利财，就又扩大了食欲的胃口。

“慘勝”以来，据中央銀行統計，截至本年（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止，蔣家朝廷統治下的各省市金融机构，共达四千六百三十四家，其中銀行家数，包括总行在內，共为三千四百八十九家；其中“官营”占二千四百四十六家，即占全銀行家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切所謂“官营”的銀行，都是在四大家族的金融系統的直接控制或至少間接控制之下。這是說，四大家族的金融独占网，更加清一色了。所謂更加清一色，也就是說，四大家族更加肥肿得不成样子，而更加接近于死亡。

四大家族經過法币的形式以掠夺人民，从“慘勝”以来，

也更大量、更残酷。如大家所知道：一比二百的“法币”与伪币比价，就是对于收复区人民的一番大洗劫。至于法币发行的数字，其膨胀速度也远非抗战时期所可比拟。单就今年（一九四六年）的财政来看：据蒋家朝廷財長俞鴻鈞于六月初旬在南京所举行的第四次财政會議上報告說：“从一月到五月，政府已將本年度預算總額二万五千亿元，用去一万五千亿元，而同期的稅收只二万五千万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額的赤字，由發行補足。”根据这報告，可知本年前五个月每月收支平均相差为二千九百九十五亿五千万元，这数字是全靠發行来弥补的。前五个月間，蔣政府的支出，据这个公开的数字，已用去全年預算的五分之三。由于蔣家朝廷的发动大规模內战，支出的軍費更大，到六月份，已用去全年預算五分之四，即六月份支出就达五千亿元了。到七月底，据傳全年預算已用完了。一种估計：“七月以后，每月財政支出約将达一万亿元之巨，此后情形，尙難預言其发展。”^① 蔣家朝廷这种財政支出的数字一天一天地大增加，就是說明四大家族的“法币”的数字更一天一天地大增加。蒋介石和蔣家朝廷的“宣傳”部长（实即撒謊部长）自吹七月份法币發行沒有增加，那就是說，此地无銀三十两，法币的發行从此增加得更多更迅速了。这还只是就財政的支出来看，而实际上，四大家族“生財有道”，法币的發行当然并不限于对財政支出的数字。

前面我們已說过，在抗日戰爭时期，四大家族金融系統已經美國化，“慘勝”以来，就又更加美國化，就是說，更加美

^① 以上材料参考：娄立齋：“一年來的中國經濟”，“中國建設”二卷六期；龍成志：“‘剩餘物資’的后果前因”；欽本立：“招致毁灭的道路！”；后二文見“文汇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

國买办化了。美国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步武希特勒和日本軍閥失敗的后尘，企图建立統治世界的大帝国，因此，就企图把中国变成独占的殖民地，又因此，除了要在軍事上直接控制中国之外，就要在軍事、政治、財政、經濟各方面增援四大买办家族来和中国人民作战，以便經過四大买办家族之手，去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就借款來說，自抗日战争以来到現在作者执笔时(一九四六年)为止，据所已知道的，包括前面(本章第四节)提到的抗日战争时期內金融借款，美國政府曾給蔣家朝廷十四項借款，總計約十三亿一千四百五十余万美元；加以各种轉賬，蔣家朝廷現在美存款，尙有七万万美元。此外，自一九四二年起，在“租借法案”項下，据七月二十一日聯合社訊，美政府曾交蔣家朝廷总值十五亿美元以上的武器及作战物資，其中約有五分之三为日本投降之后所供給。本年九月一日，美政府和蔣家朝廷正式協同宣布让售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之美国剩余物資和設備。这一切借款，大部分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反革命內战的投资，同时，不論是何种性质的借款，一方面是加强蔣家朝廷反人民的軍事，一方面也正如我們在前面(本章第四节)所指出的，都对于保护四大家族掠夺人民的金融制度和“法币”，起了作用，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关联在一起。蔣家朝廷的內战活动，是以保护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即摧殘中国人民的民主力量，把中国变成菲律宾)和四大家族掠夺人民的封建买办的金融制度；而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和四大家族封建买办的金融制度，又正是蔣家朝廷內战活动的动力。美国这种对蒋介石反革命內战的投资，使四大家族又得到了一番大发横财的机会，使四大家族又在每个中国人民身上加了外債負担的重压，但是，美国这

种对蒋介石反革命内战的投资，既助长和煽扬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火焰，这种内战的火焰就天天地在用大力破坏蒋介石统治区的经济，并且是天天地在用大力促进四大家族的通货膨胀更加陷于无底的深渊。

在四大家族的这种通货膨胀前面，和蒋介石统治区人民被掠夺的广度和深度成正比例的发展，就是四大家族的金融制度是在加强着总崩溃的速度。这本是必然的历史逻辑。四大家族这种金融制度和通货膨胀，促使蒋介石统治区的农业、工业和正当商业的混乱和破产，并完全走到绝路，即走到总崩溃，而四大家族金融制度的总崩溃，又正是蒋介石统治区整个社会经济走到总崩溃的必然反映和必然结果。

七 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

当然，前面所述，主要地还只限于四大家族以“官家”名义在金融界的公开独占地位。另外，他们还有各种“商立”的金融机构，在抗日战争中特别可指出的，比如孔祥熙的山西裕华银行，陈立夫的中国工矿银行，等等。四行二局是四大家族的大家库，但是，各个家族还有自己独立的小家库，经营自己家族更独立的事业，并不断用各种方法把大家库的财富转移为小家库的财富，而彼此有很大的竞争。四大家族在公开地位的背后，以私家名义独占金融的活动，采取了各种险恶和残酷的阴谋诡计，那简直是无穷无尽的。他们极端要保持这种活动的秘密，而且时常应用他们死党、亲戚或伙计或其他伪造的私家名义，进行活动，或经营所谓“商办”行号，特别是蒋家系统做得最为掩蔽。不过，俗语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蒋家朝廷统治下的地区，从来金融界所有的重重黑幕，谁都知道四大家族是其中的

主角。举些例子來說吧。

比如：关于公債的活動。一九三六年間，蔣政府准备發“統一公債”以掉換旧有各種公債債券，重行規訂利息，孔家當時就叫人散布烟幕，說是政府財政困難，掉換舊債的目的，就是要停止公債付息。人們相信了，買公債的投機家就都紛紛把公債拋出，而孔家則暗中叫人傾中央銀行的款項大事吸收，一時市場上公債價格慘跌，形成了金融界空前恐慌的局面，但孔家則于一出一入之間，得了三千萬元，而許多經營公債的人，都為之傾家蕩產，有陷于自杀的。比較近的材料，可以舉出本年（一九四六年）六月間上海公債市場的“崩潰”。這是宋家的拿手好戲。原來在日本投降之後，有人有計劃地故意散布戰前統一公債“优惠還本”的消息，說得活灵活現地，宋家當局對於這種謠風既不否認，也不駁斥，最初統一公債丙種從百元票面漲到三百余元，直到本年（一九四六年）四月間最高達到八千四百余元，超出票面八十余倍。到了六月初，“优惠還本”的消息还是很濃厚，自稱和當局極有關係的投機者，以六千元拋出大量現貨。但是，結果“优惠還本”的夢是落空了。朱子文最後發表了一個談話：“按票面價值償還戰前公債。”於是公債一致急劇下跌，造成了原先購戶的大破產，投機證券字號倒閉的達十多家。有的銀行（大亞銀行）也倒閉了，有些錢庄則出盤給孔家的揚子建業公司。據銀錢業估計：此次各行庄蒙受債股影響，損失達一千五百億元。誰在這公債大投機的陰謀詭計中又于一出一入之間，發了大財呢？這也是路人皆知的了。

再比如：關於外匯的活動。一九四〇年七月間，馬寅初先生一篇文章這樣說過：“有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几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灭其

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統制貿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謂統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統制。至于这几位大官大买其外汇之事实，中外人士，知之甚稔。”馬氏于此便引证了一位外国記者的話：“中国似乎有一部分投机家，有获得法币現貨的特別便利，这班人重庆政府是可以直接控制的。”^①說的是誰，当然大家很可以明白。至于要說这件事，当然可以回溯很多，不过举些手头的材料，也可以概括一切了。

材料之一：上海“大美周刊”一九三九年八月六日香港电：“上周平准会停止援助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沪某外籍經紀人，嘱购入英金四万鎊之巨額外汇。”^②那时“某重要部长”是誰呢？不用說就是孔祥熙了。他的夫人不用說就是号称“中国人民的錢袋”宋靄齡其人了。

材料之二：上海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載：“买卖外汇几集中于中国銀行，該行买卖外汇部門，每日所得汇水折合法币在二千亿元左右，至所卖外汇，期貨多于現貨，期貨外汇原应預付 50% 或 30%，但亦有凭特殊关系，可不付款而买到外汇期貨者。”^③所謂“特殊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当然是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

材料之三：香港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載：“……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的董事长也是陈立夫，今年三月外汇开放时，他曾用官价（二十元）預先买进美金外汇一百一十九万，发了一笔大財。”^④自命为道德透頂的“道德家”是有无数的发财道德的，这不过是他們这些道德中的小小的

① “馬寅初戰時經濟論文集”二百八十二頁。

② 見“新華日報”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社論。

③ 見該日上海“聯合晚報”。

④ 見該日香港“正報”。

一种，不算得什么的！

馬寅初氏对于“国民党員”（实即指四大家族）經過独占外汇之便，“以二千元法币換一元美金，而老百姓是要四五千多才可以換到一元”，曾經这样痛斥过：“这样的賺錢并不是本領，这些事情都是猪狗畜生做的！”^①但是，四大家族发财的本領，有那一类是比这更“高尚”、更“仁慈”的呢？

还再比如：黃金活动。有一个作家这样叙述过：“在黃金政策的幌子之下，翻云复雨，作浪兴風，又不知制造了多少暴富；这种暴富，惟有制造消息利用消息的权貴，才有十足把握。試想开战停战至于今日，一会儿宣布黃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卖；就是胜利以来，自由价格的平衡买卖，变为固定官价的平衡买卖；再又取消固定官价，停止平衡买卖；恢复自由价格的平衡买卖；每次变动前后，市場上总是謠言蜂起，作浪兴風，最后，謠言什九成为事实。則其內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②所謂“內幕”，就是四大家族为操纵者。他們既是黃金的壟斷者，看准何时可以采取那种“政策”发财，那种“政策”就搬到市場上来了。对于今年（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中央銀行黃金的买卖，上海一个小报曾經写道：四月二十九日“黃金市价突然飞漲，由上周每条一百六十万左右的黑市价格，驟然暴漲一百九十余万元，听其主要原因，由于中央銀行变更配貨官价所致，中行配价原为每条一百六十万，这一日忽提高八万，变为一百六十八万元。”原委何在呢？“中行抛出黃金，收回法币，岂不是要把国庫內的所有黃金都要卖光的嗎？事实并不尽然，虽然他們有时

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时代日报”。

② 張一凡：“經濟上扫蕩官僚資本”，“周報”三十六期。

大量抛出，有时却在陆续收进，不过一转手间，可能有些好处，譬如过去以一百六十万元之价收进八百六十六条黄金，现在以一百六十八万之价抛出，不是便可有六千九百二十八万元可以购进吗？”但要晓得，这也只是四大家族在黄金方面发财的“戏法”之一种啊！

高利贷活动当然是四大家族在金融上发财戏法的重要部分。为了获得这种封建的剥削，他们或组成各种银团，或由四联总处，进行各种贷款，至于各种贷款，利率之高，则与日俱进，战前月息的高利尚以厘计，现在四大家族官定的利率竟达月息五分上下，经过各种转手，最高达到九分。在这种金融王朝“官利”的影响下，市场月息达到十分以上。这是四大家族在利息史上的大创作了。

关于四大家族在金融上活动的若干戏法，就说到此为止。

总之：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的四大家族，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过的金融寡头，是以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劫夺为特点的金融寡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的特产。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这个四大家族的金融王朝，乃是出现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垂死、而人民的觉醒和解放力量将要代替旧的一切的时期，乃是代表一切反对人民而以吸血为生活的封建买办腐朽寄生虫的最后集合体。四大家族集合了一切封建式的、殖民地式的、法西斯式的野蛮发财方法之大成。强制，劫夺，欺骗，讹诈，……这些都是他们发财的拿手戏。他们有外国帝国主义者做后援，但他们在整个社会是极端孤立的，是和中国全社会作战。他们虽然集中了全国庞大无比的财富，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在实质上却是极其脆弱不堪的，很快地就会倒下来。

以下我們繼續說明四大家族這個金融王朝在商業、工業、農業、文化諸方面的獨占制度及其活動，而這一切方面都正是一致地貫穿着這個金融王朝之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性質，同時也正是一致地表現着其極端孤立、極端脆弱、極端腐朽而垂死的寄生的性質。

四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商业独占

一 四大家族商业独占的开端

蔣家法西斯軍事朝廷建立之后，中国国际貿易的入超就空前激增起来。如以一九一二年入超的指数为一百，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曾經增減不一，而以一九二一年指数增至二百九十七点二一为最高，但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指数的增加，其进度的迅速就远非北洋政府时代所能比拟；一九二八年指数为一百九十九点四七；一九二九年为二百四十三点八一；一九三〇年为四百零四点四九；一九三一年为五百一十点八五；一九三二年为五百四十二点六二^①。“国际貿易，虽年年大量入超，而金融組織并不因之寥落，不特不寥落，且有增長的趋势”^②。这点已充分說明了四大家族金融王朝統治之特点：强烈的商业买办性质。至于此后几年間入超指数之減低，亦正如以下所述：“入口貿易之衰落，即为我国人民购买力薄弱之表示。是以入超之減落，乃非由于輸出激增所致。”^③ 所謂人民购买力薄弱，无疑地是由于四大家族的极端黑暗的封建买办統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結合所造成的結果，而四大家族自身的商业活動，又恰是这种封建买办社会的最好說明。

抗日战争以前四大家族的商业活動，可看下列的例子。

① 一九三四年“申报年鉴”七百五十七頁。

② 許宝和：“中国近年之银行业”，“东方杂志”三十卷九号。

③ 一九三六年“申报年鉴”八百十二頁。

大家知道，四大家族的头子之一孔祥熙的“資产是以商业資本占大部分。他的原来的經濟堡垒是开设在天津的祥記商行，这个商行专门卖买匹头、顏料、煤油等等，分店在上海等大商埠設立。除此之外，还有七八个大商号，这些商号的招牌都有一个广字做冠首，如重庆林森路的广茂兴，便是一例”^①。这是孔家封建买办的商业独占的初步活动。四大家族的又一个头子宋子文則有了更大規模地囊括全国商业的活动，組織了极龐大的商业托拉斯。比如：宋子文一九三六年所經營并由他任董事长的中国棉业公司，資本原为五十万元，一九三七年春扩充为二百万元，到同年五月便又扩充到一千万元，扩充得很迅速，而它的业务規模，无疑地已是独占全国花、紗、布貿易的商业組織^②。（該公司在一九三六年买卖棉花总额达一千三百余万元，經銷紗布約五百万元，其他委托之业务約三百余万元，合共达二千余万元，按当时貨币，这已是很大的数字。）还有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間成立、也由宋子文任董事长的华南米业公司，資本一千万元，并有流动資金二千万元，这是运输洋米的大独占組織。在該公司成立之前两日，并由該公司董事之一吳铁城电請蔣政府准洋米免稅入口^③，于是，这个买办的大独占組織又得了买办的大特权。对于这种洋米免稅入口，当时各地“輿論嘵然”，又有商会通电反对，但是，买办家族只顾自己发财，又有蒋介石的軍事独裁做保鏽，也就顾不到这些了。还有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間成立的“国貨联营公司”，也是在宋家控制之下（宋子良是董事之一），企图“組織全国贩卖

① 鏡升：“論中国的官僚資本”原稿。

② 參考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及六月三日“申报”。

③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

网”，独占全国国货——不論是新式工业的、手工业的及各种土产品——的买卖。当然，在实际上，又正是企图独占外国货或伪装“国货”的洋货的买卖。据当时报载：“国货联营公司成立后，除积极充实上海、郑州、长沙、温州、镇江、福州、济南、西安、徐州、重庆、昆明、广州等十二处已成立之国货公司外，并将添設公司十七家……如下：南京、汉口、北平、天津、成都、贵阳、蒼梧、汕头、沙市、开封、阳曲、南昌、九江、蕪湖、昆明、杭州、鄞县。”宋家独占全国工农业物产和洋货买卖的野心，已充分暴露在这种計劃中。国民党的政权直接为宋家这种大商业托拉斯的后盾：“全国經濟建設总会和实业部分函各公务机关，謂現国货联营公司已成立，凡需用物品，均請向該公司尽量采购，以資提倡，如各地需要购貨者，只須通知該公司，即可派員前往接洽。”^① 正如在金融上的独占一样，四大家族在商业上的独占也依靠了政治的、軍事的强制力，而这“公函”不过是表現了小小的一端罢了。

二 商业投机的領头者和商业独占的組織网

在抗日战争中，四大家族更进一步地把金融的公开独占变为商业的公开独占。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以来银行家们的商业投机热。比如，据康永仁的調查：一九三九年終，渝市十五家銀行放款，商业放款在全部放款中占 89% 强，农工矿业放款仅占 0.1%。一九四〇年終，渝市二十六家銀錢业的商业放款增占全部放款总额的 96% 强，农工矿放款则不过占 3%。一九四一年終，渝三十六家銀錢业的商业放款占 89%，工矿两业占 7%。一九四二年三月下旬，渝市

①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大公报”。

六十家銀錢業的商業放款仍占總數 80%，工礦及交通等工業放款不過占 12%。這種商業投機熱的領頭者，不是別人，乃是四大家族和他們所屬的四行二局。正如下面調查所說：“即以四聯總處歷年貼放而論，也仍以商品押款為主，據有關方面報告，四聯總處核准的專案貼放，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起至一九三九年年底止，總額為五萬三千萬元，其中工礦業放款為三千萬元，僅占總額 5.64%。一九四〇年貼放總額為五萬六千萬，而工礦放款，僅占 19.33%，約一萬零九百萬元。一九四一年度該處的工礦貼放在絕對數上雖已增至二萬一千萬元，但在相對數的總數百分比方面，却反而降為 13.91%。又如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國家銀行’的工礦放款雖增至 38.65%，但為數不過只有三萬四千四百萬元，總計五年來該處專案貼放，每年余額共約三十五萬三千九百萬元，其中工礦貼放六萬九千九百萬元，僅占總數 19.76% 而已。從這裡可見戰時‘國家銀行’的業務動向。”^①就是說：蔣、宋、孔、陳的“國家”銀行的戰時業務主要動向，不是別的，乃是商業的投機。四大家族的“官”銀行是這樣，四大家族的“商”銀行當然亦更是這樣。比如孔祥熙有名的山西裕華銀行，有一個關於他這個銀行和重慶銀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放款的調查，商業放款就是占總放款中的 87.58%^②。這種商業投機的方法是詭計萬端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既有獨占的金融力量，又有軍事政治力量為支柱，有千絲萬縷的軍閥官僚特務等機關為線索，當然就更無孔不入，變化也莫可究詰，而在商業投機的

① 姜慶湘：“銀行信用與物價統制”，半月“文萃”二卷四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② 張與九：“抗戰以來四川之金融”，“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一期。

事业上取得了独占的地位。

抗日战争中四大家族独占商业的公开組織，大体說來，是“官”式的和“商”式的两种。官式的組織，首先如大家所知道的貿易委員會及其下的三大公司。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在蔣家軍事委員會之下設立了三个所謂“調整”委員會，其中之一便是“貿易調整委員會”，由“國庫”划撥基金二千万元。这是公开把全国貿易放在蔣家軍事系統直接控制之下。四大家族的商业独占活動因此更直接表現為軍事的商业独占的性质。一九三八年二月間，这个委員會改隶于財政部，稱為貿易委員會，它的下面有三大公司，即復興公司、富華公司、中國茶叶公司，獨占主要出口物如絲、茶、桐油、猪鬃的貿易。（另外主要的出口物，如錫、錦、錫、汞等矿产則歸資源委員會獨占。）復興和富華（富華公司于一九四二年合併于復興）的董事長都是孔祥熙，陳家（CC）系統則在中茶公司占有力量。蔣家朝廷对于这种商业的独占，有极严格的规定，比如，对于桐油，就規定：“凡在復興公司設有收貨机关之市場，其他任何机关商号或个人均不得收购或販运。”对于猪鬃，就規定：“所有全国各色猪鬃之收购运銷事宜，歸中央信托局統一辦理，”等等。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輸出困难，四大家族这种出口貿易就“轉移目標于內銷”，而独占的活動，也就“更不惜与民爭利”。此外，孔家系統下还有很大的“官”式商业独占組織，例如农本局的福生庄，就是獨占棉花、棉紗、棉布的买卖。

专卖制度是四大家族“官”式商业独占的一种发展。事实上，前面所說的三大公司和农本局福生庄对于各种物品买卖的独占，已是一种专卖和专卖的形式。一九四一年四月国民党八中全会決議創設专卖制度，这是肯定了四大家

族在商业上专卖专卖的存在，又是为着四大家族这种专卖制度开拓新的道路。

四大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商”式的商业独占組織，属于孔家的，例如重庆的祥記公司、庆記紗号、强华公司和大元公司。庆記紗号（該号和“官”式之福生庄可匹敌）操纵国民党区紗布的市場，强华公司統營运输和进出口貿易，大元公司則經營五金电料和汽車。此外重庆有名的恒义升是孔二小姐經營的。一位經濟研究者写道：“政治条件很便利他，逃稅一項是任何其他商人所不及的，所以这些公司的业务比一般商人好了不知多少倍。”^① 属于宋家系統或者是由宋家金融系統投資或者是和陈家金融系統共同投資的，例如：中国棉业貿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貨公司，四川畜产公司，四川絲业公司，西宁兴业公司，等等。属于陈家独自系統的，例如：有名的华华綢緞公司，“这个公司最賺錢，在成都和桂林都設有分公司，什么商品都囤积，且利用三地公司和分公司彼此之間的联系及自己的卡車，对于市場之操纵甚为灵活，所以，营业便蒸蒸日上”^②。此外，还有华建貿易行，棉花运銷公司，等等。

上述种种，都是四大家族“官”式或“商”式的公开商业独占組織。至于四行二局比較掩护的自立商号，则都沒有提到。“銀行或以資金直接作商业之投資，或以放款之方式貸于自設的商号，而这种商号的負責人大多由銀行重要职员自兼，于是銀行假借字号名义从事商业，字号即凭借銀行資金以从事商业活动，这不仅在商业银行中极为普遍，即在国家銀行（按：指四大家族的私行）或省地方銀行中不是鮮

① 鏡升：“論中國的官僚資本”原稿。

② 同上。

見的事”^①。在买办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国民党統治区，更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产业利潤落后于銀行利息，銀行利息又落后于商业利潤，銀行把資金拋到商业的投机中，可以瞬息万利，因此，不但銀行要投資于各种公开的商业組織，并有自立的商号，而且，銀行自身同时又变成商行，四行二局本身更是商行。关于这点，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大公報”社論就有以下的見解：“大家都在炒法币不回籠，其实就是回籠也被銀行轉移到投机的事业上去了。……这种情形不仅商業銀行有，就連‘國家銀行’（按：應讀为四大家族的私行）也不免，‘國家銀行’（應讀为四大家族的私行）有信托部，用二分以上高利吸收存款，这种資金当然投到商业投机上去。”^②关于四行直接經營商业投机的消息，報上照常是不可能登的；但例如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九日在參政會上，有一件关于中国农民銀行的提案，这末說过：“中国农民銀行違反本身事業，貸放大宗商業款項，影响市面。”又这末說过：“中国农民銀行运盐售油囤糧，……有營私舞弊嫌疑（嫌疑？）。”只此即可以概括一切了。此外，就是四行所投資的所謂各種“企业公司”，主要地也干的是买卖投資，例如，由中國、交、农三行占股份 68% 的貴州企业公司，就是这样。

所以，不管四大家族有各种形式的商业独占組織，有“官”式，也有“商”式，“官”式中又有許多形式，“商”式中又有更多的形式，但总的說来，四行和中央信托局本身在实际上就是四大家族最高的商业独占組織，而四聯總處主席蔣中正也便是这种商业独占組織的最高領袖，是一切大商业投机的公开的或背后的保护人。这四大家族拥有最龐大的

① 千家駒：“戰時金融動向之檢討”，“廣東省銀行季刊”三卷三期。

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大公報”社論。

金融力量的商业独占，不但有軍事的官僚的特务的机构直接保护，而且享有独占交通的特权，比如：电台的独占，铁路公路的优先权，以及軍委会下面的西南进出口物資运输總經理处（前身为宋子良的西南运输公司），中美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等等。这乃是中国有史以来剥削阶级最集中的公开商业独占。

三 买賤卖貴的野蠻掠奪

从前述看来，四大家族的“官”式或“商”式的封建、买办、軍事的商业独占，它們所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中国经济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经济，小农业和中小工业在生产中占主要的地位，特別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这种小生产者是极端分散的、孤立的，平日大商人就利用了他們这种弱点，进行各种地方性的商业壟斷，进行不等价的交换，买賤卖貴，残酷地剥削了他們。这正是封建的和殖民地的商业之特点。四大家族建立新的統治王朝之后，中国这种生产的根本情形并没有变更，而四大家族却变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商家，对于中国广大的小生产者以至民族工业的生产品，发生了极端残酷的独占的占有欲，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尽致，而其强制的盗窃的掠夺性，也为空前没有。

先看一看若干参政員的提案关于三大公司收购的官价与市价的比較。例如絲，参政員們写道：“該会（按：指貿易委员会）規定收购的官价，托名鼓励外銷，实际比較內銷市价之距离，年大一年，試以秋蚕論，每担官价比市价，一九三八年差三百元，一九三九年差一千五百八十元，一九四〇年差二千零五十元，一九四一年差五千元，一九四二年差八千五

百元，……一九四三年降为六千元。”例如桐油，參政員們寫道：“該公司（按：指復興公司）所定桐油價與市價相差，一九四二年每担為一百元，一九四三年差至一千一百余元。”^①

參政員們的提案沒有說到茶叶收购的官價。我們可以從其他方面的材料，來比較一下茶叶收购的官價與生產成本：“……毛茶中心山價之規定低於實際生產成本。如一九四〇年度屯綠生產成本據調查所得為六十一元零五分，而同年屯綠毛茶山價規定最低價四十四元，中心價五十五元，最高價六十六元；同年婺綠生產成本據調查為六十九元七角，而毛茶山價規定為六十元八角四分；一九四一年度屯綠毛茶生產成本，據調查祁門四大名家結果為一百一十八元二角二分，而一九四一年度屯綠區毛茶山價規定最高為一百零五元，中心為八十五元，最低為六十八元；婺源茶區一九四一年度毛茶生產成本，據調查，一為八十八元三角三分，一為一百三十元六角，而毛茶山價規定為九十元。”^②（按：這個材料關於生產成本的可靠性，是很可疑的。同一作者又這末寫過：“調查成本者，往往忽視農家家庭勞力，認為不須計值，故其準確性頗可懷疑。如婺源茶區一九四一年毛茶生產成本據調查一為八十八元三角三分，一為一百三十元六角，相差可達四十元之巨。”這種調查的不可靠性，只是足以說明官價對於生產成本還有更大的距離。以下關於各種官價與農產物生產成本的例子，同樣可以參考這個說明）。另一個關於茶價的材料，是一九四二年湖南安化的

① 黃炎培等在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上關於“重訂國際貿易政策並調整貿易委員會組織案”提案。

② 甘知水：“變更茶叶收購方式及調整箱茶收購辦法建議”，“中國農民”三卷一、二期。

調查：“茶农采制紅毛茶一市担，所需成本一百五十元五角，行佣及捐稅尚在外，今年所規定湘紅毛茶中心山价仅为一百元。”^①

关于猪鬃，手头有个一九四四年的材料：“每箱官价比实际成本差一万九千元，为实际成本的38%。”^②

在蔣家朝廷“花紗布管制”下，棉花的官价与实际成本之差，例如：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陝棉核价一千二百六十元，到一九四三年四月据估計，每市担須提高至三千元，始足棉农成本，此时核价为实际成本42%。一九四三年棉花核价六千元，到一九四四年八、九月成本已达一万五千元，此时核价为实际成本40%。一九四四年六月，各地棉花市价多在一万五六千元以上，川北則每担二万余元，若干地方当局曾“請將棉价略予提高，以利农民”，均未获准。一九四五年三月間核价每担一万余元，而豫鄂湘接近淪陷区之花价，每担达三万余元，核价仅占其33%。

在食糖专卖之后，甘蔗则变成了这样的情况：“干柴一斤值二元几角，甘蔗一斤才值六角几分。”^③

你們看！四大家族是这样蛮橫地掠夺了农民的生产品！現在再看看他們对于民族工业的掠夺吧！

棉紗的独占买卖开始于一九四二年二月重庆附近各大紗厂。据該年九月間豫丰、裕华、申新、沙市四紗厂招待記者所称：当时一包棉紗成本需一万三千元，而官价却只八千五百八十元^④。此后相差就越来越大。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① 郑兆崧：“安化茶农之經濟概況”，“中農月刊”四卷十一期。

② 邓力群：“論国民党外銷特產統購統銷政策”。

③ 李忠义：“內江的蔗业和蔗农”，“現代农民”七卷五期。

④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中央社。

間柳州韶关桂林一带二十支紗价每件徘徊于十八九万元，而重庆的官价只有一万九千元，只及自由市場的十分之一”^①。一般說來，軍需署收購厂紗，其价格比物資局的核价还低，如一九四二年九月物資局的棉紗收購核价是每件八千五百八十元，而軍紗收价每件只有五千三百元，即比核价还低三千二百八十元。

花紗布管制局下的布厂，例如：在实行“以花換紗、以紗換布”之后，一九四四年一、二月每匹核給的工繳（如职工伙食工資、机器折旧、杂費三部分）为四百二十元，实际所需为七百二十元，二者相差三百元，待至四月一日調整为五百四十元，实际所需又已提高。軍需署管制下的布厂核定的工繳比此更低，例如：六十四个布厂启事所述：一九四四年“一月份至三月份每匹工繳为二百二十元，四月份至五月份为三百二十元，六月份为四百元，八月十六日起始改至四百八十元”。“單就重庆区而論，每月織出軍布二万五千匹計，每匹实际亏折四百七十元零七角，合計每月亏折全数为一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五百元之多，此种待遇不改，则一年之内厂商等亏折血本将达一万万四千一百一十三万八千元之巨”。

在四大家族专卖的制度之下，关于食盐，例如一九四四年三月四川自流井盐的收購价格每斤仅为八元，若以該年三月十一日物价之指数为标准，则每斤盐收購之价格最低需二十元。即收購价格只及实际成本的40%或45%。在蓬溪，盐产商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向重庆請願时称：收購价格只及成本30%。

① 張錫昌：“如何挽救工业生产”，“中国工业”二十三期。

关于食糖，例如：一九四三年六月間，在川康区专卖机关核定的收购价格（以每万斤計）白糖十四万四千元，仅及成本十八万六千零四十三元的77%，桔糖六万零三百元，仅及成本八万六千零八十元的70%，糖蜜三万四千八百元，仅及成本五万零八百三十二元的66%^①。

至于出口的矿产，例如錫，据一九四四年三月間报載：每吨錫的成本約需五十万元，而規定的收价只有十一万元，仅及成本20%。

四大家族的商业独占是这样的买賤，但出卖呢？那就完全是另一件事了。为避免煩瑣起見，这里也不列举得很多。例如：以下关于一九四五年間花紗布管制的报道：“由花至紗，每件紗織布四十匹，应需工繳成本和利潤三十余万元，而管制局仅費十余万元即可得布四十四半，售价三十余万元，最近竟售八十余万元，每件紗由花至布剝削生产者，达二十至六十万元，于管制之两年期中，除運費二十余亿元，犹盈余达一百五十亿元以上。”^②事实上，一切物品一旦落入四大家族的“官”或“商”之手，便立刻高漲起来。在实行专卖制度之后，专卖品即領導了物价的上漲，一方面专卖品漲价之速度更快于其他非专卖品，另方面专卖品之上漲一定比其他物品搶在前头。一九四三年底桂林“大公報”社論“論专卖”就这末写过：“拿眼前的例子，桂林食盐價格当五六月間为每市斤七元七角，八月漲为十二元，十月复增为十五元，十一月更增为二十六元，半年之内，增价三倍，……遂令

① 前面材料，大部采用自邓力群：“花紗布管制”，“国民党专卖政策”諸文所集。

② 土布业同业公会：“怎样增产花紗布”，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商务日报”。

人有专卖价格领导一般物价上涨之感。”而这种涨价的利益，制造专卖品的厂家或者完全不能得到，或者只得了一点（比如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绝大部分都落在四大家族商业独占组织里面去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四大家族在商业上当然同样把这个哲学发挥得尽致，又更加诡计百出。例如：一九四三年，“委员长”手令全国自一月十五日起施全面限价，但是，不早不晚，正是一月十四日，孔家财政部正式公布食糖涨 60%，从原价每万公斤十七万六千元突涨至二十二万二千元（据糖商称，此价超过当时黑市行情之二十二万元）。那时，某专卖当局以数百万巨金，秘密囤积大批食糖，就以一转手之间，得了 60% 的利益。四大家族的商业独占既拥有集中的商品，只有他们能够操纵物价，因此，他们是黑市的真正操纵者，他们所控制的物品“一入市场，转瞬之间即成黑市”^①。“公卖店实为黑市之主要产地”。他们独占了公开市场，也独占了黑市场，并转而使黑市场的价格变成了公开市场的价格，如此循环不绝，物价就上涨不绝，而四大家族独占的商业利润也就上涨不绝。

四大家族在商业独占中所获得的独占的商业利润，是很庞大而不容易估计的。关于“官”式的商业独占，举例来说，据一九四二年九月蒋政府行政院向参政会报告：食盐自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起实施专卖，至八月底止，共收七亿一千一百六十五万余元，较已往各年同期收入，几及九倍。食糖自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实施专卖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川康区收入为五千三百九十二万余元。火柴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实施专卖至六月底止，收入为一百零九万余元。烟

① 土布业同业公会：“怎样看产花纱布”，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商务日报”。

专卖利益一九四二年度估計可收入一亿二千万元。但是，这只是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國庫”收入，也即是蔣、宋、孔、陳的大家庫收入，除此而外，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还各有自己的小家庫。桂林“大公報”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的社論寫過：“今日专卖机关和税务机关之收入，归國庫者仅十分之一二，飽入私囊者約十分之八九。”在归入四大家族的大家庫之前，事实上已不知有多少归入四大家族的小家庫，而在归入四大家族的大家庫之后，当然又在各种形式之下轉入四大家族的小家庫。這是說四大家族“官”式的商业独占的利潤，至于四大家族“商”式的商业独占的利潤，那当然就更難知道了。

四大家族的商业独占，同时又增加了外汇独占的利益，这也即是四大家族买办独占的利益。三大公司独占出口貿易，当然所有外汇都落入四大家族的手里。除此之外，商人把所得的外汇卖給四大家族的銀行，其出售外汇率和外汇的实际汇率始終有着很大差額，即前者被迫得比后者低，而这种差額的获得者，实际上也即是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这种种商业独占，一手在“买”方面，不但是掠夺了农民、手工业者、民族工业家应得的利益，而且大量地掠夺了农业和工业直接的生产者应得的生活費或工資；一手在“卖”方面，又掠夺了全社会的消費者。此外，还有許多的直接軍事掠奪。这就对于农工业的生产，給了极可怕的絞杀！凡是四大家族的管制所及，該項生产就无例外地馬上要受絞杀。例如，在參政員們的提案中关于絲这末写道：“自該会开始統制外銷，产量即因之大減，現时川絲产量，不及战前半数矣。”关于桐油，又这末写道：“乡間有自砍桐樹者，有投桐子于糞坑，令其自腐以充肥料者。”

在管制之后，国民党区的棉花减产有如下表：

省 别	1936年	1943年	1944年
陕 西	1,100(千市担)	900(千市担)	500(千市担)
河 南	2,400(千市担)	500(千市担)	200(千市担)
湖 南	400(千市担)	450(千市担)	200(千市担)
湖 北	2,800(千市担)	500(千市担)	250(千市担)
四 川	800(千市担)	400(千市担)	300(千市担)
其 他	—	200(千市担)	100(千市担)
合 计	7,500(千市担)	2,950(千市担)	1,550(千市担)

四川沱江流域甘蔗之产量，一九四三年较一九四一年减少30%左右。一九四四年蒋家四川省主席张群由成都坐车到重庆，蔗农们把蔗割掉放在路上，阻止张群前进，表示蒋政府将蔗价抑制过低，已不能维持生产。

工矿业的情况又怎样呢？

例如纱厂：在一九四二年开工纱锭为所有纱锭74.7%，到了一九四三年年底，“各厂纱锭已减少很多。”各纱厂的生产能力本来“每月平均可产纱四千余件，唯目前，只产纱三千余件”。一九四四年，据调查，平均每月实际生产量所占可能生产量的百分比，裕华纱厂为66%，申新第四纺织公司蓉厂为33%。重庆全市开工纱锭比一九四三年减少23%①。

例如布厂：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重庆“新华日报”载：“重庆承织军服布的厂商有一百多家，现歇业的据说有80%。直接间接失业的工人将达两万多人。”其他经济刊物又载有：“壁山二十二家织布厂，承织军用，军政部军需署所定工资与物价比例，悬殊过大，且所发纱量纱质甚差，乃致产量锐减。”“昆明原有织厂三十余所，在一九四三年一年

① 见邓力群：“花纱布管制政策述评”所集材料。

中，倒闭了二十余家。”

火柴厂在四大家族实行“管制”后，就是小厂停工，大厂减量。在贵阳，专卖一实行，火柴厂十家就马上倒闭了三家。广西火柴厂过去每天能产八十箱，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份就减为二十箱，九月份就减为十七箱……

烟厂，举福建龙岩的例子就够了，在四大家族实行专卖前，全县烟厂四十家左右，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只存了九家。

关于矿业，例如云南箇旧錫矿，据一九四四年一月間的报道，已是衰落得很悲惨了：“往昔在城东炼錫的大炉，共达四十左右，今天能維持开炉，照常炼錫的，则不到十个；往昔矿工人数已达十余万，今天仅五千余；民国二十七年，計年产錫一万零七百三十吨，至今年上半年，则共仅八百吨。……箇旧大錫生产已临总崩溃前夕，各私家厂商，95%已宣告破产或停业……。”^①

又例如煤矿：四川泯江煤业在一九三九年接受四大家族的管制之前，全区同业大小矿达二百余家，月产七万吨，管制以后，“煤商痛苦万分，不堪忍耐而停业的很多，尤以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之間停业者达五十余家，占全数四分之一，到三十四年春，只存大矿七十余家，月产不过三万五千吨”^②。

四大家族这种商业独占，也同样地摧残了普通正常的中小商业。在花紗布管制施行初期和专卖制度开始之后不久，中小商业的情形已如下述：

“囤积商游击商以至于一部分特权商人，他們是恶性膨胀下的天之驕子，一切工商利潤以及消費者的貨

① 范式之：“感慨过箇旧”，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商务日报”。

②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商务日报”。

币都白白地向他們的荷包滾來。最近兩年來，產業的發展停滯了，不少的工業資本轉化為商業資本，商業資本又轉化為囤積資本，原因是商業利潤高過於工業利潤，而囤積的利潤又高過於行銷商的利潤。正正當當的企業家和技術專家都逐漸消瘦了，而官僚奸商都迅速地肥壯起來，不過正當的中小商人都並不在幸運之列。中小商人的資本有限，他要靠迅速的周轉來維持其開支和生活，因此他不能等待機會，或造就機會，他只能求得市場的一般利潤，但以今日运输之困難，稅捐之繁重，20—30%之一般利潤，在市值不斷下跌的情況下是無多大實利可得的，而且今日後方的各重要都市，財富在不斷的集中，大戶吞吃小戶，游击商吞吃正當商，商品愈囤愈貴則市場購買力愈趨薄弱，於是小戶以及中小商人要想脫售其商品，就只有逐漸向大戶低首而慘遭殺價的命運。”^①

到了抗日戰爭中更後一個時期，四大家族管制更緊，中小商也就更加衰落和更多地走上破產的道路。

四 和敵人利益聯繫在一起的武裝走私

四大封建買辦家族有無窮無盡填不滿的貪腹，而對待人民的态度，比對待牛馬的态度都不如，因此，在他們那裡，並沒有什麼民族的敵人，而抗日戰爭中的走私，也就成為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及其爪牙一種主要的商業活動，即一方面替敵人行銷商品到內地來，另方面把所集中起來的人民的物品輸送到敵人那邊去，而從中取利。有一位經濟研究

^① 千家駒等“論當前物價問題”，“文化雜誌”二卷四號，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者这末叙述了其发展历史：

“战争（抗日战争）发生以后，沿海通商口岸沦陷，国内外市场隔绝，官僚资本仍有一部分留于沦陷区，公开地或秘密地和敌伪串通合作。……

“战时的走私须具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在敌占领区有经济据点，第二是在‘自由区’（按：指国民党统治区）有军政的掩护和便利，这两个条件除官僚资本而外，一般的民间资本是二者不可得其一的，因此通过战线的走私的买卖，逐渐为官僚资本所独占，他们有电台，他们直接向香港上海定货，有银行和商号代为付款，有独占的交通工具为之运输，更有特殊的武装势力为之保护。当时政府表面上以争取物资为借口，并且限制一切重要的农矿原料出口，可是这些限制非但没有妨碍官僚资本，而且大大地帮助了官僚资本，因为所谓限制，即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最初官僚资本做这些非法买卖还是偷偷摸摸的，到后来就索性公开保护，一切对敌物品如粮食、棉花、木材、矿砂等等军需品，也都装在轮只卡车上，并插上皇皇大旗，千里输送，如入无人之境。

“战时的走私，非特具有超额的商业利润，并且因官僚资本垄断了交通和金融机构，还产生了独占利润，抗战最初几年的外汇基金，除了一部分为敌伪所套购而外，大部分是为官僚资本所攫去。官僚资本在外汇的窃取上既获得厚利，复以之调剂敌我物资，互通有无，这里的生意，真是本大利宽。”^①

① 狄超白：“中国官僚资本的发展道路（上）”，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文汇报”。

这种“有权要人物为背景”^① 的武装走私，在抗日战争中已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是买办的武装，实行武装的买办。在国民党统治区，四大家族是唯一的“权要人物”和集中的官僚资本，主要的武装和交通又在他们的手里，只有他们和他们的爪牙才能成为这种武装“走私”的主要幕后人物，也只有他们和他们的爪牙才能是这种武装“走私”的利益的主要垄断者（不管在四大家族之中是谁得的多些），而这种“走私”，恰又是把他们的利益和敌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并以此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破坏。

五 劫收之后，心更狠了

日寇投降之后，四大家族便以反人民的内战为手段，接受了日寇掠夺中国人民的一切商业的遗产：日寇所掠得的庞大物资及其贸易公司和商行是一方面，日寇掠夺中国人民的方法又是一方面，而后者简直是完全青出于蓝了。

“日寇准备长期战争，频频向内地搜括物资，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就上海一市而论，大小数千仓库，个个堆积如山，无所不备。一切的一切，都是日寇以最低价格，用强迫手段，从人民手中劫夺而来”^②。据蒋家朝廷公开的数字，苏、浙、皖区所接受的敌产总值为“一万亿元以上”，全国合计不下“四万亿元”^③。其中很大一部分即是所谓“物资”，蒋家朝廷公开的这种数字当然不会是真实的；实际上各种“公”“私”的劫搜，数字是很难估计的。这许多都是人民的

① 言见“东南日报”短评，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② 张伯伯：“全国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文汇报”。

③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上海“大公报”社评。

血和汗，但却由日寇之手变成四大家族及其系統下人物的私家財貨，并作为四大家族在“收復区”建立龐大商业独占的物质基础。

四大家族及其系統下的人物不但公开的以暴力霸占了日寇所已掠夺集中起来的物資，以作为他們的商业“胜利財”，而且繼續直接掠夺日寇还没有掠夺到手的淪陷区民間保存的物資，以作为他們的商业“胜利財”。例如一个作家所写：

“胜利以后，人心振兴之至，物价立刻暴跌，官僚資本家却发起愁来，他們所囤积的物資，所搜集的黃金和美鈔，难道竟听任其价格跌落下去嗎？……他們用尽种种的方法，以挽救物价的下跌。他們要它們上漲，要它們上漲，上漲，上漲！于是利用了一切力量，利用了一切游离資金，坐了第一批飞机到上海来，尽量地收购种种的物資。據說，單就布匹一項而論，他們是不論价而购入的，只要有貨，无论多少都全部收购。他們用了十几万万的法币，完成了使上海布匹价格抬高的工作，上海的布匹一高，貨物一缺少，重庆的布价也跟着高涨起来，于是他們囤积着的布匹便不至跌价了。”^①

四大家族对于人民物資更殘酷的掠夺，是一个法币对两百个偽币。这对于四大家族的商业掠夺和商业独占，简直有无限的利益。敌偽所发的偽币，无異于給四大家族在金融上发财和在商业上发财准备了一种更方便的新道路。一个商店老板曾經叹息說：“人民好苦呵，两百对一，使他們辛苦的积蓄化为烏有。”^②一个平日为蔣政府辩护的報紙也

① 郑振鐸：“論官僚資本”，“集約”五期。

② 張鴻增：“休說重庆來”，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因此不得不一度“为江浙人民呼籲”了，“……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如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大家不得聊生。他們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他們仍然过着胜利的日子，却有很多很多人發現了自己破了产。……这变化太大了，人人从日常生活中都切肤的感到这变化。这变化是什么呢？是随胜利而来的財富大轉移。用封条作符号的财产轉移，那是有形的，而且是有限的；而无形的无限的是用伪币的人的財富轉移到用关金法币的人的手里，购买力和享受欲都跑到关金法币这一边来。……这群人，怀挾关金法币的利器，才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所以致此的一个大原因，是一与二百的币价比价……实际就是贬低了江浙人民的財产，因为是大大的贬低，几乎近于沒收。”^①实际上，这也就使得原来淪陷区民間的物資財富，在日寇投降之后，以近乎沒收的形式，大踏步地更集中到四大家族及其系統下的人物手里。他們囤积的东西因此更多，他們在商业独占上的地位因此更强大了。

四大家族及其爪牙在重庆所实施的商业独占的各种法宝，当然也尽量地实施到“收復区”来。例如，四大家族的专卖制度在台灣是頂頂有名的：“长官公署以雷霆万鈞的努力，先后恢复了食糖、食盐、烟类的专卖局。这像一副牢固桎梏，紧縛住台灣民众的手和脚，使他們一点也动彈不得。所謂‘专卖’的勾当，原来是将民間的糖、盐、烟贱价收买，然后运出省外，高价出卖牟利。这全是以政治的高压手段，来发展官僚資本和买办資本。……这簡直是日本法西斯統治

①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公报”社評。

的繼續。”^① 事实上，日本投降之后，在国民党統治下的一切地区，人民所受四大家族封建的軍事的商业独占的强制掠夺，血泪都更加无穷无尽。四大家族商业系統收购的价格，可以絲茶为例：今年中国蚕絲公司（这主要的是在宋家控制之下）規定茧价每担十万元，比成本十五万元要少五万，而实际收价却又在七万元以下，即是說，还不到成本的一半^②。再例如：茶价以前每担等于三担米价，而在一九四六年收购时仅等于担半米。……^③ 至于其出卖的价格，可就以台灣的糖业为例：台灣糖业公司（这主要的也是在宋家控制之下）是于今年（一九四六年）五月間成立的，該公司成立后即大量以极低价格收购台糖，轉銷上海，四月底上海糖价每市担是五万余元，六月中旬該公司开价为七万三千元，到月底已升至十二万三千元，而該公司的“成本”連运费不过五万元。所有这些买进卖出的例子，試和前述抗日战争中的例子一比，也便就告訴了我們：四大家族虽然在日本投降后更加暴富，但是沒有稍为仁慈些。他們是更驕橫了。他們在商业上的掠夺比抗日战争时期更大量，他們窃盜的心更狠了。

上海粮貸案是著名（“大公報”所謂“駭人听聞”）的狠心事件之一。原来蔣政府于今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发出所謂“粮貸”十亿元，事实上這也就是四大家族的官庫貸給孔、宋家系的商庫。孔家的长江公司便是受貸的主要公司之一。“粮貸放出之后，米价由三万元跳到六万三千元，三泰米店和长江公司还不滿意，于是施展其硬抬米价的手段，在米市場中間，糙米卖主只要五万一千元一担，他們却硬以五

① 楊風：“接收半年后的台灣”，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文汇报”。

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新聞報”社論。

③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工商导报”。

万五千元买进，一定要使大米打破六万三千元的大关”^①。四大家族中的陈家沒有分到利益，于是外揚了一番家丑。其实，这不过是千个万个的商业黑幕之一，而且对于四大家族說来，也不过是一件小小的事！

六 美国貨的总买办

在商业上对于国民經濟实行更致命摧殘的又一方面，乃是四大家族当了美国貨的总买办。

关于美国在中国的商业企图及其活动，可以引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新群众”杂志的一段話：

“我們（指美国）政府为了我們貪婪的帝国主义分子，而执行那些丑恶的任务。他們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分崩离析的、被削弱的、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样就可以完成美国托拉斯如美孚煤油公司等等的命令了。須知前任駐华大使赫尔利本人就是一个大油商啊！我們的政府是为了在战争中暴富的銀行家和工业家而服务，为他們从事世界各部分之管理和統治。他們需要管理中国，为了这个目的，美国首先扩張它的对华输出（在战前，美国对华输出，只占它的总輸出額 2.5% 左右，現在計劃扩張到 20%）。目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大战甫告結束，海上运输方在开始，美国貨已如排山倒海一样地运往中国，甚至还有采取公然走私的横暴手段……。”^②

战前美国输出最多的国家是英國和加拿大，例如：一九三六年对英输出占总输出为 17.9%，对加拿大占总輸

① 王新命：“崩溃中的上海”，“中央周刊”八卷二十二期。

② 此段轉引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小时报”。

出为 15.7%，都不到 20%。战后美国准备对华输出占总输出的 20%（虽则不问在四大家族的封建买办制度的重重压迫下，中国究竟有多少购买力），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說，要把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变成美国帝国主义主要的海外市场，即主要的殖民地。近代中国曾經是各帝国主义共同的半殖民地，“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当中国人民把日寇打出之后，美国帝国主义利用了其所謂“盟国”的地位，利用了四大家族依靠外援以进行反革命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就企图乘便把中国变成美国独占的殖民地。这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主要的政策之一，也即是二次大战后世界时局或远东时局的特点之一。四大家族的統治成为美国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柱，并直接結合政治买办和經濟买办于一身。美国帝国主义經過四大家族之手，已在中国取得了独占的专卖权。“目下所到之外貨，十九系来自美国”^①。

美貨在中国独占的专卖，采取了以下三种主要的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美商經過蔣家朝廷——四大家族頒布的“新公司法”，直接开商业公司。今年七月間報載：“美商公司商号近多在沪開設分支店，据調查所得，設立者已达一百十五处，其中由美国总公司分設者四十处，委托設立代办所者七十五处，大部分均系經營进出口业务。”“若干家和中国政府及中国商家取有联系。”

第二种形式，是美国人与四大家族及其他买办合办商业公司，但实际上以美国人为主体，例如正在組織中、而以美国的流氓强盜——所謂“飞虎將軍”美国人陈納德为著名发起人的“中美实业公司”。大家知道：蔣宋美齡是蔣家朝

①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新聞報”。

廷航空委員會的負責人，原來陳納德的飛虎隊是和宋美齡合作的，這個“中美人士合辦的公司”，實際上不過是陳納德和蔣宋美齡合辦的公司。“據營業大綱所示，可知該公司業務，全以陳納德空運隊及陳納德將軍公司為骨幹。該公司總公司設于上海，并在南京漢口長沙蕪湖九江衡陽各地設立分公司，自備輪船卡車運輸往來于上述各區域，并和陳納德將軍空運隊互相聯繫。美國所需我國出口物資如絲、茶、豬鬃、毛骨、桐油、湘綢等，統由陳納德公司委託該公司代辦。我國所需美國進口物資如機械、藥品、化學原料及一切生活用品等統由陳納德公司采辦，委託該公司全權代銷，并得由陳納德公司出面向我國廠家賒款”^①。這簡直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商業托拉斯，而且是直接由美國軍閥統治中國經濟的大商業托拉斯，它一方面要獨占美國貨的輸入，一方面又要獨占中國貨的輸出。日本投降之後，原來貿易委員會及三大公司的獨占業務交給了中央信托局，而中信局實際上是在蔣宋美齡的操縱下面，由上述可見，中央信托局那種獨占業務也轉給了這“中美混血”的“中美實業公司”了。

第三種形式，是四大家族自己開商業公司。馬寅初氏六月間在上海大同大學演講過：“像現在的國際貿易，都被三大官僚資本的貿易公司包辦了去，一個叫揚子公司是孔家班的，一個叫金山公司是宋子文的，一家叫立達公司也是他們的。”^②“揚子建業公司”的董事長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資本五億美元（已有人說過堪與外國托拉斯比“美”了），該公司已向十六家美國名廠訂有總經售之合同^③。除了馬

①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聯合晚報”。

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正言報”。

③ 見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昆明“新報”，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商務日報”。

氏前面举出的这几个公司之外，其他著名的，如孔家的长江公司，宋家的（宋子良办的）中国进出口貿易公司，和孔、宋有密切关系的（虞洽卿儿子办的）阜中貿易公司，陈氏家族则有陈其采等的太平兴业公司。四大家族这种买办公司在經濟上有如下的独占优越条件：第一，他們有大批外汇存放美国，只要向美国打一电报，就可成交；第二，可以随时取得中央銀行外汇的大量供給；第三，利用运输工具，如宋家利用招商局船运，最近又在蔣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之下成立了水运大队，包括二、三十万吨的船只，作为运送美貨至内地倾銷的工具；第四，他們訂购量大，美商多願和他們来往。

这三种营业形式的本质是一个，就是美国帝国主义透過四大家族把中國變成独占的市場。

四大家族对于美貨运进，从許多方面开門：第一方面是武装走私，第二方面是放棄保护关税，第三方面是低汇率，第四方面是內河通商，出卖航行权。美貨从这些方面像排山倒海一样涌进中国，并深入了内地。

据报載海关統計：自日本投降后至今年（一九四六年）五月，已运抵上海报关的美貨數值在美金七亿元以上，其他在駛华途中及各商行向美訂购之物資尚不在内。近代中國自从变成半殖民地以来，沒有过这样惊人的、急驟的、压倒一切的入超，这說明了四大买办家族的买办能力远远地超过了从来一切的买办，而他們在前一时期的买办能力和現在的“进步”看来，也真像小巫見大巫了。但这还只是一方面而已。正如一个報紙所說：“近來貨物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单靠海关的統計是无法計算的。我們知道无论在海船上、軍舰上、飞机上都可以走私大批的貨物。軍舰和飞机，海关是无从检查的，这些軍舰飞机，事实上成了外国貨的走

私队。”同一報紙指出：本年前五个月江海关进口总值，“比实际的数目字至少还差二三倍”^①。一个報紙关于广州的情形写道：“充斥市場的美国貨差不多90%以上是走私入来的。”^②还有一个報紙的上海通訊說：“上海現在已成为走私者的天下。……主要的还是船只和兵舰的自由停泊航行的問題。……兵舰商船的‘私貨’没有办法檢查，而黃牛党徒之多之广，以及海关緝私人員的舞弊，統括起来，就更造成走私的全面胜利。……楊树浦走私的情形最凶，和抗战前日本人的走私，实有过而无不及。”^③所有这些，即使是一些平日拥护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和四大买办家族卖國政策的報紙也都无法掩盖。从武装走私的美貨比起經過海关的美貨至少更多二三倍，或90%以上是走私貨这种情况看来，事实更十分明确：美国在华的武装力量已成为推进美貨的直接力量。美国商业已是具有极端軍國主义化的性质。但这种美貨的武装走私，不只是美国帝国主义特殊的利益，同样地也是四大买办家族直接的利益，因为这种走私的貨物，大量是要落在四大家族的壟斷的买办公司里面，也正如一些報紙所写：“揚子貿易公司和金山貿易公司……透过种种我們想不到的妙法，神不知、鬼不覺的把洋貨运进来，凡是趋附它們的投机商人，还可以占得一些小惠，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④“非必需品及奢侈品仍不斷涌进，神通广大，雄視市場，幕后显有权威之大官僚資本和大买办資本在操纵左右，凡营进出口者，只要和某长或貿易公司拉上关系，则

① 北平“益世报”，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社論。

②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商务日报”。

③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北平“世界日报”。

④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商务日报”社論。

任何物品也能进口，此事已尽人皆知，但又无可如何云”^①。

这样，在四大家族統治的旧中国市場上，就变成了“无貨不美”和“有美皆备”。中国沒有的东西当然进来，中国本有的东西也滾滾进来。中国是产棉的农业国家，但在四大买办家族統治下，美棉却成了进口的大宗貨物。花旗橘子在上海滿天飞，連四川的广柑都休想問津。“在公家的茶會上，居然也出現了美国花生米”。至于工业品呢？那更当然是：“國內有出品，并且有存貨，但它还是向美国去买。”^②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四大家族說来，这“是一本数利的买卖。譬如，从美国运到的一吨白報紙，本錢只有一百二十几元的美金，但其卖价却是七百元美金，就是一本数利的显例”^③。

美貨比起中国貨来，被叫做“价廉物美”。“四川广柑在产地卖八九百元一只，而美国橘子在南京街上不过三四百元”^④。“美国汽油在沪售价不过七百元一加侖，而南京的开水每加侖也得化用此数。美煤七万一千吨，而国产煤却要十三万”^⑤。諸如此类，等等。按照一个工业家的談話，乃是：“外貨以百分之八十机器，百分之二十人力生产的成品，来冲銷中国工业百分之二十机器，百分之八十人力生产的成品。”^⑥再加上前述四大买办家族的大开种种方便之門，中国便只得成为美貨的大傾銷的市場了。在这种場合，一方面，美国大資本家可以把貨物提高价格出卖給中国，以获取額外利潤，而比起中国貨当然还是很便宜的，另方面，买

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工商导报”。

② 吳蘊初語，“經濟周報”二卷十八期。

③ 王新命：“崩潰中的上海”，“中央周刊”八卷二十二期。

④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小时報”。

⑤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工商导报”。

⑥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工商导报”。

办家族們經手出卖的时候，又可以再提高价格，以求达到“一本数利”，而比起中国貨也仍然是便宜得多，因此，任何工农业品的國貨，都不能够和美貨竞争。

“曾經听到一位有名的經濟专家說，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咽喉，完全給勒在进口貨的手中，假若你有机会到海关去調查調查，你若发现那种貨物大量进口了，那么你就可以大胆的断定，生产那种貨物的我国工厂已被判定死刑了。譬如說，今年三月份化学药品到的特別多，因此，在三月中，我国的化学工业大受打击，甚至有好几家支持不下去，关门大吉！”^① 事实上，各民族工业在美貨面前，关门的已关了，未关的也都在奄奄待毙，某些农业商品也已同样在陷于不幸的命运。一个美国人（名叫裴斐）也这末承认过：“这种美貨傾銷，将使中国工业永不能翻身。”在四大家族統治下的中国，本已民穷財尽，目前人民的膏血大量地外流，工农业生产衰歇，民当然更穷，財当然更尽，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美貨的銷路当然会要遇到中国民穷財尽的抵制。这里只說經濟。本来經濟的侵略是和政治的侵略結合在一起，并以政治的侵略为前驅。政治的侵略是為經濟的侵略，其本身要激起政治的反抗，而經濟的侵略又必然会加强政治的抵制，那是有历史为证的。

一个作者在“經濟总崩溃”的大題目两旁曾經标出了唐朝詩人两句詩句：“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② 一个工业家不禁哀呼：“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經濟总崩溃！”^③ 但是这些对于四大家族毫无关系。他

① 欲忍：“什么东西进口得最多？”，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联合晚报”。

② 去疾：“經濟总崩溃！”，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小时报”。

③ 胡西园語，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商务日报”。

們目的是发财、发财又发财，而且只要目前能够得到手，至于經濟总崩溃和亡国，与他們又有什么相干呢？

七 “只要有油水可捞，先捞了再说”

像前面所述，在四大商业家族的脑袋和字典里面，完全沒有“爱国”两个字，更完全沒有“良心”两个字。只要他們能够发财，就中国灭亡也好，人民死絕也好。他們发财方法的殘暴，是完全出乎一切正常的人类想像之外的。本年（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蔣家朝廷公布的所謂“外汇率調整”，他們也說得滿口好話，但实际上，“盛傳汇率之恰于此时調整，是因某數要人經營之三大貿易公司（按：即孔、宋們經營的三大公司）近方自美以二千零二十元之汇价购运大批日用品达一万数千吨，即将进口，故先抬其价，以收大利”^①。一个美国記者写过：“經濟上中国正在衰微之中！它借着一种荒唐的經濟以資維持。……現在的經濟是一种印刷品的通貨膨脹和政府支持的黑市交易。……有一天晚上，一个上海热心反共的美国律师对我說：‘政府不像政府，这是一群无耻的、惟利是图的官僚，只要有油水可捞，先捞了再说。他們失尽了民心。’”^② 該記者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外国运输人員告訴美国朋友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从琉球島运送美剩余医药接济品的政府雇員，这些接济品移交政府一星期之后，已經变为某一个上海堆棧中的私人貨物，在等待着黑市的营利了。”当然，这位記者的說法和例子，实际上还是很溫和的。所謂“聯合救濟总署”只是美帝国主义者和四大家族掠夺中国人民的伪善机构。所謂“聯合救濟总署”的物資都变成四

① 天津“大公報”南京电，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② 格雷：“恶政府”，美国“时代杂志”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

大家族及其系統下人物的黑市財貨，“救濟”到那里，新的災難也到那里。四大家族統治下的人民不是歡迎“救濟”，而是駭怕“救濟”，這些早已是人所共知。另一個美國記者寫道：“‘上海有黑市、黑黑市、黑黑黑市之分’，一個外籍證券經紀人說道，金條、美鈔及國幣買賣，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在上海的鬧市，到處都在公開的干着。這不過是普通的黑市罷了。‘黑黑市’只行之于比較更不公開的場合，普通得有相當的交情才行。至于‘黑黑黑市’，那是大家明知其存在，而都不願意說到的一種情形。舉例說罢，‘聯總’把面粉賣給‘行總’（即蔣政府行政院的所謂“善後救濟總署”），‘行總’又以法幣九千元一擔賣給了‘老百姓’（按：老百姓應有括弧），或者算是‘老百姓’的某些人。不知怎么一來，面粉又運到天津，那裡價錢提高到了法幣二萬元。政府毫不干涉這件事。他們認為，要不然的話，政府沒有船和火車，美國飛機又沒有汽油及駕駛員，天津人還根本吃不到這面粉哩。”^① 大家想想：除了四大家族，誰能夠充當這種“黑黑黑市”的主宰呢？黑，黑，黑……不只是三個黑，三重黑，而且是無窮無盡的黑，這是四大家族封建、買辦、軍事的商業獨占在中國所特別創造的真正市場，這樣的市場每日就吞噬了無數中國人的生命。

關於把所謂“救濟”物資變成黑市的財貨，而以千萬的人飢餓死亡為取樂，是受到美帝國主義者的批准的，而且美帝國主義者還在太平洋的彼岸給以歡呼；中國的買辦們！你們吃中國人吃得好，你們要更努力地吃，放縱地吃，這對於我們也很有滋味的，我們的“文明”使命，就是要“援助”你

① 劳特巴哈：“上海性格”，載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活”。

們，我們所輸送的“救濟品”，雖然那機關里面也有些天真烂漫的職員要做些什么“慈善”的事業，但我們的主意，實際上也是要“救濟”你們，使你們在中國的吃人制度能够存在下去，这种“救濟品”結果使你們吃人吃得更多，那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五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工业独占

一 和法西斯德国合作为主的独占活动

当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間，四大家族完成了对于金融界的統制之后，又正当民族工业新危机的时候，就又运用其政治的压力，大伸其手爪到工业方面来。他們的手爪伸到这方面来，完全不是要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相反，乃是在絞杀这发展。一九三六年初，蔣家朝廷即已在进行統制工业的計劃，起草工业統制的条例。当时蔣家朝廷还起草所謂“國民經濟建設綱領及工作計劃”，实质上就是四大家族独占全国工业的計劃，其起草人之一，便是陈家 CC 特务系統的重要头子之一——徐恩曾。

四大家族在官办形式方面，除了吞并原有的官僚工业如招商局等等之外，其有計劃进行工业独占活动的主要机关是資源委員會。这原先是直接隶属在蔣家軍事委員會的下面，就是說，一开始就带着軍事的性质，而且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其事业一开始就是“統制”錫錳两种矿产之出口貿易，而“方針”就是“以利用外資为上策”（又說：“政府所規定的利用外資条件，不妨放松一点”）。这是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工业独占活动。

“資源委員會技术方面，錫铁厂与德方合作，炼鋼厂与德英两方合作，煤炼油厂及氮气厂与德方合作，机器厂与美及瑞士两方合作，电工器材厂与德英美三方合作”。“实际上有許多事业，如炼鋼厂煤炼油厂等，要不是事前向外国接

治好貸款，根本就无法推动”^①。由此可見，四大家族虽然有很多財富，但並不願意从他們的錢袋中拿出錢來办什么工业；他們的工业独占活動，必須和外国帝国主义合作，依靠帝国主义的貸款，而在实际上把工业变为帝国主义附屬的殖民地企业。四大家族这个活動，先是和日本的盟友——法西斯德国合作为主。这本是物以类聚。据“时事類編”五卷二期所載：先是，“关于德国对华投資，有种种傳說如下：一九三三年八月为設立鋼鐵工場，中德間成立五千万元的借款；又中德合办江西采矿公司，資金六百万元，其他还有投資二千万元的四川采矿公司，兵工厂設立計劃，海州港建設計劃，玉萍铁路材料借款等。”此外，例如，欧亚航空公司的合作，湘黔铁路的材料借款，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德資活動也不一而足^②。資源委員會經營的鵝铁厂，完全是和法西斯德国合作，設備、机件、技术完全是由法西斯德国包办。至于当时所喧嚷而流产的“中央鋼鐵厂”則也完全是和法西斯德国合作：經過“委員長(即蒋介石)批准”，“設計监造由克虏伯厂总其成，土木工程由西門子建設部負責。”^③这些都說明了四大家族是法西斯德国在中国的大买办。

在商办形式下面，四大家族一方面是时常利用銀行加資或改組的方式，以取得旧有民营工业的統制权，另方面又用和別人合資或用独立投資的方式，經營独占性的新企业。前一种方式如宋家对于南洋烟草公司，对于許多的紗厂。这一切的行为都是或者乘人之危，或者因債務关系，都不过

① 引文均見錢昌照：“兩年半創辦重工业之經過及感想”，“新經濟”一期。

② 姜君辰：“最近德国对华的經濟活動”，“世界知識”六卷三期。

③ 程又法：“中国鋼鐵厂筹备概況”，“資源委員會月刊”一卷三期。

是巧取豪奪。

據一九三四年報載：當時已有把全國紗廠面粉廠歸銀行團管理的傳聞。一九三六年春間，“在報章上已經發現了一個消息，說冀豫晉三省大興、豫丰、晉華等七家紗廠，已是在中國銀行領導下，合組了一個紡織業經營聯合會”^①。這些消息正是表現了宋家獨占中國紡織業的野心和活動。在抗日戰爭之前，因債務關係，而使宋家控制的中國銀行取得經營權或賺利分配權的紗廠，已有蕪湖中一紡織公司，上海申新第二廠，第五廠，上海鼎鑫紗廠，天津恒源紗廠，天津北洋紗廠。由宋家中國棉業公司租辦的，有上海恒丰中記紡織新局。至于中國銀行直接投資經營的紗廠，則有鄭州豫丰，濟南仁丰，昆明雲南紡織廠，衡中紡織公司，成安紡織公司^②。當時“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公司對紗業的投資，據報載，還有更大的計劃，它們預備在川陝豫甘晉五省分設五大紗廠”^③。

其他“官商合辦”形式或“商辦”形式的企業，例如：以宋家為主的揚子電氣公司，淮南礦路公司，漢口既濟水電公司，等等；以陳家CC系為主的大公鐵廠，還有在實際上只是裝配進口材料的中國汽車製造公司，中益電工製造廠，等等。當時有名的溫溪造紙公司，也是由孔、宋、陳諸大家族參加經營的。在這類企業中，例如：漢口既濟水電公司，曾得過法西斯德國“商人”的援助，CC系的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原先也即系與法西斯德國合辦。雖然四大家族和各帝國主義都是合作的，但依靠法西斯德國的帮助以求獨占中國工

① 孫懷仁：“中國紡織業的前途”，“申報周刊”一卷十九期。

② 參考呂中平：“中國棉業之發展”。

③ 駱耕漠：“論目下中國經濟的景氣”，“認識月刊”二期。

业，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前以至抗日战争最初时期四大家族原来的基本路綫，这路綫是被貫串到各方面去了。

二 在吞并民族工业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 迅速地建立了暴力的独占

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乘民族工业的灾难，更加强其独占工业的活动，并更加直接利用蔣家的武力。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和設立貿易調整委員會同时，蔣家朝廷在軍事委員會之下，設立了工礦調整委員會，按照其規定，它的任务，第一条便是协助官僚工业，第二条便是吞并民营工业，而关于后者的規定，更特別毫无掩飾地表現了四大家族及其系統下人物的蛮橫強制劫奪^①。正如一个作者所說：“一种官办的方式，不是明文的由一个长官主持重要事业，但事实上由一个或几个高級官員把持大权，各种重要事业的公司，都須由他們加入股份，濫占董監，任用私人，才能成功，对于他們未拿住的公司，或是明文禁止营业，或是暗中苛刻对待，迫其失敗。……而且要人們的公司往往托名統制，大膽地对于营业的人規定种种束縛取締的办法，甚或利用政府或國家銀行的大宗資金加入公司股本，而由少数特殊官員自居为最大股东，强取大权。”^② 曾有一个視察官員在抗日战争初期也写过以下一封直白的信：

“政府中人总认投資为一种捐贈，一种献金性质，或认为一种特权，在經營尚无把握时，先应給政府以利益。因此，人民对于实业，观望不前。……若干民营事業之有利者，被无偿沒收，名曰統制。若干矿現以統制

① 參考“四年來之物資統制”，“財政評論”七卷一期。

② 毕敏：“國營与民营事業的关系”，“新經濟”三卷二期。

为名，用贱价收买，以高价出售，如鎢，收价吨三十元，而售价达二百元，政府用权力統制，而利則归于政府中人所組織之公司……。”^①

这封信寫的內容是很少的，但四大家族对于民族工业的态度是好像封建主对待农奴财产的态度，可以予取予求，却是被写出来了。其中关于“以統制为名”的买贱卖貴，我們在前面論四大家族的商业独占时，业已說到，这当然也是四大家族吞并民族工业的一种重大手段。但强制吞并民族工业，这只是四大家族独占資本“原始积累”的一方面。四大家族独占資本“原始积累”的另一方面，并且是主要的方面，乃是以租税和法币的征发方法，从广大农民那里掠夺得来的，并且还有在人民（主要是农民）間公开强制摊派或征派股本的（例如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四大家族的工业独占正是在这样利用經濟外的政治的强制力、进行吞并民族工业以及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至于在工厂中，四大家族就对于工人們实行半封建的、原始的剥削，以获得大量利潤。

資源委員會和兵工署是蔣、孔、宋三大家族“官办”工业的两大直接組織。（按：蔣介石在一切經濟独占的活动上，时常是避免直接出面，以保持他那个所謂“最高領袖”和“國家元首”的面貌，在工业独占的活动上也同样，但事实上，他就是这种“官办”独占工业的主要头子，这种“官办”独占工业，特別是这两大組織下所控制的官僚工业，乃是以他为主角的私产。）到一九四四年春間報紙和杂志上公开的数字，資源委員會系統下的工业单位，或者是官办，或者是和地

① 原信見張安世：“統制經濟无異自杀經濟”，“祖國”二十二期。

方合办，或者是所謂“官商合办”，一共有一百零五个单位，計共工厂四十个单位，矿业四十二个单位，电业二十二个单位；职员一万二千，工人十七万^①。“如軍政部兵工署主管經營的軍火工业，也不下数十单位，專事制造軍用器材”。就資本上說，根据蔣家朝廷前实业部的調查，“在民国二十四年底全国官营民營工厂的資本，为二亿五千零八十四万四千零九十八元，其中官營工厂的資本不过三千零一十九万七千七百二十九元，仅占資本总额11%弱”。但據統計，截至一九四一年底止，国民党統治区“工业資本的总额共达十六亿元，官營事业部分約占八亿元，居資本总额50%，內中資源委員會所屬事业部分占六亿元，其余各省官營事业占为二亿元”。實則官營事业之資本，“远不止上述八亿元之数，因为軍需工业等部門的数字，沒有包括在内，何况資委会所屬事業及省營部分之資本，亦不仅上述之数”^②。按照“大公報”所写，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粗略估計，官營資本約占全部产业資本70%以上^③。国民党統治区官僚工业資本集中之迅速，已完全压倒了民族工业。而这种官僚工业不但在資源委員會和兵工署的独占系統下的事業是以四大家族为主体，而且各省所謂“公營”的大独占企业公司（許多这类公司叫做“官商合办”），也都在实际上是以四大家族为主体。关于后者，例如：有名的貴州企业公司，中国、交通、农民三行的資本占全資本的68%，而且还叫做“商股”呢。又例如：四川川康兴业公司，全部股額分为七十万股，蔣家朝廷“认购三十万股”，十万为川康省府认购，还有三十万股則为“商

① 余爽仁：“資委会工矿展览会輪廓”，“中国工业”二十六期。

② 陈明远：“泛論健全官營事業”，“財政評論”十一卷四期。

③ 見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重庆“大公報”社評。

股”，而“四行兩局及四川省銀行认股最多，總計超过商股二分之一以上”^①，可見“官股”是以四大家族的金融系統为主体，“商股”也是以四大家族的金融系統为主体。湖南实业公司除了官股之外，其余“由民間投資”，而其最大的“民間”认股者，也即孔祥熙。四大家族亦官亦商，滑稽剧类都如此。

以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工业，除了資本已占压倒的优势之外，还再就动力来看。先說些主要的工业。例如：据一九四二年統計：全国共有炼铁厂一百十四家，其中官营十六家，民营九十八家，动力設备合計：五千零六十九匹馬力，其中官营占四千零八十九匹，而民营則为九百八十四匹。就是說：占厂数将近 86% 的民营工厂，所占动力仅为 19%；而占厂数 14% 的官营工厂，所占动力却为 81%。又例如：据同年統計，共有冶鋼厂十家，內官营六，民营四，在厂数方面已是官方占多，至于动力設设备則合計为二千六百二十八匹馬力，內官营二千三百零七匹，民营三百二十一匹。就是說：官营工厂占动力 88%，而民营所占动力仅 12%^②。但要知道：这所謂民营的炼铁厂和冶鋼厂中間，其中資本最多、“規模較为宏大的，当首推中国兴业公司鋼鐵厂”^③，而这个“民营”公司（或叫“官商合資”的公司）的真正主人不是別人，正是孔家祥熙。把这个公司算在外，冶金业中真正民营工业的动力比起官营来当然更微不足道了。前面說的是冶金业，至于一般的情况則如下述：“把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作一比較，則曉得官营企业之資本，平均每单位二百万元，而民营企业之資本，则每单位尚不及二十万元；官营企

① 見“四川經濟季刊”一卷四期三百十七頁。

② 白鳥：“鋼鐵”，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商务日报”。

③ 沛然：“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巡礼”，“中国工业”二期。

业每单位有百匹馬力，而民营企业則每单位为三十四馬力；官营企业每单位可得二百余人，而民营企业則只五十余人。”^①就是說：各个企业单位，在資本上，民营的平均还不及官营的十分之一，在动力上，民营的平均还不及官营的三分之一，在职工上，民营則为官营的四分之一。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工业規模及其生产力是很落后的，而四大家族这种独占的地位，正是残酷地阻止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保护中国工业的落后。

以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工业，在总生产量上，步步占着优势。例如下列主要工业官营和民营的生产量之百分比^②：

生产类别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官营	民营	官营	民营	官营	民营	官营	民营
铁	5.76	94.24	15.09	84.91	25.64	74.36	50.96	49.04
钢	41.06	58.94	54.17	45.83	80.86	19.81	91.65	8.35
煤	9.64	90.36	15.62	84.38	18.86	81.14	23.74	76.26
汽 油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
机器制造业	22.95	77.05	13.20	86.80	36.45	63.46	34.45	65.46
机 紗	44.24	55.76	55.62	44.38	64.96	35.04	64.37	35.63
厂 布	14.32	85.68	24.93	75.07	30.41	69.58	34.73	65.27
面 粉	0.38	99.62	3.32	96.67	8.87	91.13	24.06	75.94
机 制 纸	33.79	66.21	35.34	64.66	33.50	66.50	31.11	68.89

上述这一切关于以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工业的資本、动力和生产量在抗日战争中之集中程度和速度，恰是說明了其独占的規模和独占过程的迅速，而其独占的活动范围，简直无所不包：从重工业到輕工业的一切部門。同时，上

① 許德培：“中国工业化及其前途”，“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二期。

② 參考“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三期十一至十三頁。

述的數字也告訴了我們：四大家族“官办”工业之資本的集中比生产的集中远为迅速，这只說明了四大家族的工业独占是依靠强制掠夺和独霸國庫的結果。

其次，我們再考察四大家族“商办”形式的工业。例如前面提到的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业最集中的四川省內，較大的工厂有三百九十余家，資本总额合計三亿四千四百余万元，而中国兴业公司資本就最大，占一亿二千万元^①，即占三分之一以上。又例如原来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一九四〇年成立，全由中国銀行投資，据一九四三年五月間報載，已完成及未完成的，已有十八个单位，被称为“西北工业之巨擘”，也即是独占西北工业的大托拉斯。此外，陈家經營的，如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設公司，中国工矿建設公司等，也是帶着独占的性质。所以，不只是四大家族的官办工业对于民营工业是独占的地位，而且四大家族在“民营工业”內，也是以“民营”或“商营”的面目，取得独占的地位。

这是一种极端野蛮的絞杀民族工业发展的工业独占。四大家族这种在工业上的独占之封建、买办、軍事的性质，第一，正如前所述，是由于这种独占是經過暴力劫奪和依賴外資而达到的；第二，是由于这种独占在軍事工业或軍需工业方面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而那些軍事工业和軍需工业是为了武装反人民的军队之用的，以服务反人民反民主为目的；第三，是由于这种独占的企业本身經營的极端腐敗性和生产的历史倒退性。关于后面这一項，我們将在本章后面加以叙述，这里不多贅了。

① 張錫昌：“中国工业化的当前問題”，“中国工业”十三期。

三 独占网因“惨胜”而扩大

“惨胜”以来，日寇长期在中国用野蛮的强迫劳役和强制吞并所建立、而为无数中国人民血泪所凝成的庞大工业，同样地轉到新征服者四大家族之手。四大家族及其爪牙为了劫收这許多工业，曾經你爭我夺，但不論是落入四大家族那一家之手，他們都是把重要的工矿一律霸占为己有，名义也叫做“国营”（我們已經常說过：他們那个“国”本来就是他們私有的），而又“将破烂不堪者，向商民公开标卖，叫人民来上鉤”。和金融及商业的独占一样，四大家族因此就大大地扩大了在工业的独占。据本年（一九四六年）五月間有人作粗略的估計，以四大家族系統为主的“官營”企业的資本已約占全部产业資本总额的80%以上^①。

四大家族及其系統下的人物利用其所劫收日寇在中国的产业，一方面組織了全国性的各种工业独占，一方面又分別在全国各个区域內組織了各种工业独占。关于前者，例如：中国紡織建設公司，中国紡織机械公司，中国蚕絲公司，中国石油公司，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造船公司，中华水产公司，正在发动中的邮船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的独占規模都很大：目前如全国紗錠共約四百万錠，中紡公司所接办者即达二百余万錠，此后还計劃繼續扩大。中国石油公司原定資本十亿元，現在拟增为五十亿元，据称：“該公司現將繼續大量拓展玉門、台灣、东北等地之油矿，并拟划定重庆、兰州、汉口、上海、华北、华中、华南七区为分公司，务使营业网絡布全国各地。”中央造船公司，据称亦“将为全中国造船工

① “經濟周報”二卷十八期。

业中規模最大之单位”。至于各大区域的工业独占組織，在上海方面，业已在报上发表过的，例如：上海材料供应事务所，电工机器厂，上海机器厂，上海造船厂，上海炼油厂，江南电气局，上海化工厂，台灣炼糖厂上海分厂，中国无线电材料公司，等等；在华中方面，已在报上发表过的，例如：华中钢铁公司，华中矿业公司，等等，其中华中钢铁公司，“據說該公司成立，如业务全面扩充，将需用职员五千人，工人两万余，尙有美国专家三百人”。在台灣方面，已在报上发表过的，例如：台灣电力公司，台灣糖业公司，台灣电化公司，台灣肥料公司，台灣纸业公司，台灣机械造船公司，等等。其中台灣糖业公司，业已鼎鼎有名，系接受了敌人的四大托拉斯，共有四十二厂，农場二百万亩，年产砂糖一百四十万吨（現在有三厂复工，职员五千人，工人一万五千人），准备壟斷全国的糖业。在华北方面，新华社曾有以下較詳細的报道：

“北平訊：国民党宋系官僚資本，利用‘接受’，壟斷了平津輕重工业，并竭力吞噬仅有之民营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經濟部‘接受’的重工业和規模較大工厂，已移交行政院資源委員会者，共計三十三单位，組成所謂华北八大公司：即冀北电力公司、华北钢铁公司、华北水泥公司、天津机器厂、天津制車厂（即敌人之昌和制車厂）、天津化学公司、天津制紙公司及中央電工器材厂天津分厂等，直屬南京資源委員会管轄。此外尙有即将成立之井丰煤炭公司，由資委会和河北省政府合营。于是敌人华北开发会社所設立的重工业精华，全为宋系官僚資本所独占。天津輕工业中規模較大，利潤最丰之紡織业，亦为宋系官僚資本所壟斷。由經濟部‘接受’之紡織工厂十六单位，包括裕丰天津分厂、

钟淵分厂、天津紡織厂、上海双喜紡織天津分厂、大康紡織、云大七厂及木工厂、机器修理厂等，全移交中国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組成天津中紡七个厂，拥有紡錠三十二万余枚，占全津紡錠84%。中紡天津分公司經理亦为宋系。另外經濟部‘接受’后发还原业主者，如英商开灤煤矿、英美合資之順中烟草公司及永利化學、久大精盐、启新洋灰、耀华玻璃四厂等，于发还时除开灤、順中外，經濟部均凭‘接受’清册中載有增加資本一項及部分成品原料之遗留，規定收归‘國’有，作为官股，并参与董事会，官僚資本遂掌握工厂大权。例如耀华玻璃厂即将敌資五百万元改为官股五万股，占总额数之半。除以上三項外，其余‘接受’各厂本应立即标卖或出租民營，但經濟部仍将規模較大或有利可图者如：东亚烟草、中华磷寸、新源化学、东亚油漆、亞細亞制革厂等，霸为自营。剩下‘标卖’者，以化学机器厂居多，标底又均按敌人移交清册照原价三千倍发售，稍完整之工厂均在二万万元以上，使一般工业家无力购买。如工业家政协代表李烛尘之投标，即因低于标底，未开标出租。”

至于在东北方面，凡是四大家族劫收到的地方，先是都同样地演了一番“接受之战”：四大家族的部下“你也接受，我也接受；你也搶，我也搶；文和武爭，官和民爭；有力者公然霸占，无力者暗中盜窃”^①。据本年（一九四六年）七月間報載：“若干大員及閥少，已开始組織公司，准备順手牽羊，演官僚資本的老戏法。”蒋家朝廷把东北抛棄如敝屣，待中

①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文汇报”。

國共产党人和一切东北抗日人民十四年間流了无数的血，配合了苏联紅軍，把日寇驅逐出去之后，四大家族的魔掌伸来了。东北人民已把蔣家的統治呼为“三滿洲”。东北的重工业和主要的輕工业被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变成了独占的私产，他們并准备把这些工业作为征服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

四大家族这一切新的独占工业，有些仍然也叫做“官商合办”，例如：中国紡織建設公司的資本 60% 叫做“官股”，又40%叫做“商股”，“官股”当然是四大家族的，“商股”呢？是“中国銀行”的。四大家族一个魔手是“官”，又一个魔手是“商”；四大家族从来所謂“官商合办”，即是四大家族的两个魔手的合办。当民族工业家們对于这种中紡官办发出反抗的声音的时候，宋子文出来声明，过了两年之后当然让商办，事实也就是准备在一定时候由四大家族的“官办”轉让給四大家族的“商办”。

四 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工业边界”

四大家族霸占了本来应归人民所有的日伪工业，同时又即把这一切独占的工业变成美国大洋行的附屬的、买办的儿孙公司。差不多現在四大家族所独占的主要重工业或輕工业，都有美国独占資本的參預或作主。抗日战争前到抗日战争最初期，四大买办家族的独占工业主要地是和法西斯德国合作，是要法西斯德国“总其成”，現在法西斯德国倒了，四大买办家族的独占工业是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合作，是要美国帝国主义者“总其成”，让美国帝国主义者来大量地榨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在二次大战后，美国独占資本巨头即已紛紛地作出了来中国猎取財富的計劃：一种計劃是和四大家族合股設厂，

一种是直接独资設厂。

据四大家族的通訊社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的报道：

“美国‘援华’月刊称：（一）一九四七年年底以前，将有五千美国技术专家来华；（二）美国两工程师刻已完成关于大規模之电力鋼铁工厂及铁路运输设备之調查，并有美国水泥公司数家刻已建立工厂，完全由美国材料及曾受訓練之人員加以装备后，徑送中国；（三）由美貿易专家充任中國絲業之顧問，負責品質之統一及标准化工作，中国每年生絲之生产預料可达五亿美元，对于美国人所需要之中国茶叶、磁器及其他产品并推行相应之标准化工作；（四）油类之調查刻亦在中国内地举行，系由美国油类公司之有力集團所支持，聞此集團將在中国組織企业組合以經營油业。代表包含五十种美国工业之三百五十家公司之中美工商协会，实为实行上述計劃之原动力……。”^①

又据一九四六年五月間報紙所載：

“据悉：有數家美国石油厂正謀組織企业公司，准备来华經營石油事业，其次是威斯汀电气厂，已与我国簽訂合約，决定在华境内建电气工厂，目前与我国簽訂合同，在我国設厂之外商尚有水泥厂数家，輪船制造厂及化学工业制造厂各一家，雀巢牌炼乳牛奶厂公司亦准备与我国簽約在华設厂。”^②

当然，这些都不过是“紛紛”的消息的一部分，而且还不过是开头而已。

如上所述，中国在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統治下，将完全成

①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中央社。

②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商务日报”。

为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这在工业方面也同样明显的表現出来了。美前战时生产局长納尔逊对美国加里福尼亞州的商人們称說：“美国商人必須将中国視為美国之工业边界，其重要纵不比二十世紀初美国西部之边界更大，至少亦与之相同。”納尔逊称如此始可維持美国在远东的领导权^①。中国人要知道：美国帝国主义者經過四大家族的統治不但把中国視為菲律宾，而且已把中国視為和美国“西部之边界”相等的边界了。

四大家族所制造的“新公司法”，就是为的給美国独占資本家在中国投資享有更大的特权，为的使中国成为“美国之工业边界”。关于这問題，經濟学者馬寅初氏曾时常大声疾呼过。馬氏說：“新近政府公布的‘新公司法’中第一条和第一百九十二条中沒有規定外国公司在他們本国的总公司必須‘营业’。……这是一个可怕的錯誤，因为照‘新公司法’的規定，外国在华設立的分公司既不必呈報資本額，那么他們便可以隨便增加資本額而逃避中国政府的所得稅，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在本国向自己的政府說，总公司既未营业，当然也不必納股东所得稅。这样他們可以逃避一切的征稅，試問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的工商界如何能够和这种‘外国公司’竞争。这是外国資本家剝削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可怕的手段。”馬氏又說：“立法委員們知道这关系中國民族工商業以及整个經濟前途太大，曾据理力爭，但国防最高委員会的几个大老反对，这几个大老中，大多是拥有雄厚資力的官僚，一面与买办資本勾結，想借此发财……。”可見政治的現實究竟是現實的，政权是在四大家族的手里，而不是在立法

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經濟快報”。

委員的手里，虽然有若干立法委員反对，但“新公司法”毕竟是公布了。

五 民族工业遭受毁灭的打击

与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和外国金融資本独占中国工业相对照的情况，乃是民族工业的遭受悲惨的毁灭性的打击。在抗日战争中，除了已被四大家族吞并的以外，当时还存在的民族工业，又是被排挤和被压迫得很痛苦的，这在前章关于商业独占的方面，我們已說到了。一个民族工业家还說过其他的条件：官营工厂“利用国家（指蔣家朝廷独占的国家）雄厚实力及优先条件（如不納稅，无开支，购原料之方便），成本可以減低，相竞之下，致使民营工业萎縮不前”。四大家族的“商办”工业，当然同样地依靠其政治独占和金融独占，占有許多的优越条件，并得有特別的財政援助，例如：一九四四年四行共貸給“民营”工业的一亿五千万元中，孔家祥熙为主人的中国兴业公司一家，便貸得七千万元。

不久之前，一个作者曾补充了“慘胜”以来增加的經驗，对于官僚資本压倒民族工业的諸条件，作了一些叙述，大抵有下列諸端：

“第一是官僚資本在‘商民无力經營’和‘國營爭取世界市場’的两个口号之下，穿了‘國營’的伪装，囊括了生产事业的各部門。

第二是官僚資本对于动力的控制。民营工业不仅不能获得和官營工业平价的燃料供应，并且根本沒有获得供应的保证，而必須仰給于黑市。黑市价格比較官營工业获得的配給价格平均要高出一倍至十倍——燃料委员会对于官營工业的配售价，每吨最低三万余元，

最高十八万元，而黑市价格則在三十万元左右。

第三是官僚資本对于原料和器材的独占。原料和器材，目前不論是本国生产的，或自外洋輸入的，都被官僚資本集团壟斷或控制着。举例說：自海外輸入的紡織工业原料棉花和羊毛都被中国紡建公司所独占，敌伪用剩的紙漿和遺留下来的造紙設備，都被官僚資本以‘經濟部’名义經營的各紙厂所使用。胜利初期，被用来制造鈔票紙，专供中央印制局印制法币，后来因官定外汇的不合理，國內物价高于国外物价，印制厂縮小范围，将大部分的印鈔工作，委托外商办理，鈔票紙需要減少，乃改造各种紙張。造紙漿用完了，就計劃把紙厂的空壳标卖，一片小小的金星造紙厂，就想标卖金条二百根，在这种情形之下，民营工业，用什么力量来爭取生存？

第四是官僚資本对于市場的爭奪。官营事业的目的，說起来很冠冕堂皇，是在爭取海外市场，然而官僚資本伪装的‘国营’工业实际上都在和民营工业爭取國內市場，例如中国紡織建設公司在表面上是以接受敌人的国际市场为任务相号召的，因为紡建接受的敌伪工厂的配备，比較适宜于紡制四十支以上的細紗，細紗的國內市場銷路較小，可以爭取国外市場，充实外汇。然目前紡建竟舍細紗不紡，而改紡二十支和十六支等粗紗，这不是放棄国外市場，回到國內來打天下嗎？民营工厂設備較為簡陋，紡制粗紗，比較合算。但是官營紡織业要和民营競爭，民营工厂的經濟条件，那里抵擋得住呢？

第五是官僚資本和买办資本相勾結，爭取商业利

潤。在國內市場衰落，利潤較低的場合，官僚資本竟和买办資本勾結，运用政治上的特权，制定不合理的汇率，趁着國內物价高于国外物价的时机，和人民爭取商业利润。例如紡制十六支到二十支粗紗，国棉尽可采用，而官僚資本集團偏要輸入美棉，紡錠國內可以自制，而偏向美国輸入五十万枚。因为輸入貿易有利，便計劃組織大規模的貿易公司，运用政治上的特权，壟斷貿易，使民营的进出口业陷入了絕境。

以上所述，仅是民营企业在官僚資本重重压迫下的片断苦衷。除此之外，还受到政治上的无理压迫。举一个例，民营企业所納的捐稅，已有不胜負担之苦；而地方政府的征稅往往又加重了负担。”^①

当然，作者这里所說的官僚資本，就是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作者这里的話，是有些毛病的，例如說官僚資本是“和买办資本相勾結”。原来官僚資本之所以为官僚資本，便因为它又即是买办資本，二者是一体的。关于事实也有些說得不完全。例如，他沒有說到关于交通的独占。四大家族所独占的全国铁路网、公路网、輪船公司（我国現在的輪船約为五十万吨，宋家壟斷的招商局就約占二十五万吨）、和外国“合作”的或外国直接經營的航空公司（例如，从前和法西斯德国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和美国合作的中国航空公司，最近四大家族完全出卖航空权所成立的陈納德航空运输公司），除了供給蔣家軍的內战軍运之外，不但给了四大家族商业独占以便利的条件，而且又是给了四大家族工业独占以便利的条件。又例如：四大家族对于民族

① 亦民：“官僚資本壓下民營企业的厄运”，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聯合晚報”。

工业的利润（它是由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所转化的），除了所述的用重税去分割它之外，还经过高利贷及保险业去大量分割它。（据报载：外資的保险业不算在内，四大家族控制下的所谓“官营”保险业的资本占蒋管区的90%以上。）

只就四大封建买办家族这种独占，已使得一般民族工业“走到山穷水尽，濒于死亡”^①，而美货和美国帝国主义资本的袭来，一切民族工业，就到处都在呼喊着“奄奄待毙”，呼喊着“窒息”。对于抗日战争有功的民营工业，四大家族一律加以剿办。“后方工厂，请求当局救济，当局要人将他们援助抗战功劳，一笔勾消，且振振有词，指摘这批工厂机器落伍，办理不善，不配救济，一口拒绝”^②。“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③。据本年（一九四六年）七月间报载：“在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的会员有四百七十余家，其中约二分之一停工，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会员厂三百八十家中，有一百二十二家正式停业，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会员，正式登记的一千一百余家中竟80%停工，而且所谓不停工的，也不过是名义上的开工或半开工的情形”^④。重庆是这样，其他各地情形更是这样。至于大的工厂，如果被四大家族和他们系统下的人物看上了，那不可免的又有一番吞并的戏法，例如下面的报道：

① 郑实：“棉织业危机深重”，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联合晚报”。

② 张纲伯：“全国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文汇报”。

③ 李烛尘：“工业危机之成因与挽救”，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大公报”。

④ 彭陶：“窒息中的重庆工业”，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文汇报”。

“重庆数大工厂，胜利后因工人要求发给遣散费，而发生工潮，……就来了官方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官員們获得股权，不久，他們又說此刻无需‘国营’了，还是商办吧，好在平地一声雷，股票早已掌握在这般‘亦官亦商’的大人物手里。”^①

当然，惟利是趋的四大家族及其部屬，究竟不仅从事毁灭那些对抗日战争有过貢獻的民營工业，甚至他們在抗日战争中所巧取豪夺而来的，并和民營工业残酷爭利的自己“官办”或“商办”的工业，只要有更多的利可图，他們也加以棄置。一方面，如果某种美貨比較“价廉物美”，运进来可以賺錢更多的話，他們就一定把生产那种貨物的自己工厂关门，四大家族霸占的官紙厂的停工标卖，便是一例^②。就是說，他們决心完全当美貨的商业买办。另方面，正如一九四六年七月間報上所載：“當局所感兴趣之‘工业建設’，或仅在购买外国工厂，或和外資合作設厂，因此后方設備陈旧之厂矿，似已不屑再加培植，民營工厂固无论矣，即官營厂矿亦不在例外。”^③就是說，他們决心完全当美国独占資本的工业买办。然而，在实质上，不管四大家族在这种場合或那种場合，都是在那里加重地打击到民族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

民族工业在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独裁統治下，完全沒有出路，这是肯定的、不能够幸免的命运！十九年的經驗是这样总结的，抗日战争以来——尤其是“慘胜”以来的經驗更是这样总结的！

①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消息”。

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工商导报”。

③ 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文汇报”。

六 腐烂的东西不能够有生命

四大封建买办家族本来除了拍卖祖国、残杀人民、摧毁全社会的生产力之外，是不能有更多的工作的。他們独占的工业的生产力，和民族工业比較起来，完全是历史的倒退，历史的反动。

四大家族的官办独占企业，在經營上，有它的傳統，这就是如一个作家所說：“我国自清季以来所办的事业，所用的方法，是做官的方法，而不是工商业务管理的方法。”所有四大家族的独占企业，乃是十足的龐大的官僚衙門。这些衙門的能力和职业，乃是压迫民族工业，而并不是发展生产。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人写道：“有人曾謂一个商办的百貨公司，采办环球物品，管理方面不过二十多个人，若改为‘國營’（按：指四大家族的官营），就要設六大处，二十課，雇用三百个職員”（这人說的是商业，但工业同样）。“三两天可以結束或决定的事項，常有一轉再轉非一周半月，乃至更久不能出門”。“一張发票要蓋三十顆圖章”^①。至于內部的貪污和關緝，那就更說不尽了。“慘勝”以来的情况同样，例如有名的中紡公司，一个作者写道：“大規模經營紗厂，本来最合經濟原則，用人可省，成本可輕，現在該公司却适得其反，单单总公司大小職員七百余，完全成了一个官僚机关，天天在那里等因奉此，等来等去。各厂真正的人才，无法延攬，不学无术濫竽充数之輩，總經理却可任意委派。沪东某厂紗錠五万，布机八百，未‘接收’前，日本人只用職員三十七人，內事務員五人，技術員三十二人，現在該厂職員照章

^① 陈明远：“泛論健全官營事業”，“財政評論”十一卷四期。

規定六十余人，內事務員四十，技術員二十，本末倒置如此！以言购料，原棉由总公司向国内外訂购，不管好坏向厂中配給，有时紡二十支紗配送四十支原棉，有时紡六十支紗无棉送时，以三十二支原棉塞責，厂長均无权过問。机件损坏，添配机件小至螺釘，也要總經理批准，才能购买；而又往往一張申請购买單，三四星期不見批示，或竟永无下落，于是损坏由它损坏好了。”^①

事实上，現在四大家族所霸占的收復区产业，生产力正被大量地破坏，大部工厂沒有开工，許多机器和原料已变成了廢物。

这种官僚的工业的組織就决定了它的生产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例如：“有一个官營灯泡厂厂長說：在办民營厂时，用二十二个職員可产一万个灯泡；現在用七十个職員，却只能生产三千五百个灯泡。”^②这种生产力的比較，說明了以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企业之充分的历史倒退性和充分的反动性。“慘胜”以来的情况也仍以中紡公司为例：該公司的錠子还有一大部分沒有开工，这且不去說它，只就开工的情况來說，据本年（一九四六年）五月間報載：“一般生产水准，每个錠子每天生产二十支棉紗总在一磅上下，現在該公司开工七十五万錠出紗七百件，約合点四磅，这样的素质只及得上战时后方的小型紗厂，是應該在淘汰之列的。”^③又該公司某厂女工說：“从前日本人对于紗錠稍有损坏即加修理，現在則馬馬虎虎，仍勉强地开下去，机器消損得厉害，

① 張鷺：“國營紗厂的危机”，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文汇报”。

② 阮有秋：“战后工矿建設問題”，“四川經濟季刊”一卷四期。

③ 同注①。

我看紡建公司的錠子，二年之後恐怕多要完結的。”^①“應該在淘汰之列”，“要完結”，這是從生產力方面考察、而對於四大家族獨占工業得出來的正確歷史結論。

當然，這種腐敗的官僚獨占工業為着保證其超額的或獨占的工業利潤，對於工人們的剝削，却又是很無情的。應該說，他們對於這點却是最認真的。四大家族不是把工人當成自由的工人。一九四三年七月間，蔣家朝廷的“經濟部奉委員長命令，規定各公營民營工廠工人應嚴格採取連環互保辦法，並規定嗣後對於無保證之工人，絕對不准收容”^②。就是說，四大家族是把工人當成強迫勞役的奴隸來看待的。這正是四大家族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獨占工業的主要特點之一，又正是其歷史的腐烂性的標誌之一。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所受的掠奪，本來是特別殘酷的，帶了半封建的性質。中國工人們的工資是極低微的，工作時間是很長的，勞動強度是時常無情地被增加的。中國工人們所被榨取的，不仅是全部剩餘勞動，而且他們為維持生活所化費的必要勞動，也時常大量被榨取而去。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獨占工業所以要把工人們當成強迫勞役的奴隸來看待，就是為的更便於去掠奪他們。

其次：以四大家族為主體的許多工業，主要的又是投機的商業公司。它們一方面既借企業的名義而吞并民族工業為已有，同時是把商業的投機作為發財的保證。在前一章，我們已提過有名的貴州企業公司。其實是天下烏鵲一般黑的。例如：川康興業公司的“從事桐油羊毛紅糖之團購及黃金投機……桐油多在每噸五千元市價購進，十萬元以上賣

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大公報”。

②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四日“新中國日報”川康社訊。

出”^①。又例如：孔祥熙当董事长的中央制药厂营业部就囤积了大量的药品^②，用为商业的投机。四大家族的工业和封建买办的商业投机像一根紅纏互相貫穿，而无怪乎一切不义之财也就滚滚而来。

“慘胜”以来的情况，我們又再拿中紡公司为例，前引的作者曾說过：官营紗厂似乎是純投机性临时以营利为目的。这个公司其实又是大商业投机公司。本年（一九四六年）五月間一个报纸写出了这样的标题——“中紡兼作买办”：“墨西哥方面近来运沪之棉布数量甚巨，均由中国紡織公司抛售。”^③对于棉花，它一方面由美国輸入，“除自用之外，还可以轉卖，可謂两只手要錢”^④。对于它自己出产的棉紗，則更作为商业投机的利器：“上海紗的生产，已完全为中紡公司所壟斷，如中紡一旦停止供紗，整个棉織业就会因此不能开工，所以中紡公司操纵了棉織界，对他們有着‘生杀之权’，它就利用这点，不断提高紗价，以图厚利，同时又不肯充分生产和充分分配給，使市面上經常存在着原料（紗）断絕的恐慌。偶然有了紗，就大家搶购，价格以此抬高”^⑤。至于紗价和成本的距离，那是很吓人的：“据調查，中紡公司紗价成本每包不及六十万元，而售价則在一百一十万元以上。”^⑥

事实完全证明，这种罪恶的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这种

①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商务日报”。

②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大公报”。

③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工商导报”。

④ 吳蘿初語，“經濟周報”二卷十八期。

⑤ 郑实：“棉織业危机深重”，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聯合晚報”。

⑥ “民主世界”三卷四期二頁。

完全寄生的腐烂的东西，是不能够有什么生命的，生产力的比較說明了四大家族在历史上必将很快死亡，他們独占的、只为几个封建买办金融寡头利益服务的工业財产必須变成为人民的、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公有的財产。至于民族工业虽然是受美国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的摧殘，然而它們比起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却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一撮小臭虫——托洛茨基匪帮之类虽然竭力称赞四大家族这种封建买办的工业独占，但历史終究是說明了那一撮小臭虫終究只是一撮小臭虫。

六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农业独占

一 全国性的、最大的封建奴隶主

半封建或封建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落后农业經濟，乃是帝国主义和四大封建买办家族之掠夺的基础。

在四大家族統治之后，中国佃农就更迅速地增加了。据国民党政府办的中央农业实验所自己的統計，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九年全国平均的佃农从人口 28% 增到 38%，半佃农則从 23% 增到 27%（按：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数字系国民党統治区十五省的平均）。但这种平均，其实还是抽象的数字：因为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佃农增加的数字就更大。例如：四川成都新都等县，据抗日战争时期的調查，佃农的比数均达 70% 以上，川东之巴县江北等县，其佃农比数或达 80%^①。这种佃农的增加，当然是和土地的集中成正比例，是土地集中的結果，例如：成都平原 8% 的地主占有土地 80%，重庆人口 2% 的地主占有土地 95.6%，等等^②。关于集中的速度，也仍“以四川为例：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五年中，該省地主的地产增加了 69—70%，而在西康，则增加了 69—73%”^③。和这种土地集中加速的过程相反映的，是地租数目的大大加多。本来中国农民被地主剥夺的地租量是很可怕的，时常达到农业收获量的 50%、

① 中国农民銀行調查報告：“四川租佃制度”三頁。

②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新蜀报”：“四川的土地問題”。

③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上海英文“大陸報”專論。

60%、70% 或 80% 不等。由于中国农业生产力在封建制度下的低下，一般剩余劳动量是很小很小的，剩余劳动率普通在 10% 或 15—20%，在最好的土地条件下，也只在 50% 左右，但在比較好的土地，地租量又通常是最高的。因此，这种地租掠夺的規模，就不但占取农民剩余劳动的全部，而且还侵占了农民維持生活的必要劳动的一定部分，甚至其大部分，而这就构成了中国封建地主的財富。在蔣家朝廷的統治下，这种地租的剥削也更放肆起來了。在抗日战争之前，例如：“据民国二十二年广东‘台山县政府年刊’，五年內該县上田每亩租价自二十元增至三十元，加了 50%。”^① 在抗日战争中，例如：四川有个县的二十七家佃农，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其租額增加的指数是从一百到一百八十一點四^②。其他在蔣家朝廷管轄下的省份，情况当然都是一样。所有这些都說明了四大家族的統治极大地加强了封建的掠夺。

这种封建奴隶主的土地集中和剥削加强，正是与大金融买办的集中及其在农业上的活動联結在一起。在四大家族的統治下，各地新旧地主的代謝变得很剧烈。旧地主步步沒落了，新地主很快地取得了压倒的地位。据一九三五年四川十县的調查：新地主占 31%，占全部地主所有的土地 90%，旧地主占 69%，占土地 10%。这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旧地主大都称“土财主”，而新地主的成份大部分是和国民党四大买办金融寡头的政治权力相联結，而又能直接在投机市場上兴波作浪的、带有洋味的新財主。他們是国民党的

① “中國农村經濟資料續編”五百六十五頁。

② 甘英：“关于調查研究的一点心得”，“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

官僚、軍閥、党棍，依靠政治权力以进行土地的吞并，并把旧地主压倒在自己的下面，而成为四大家族这个新的封建买办統治的重要的社会支柱，并使四大家族的統治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封建王朝。

四大家族除了个别在农村、城市或交通要道和港口有直接的大地产之外，更正确地说，它们乃是全国性的、高高在上的、最大的大地主。中国封建时代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的这个“王”，就是蒋介石。用一比喻来说，全国各地的地主都好比是一房东或三房东，而四大家族则好比是全国性的大房东。蒋家朝廷治下的一切农民，包括佃农半佃农以至自耕农，在实际上，都是四大家族的佃户。四大家族不但在金融上、商业上、工业上掠夺他们，而且还向他们收“地租”。至于四大家族的收租方法是用赋税的形式，有的是直接取自农民，有的是间接经过地方的地主，而多数場合是以前者为主。四大家族收租的“管事”和“地钻子”，就是他们御用的军队、大小各级官僚和土豪劣紳。

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之前，在蒋家朝廷統治之下，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直接稅或間接稅，都比以前特別加重。各种苛捐杂稅，名目繁多，光怪陆离，貪污中飽也特別厉害。“据卜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之調查，全国农村，有一百八十八种不同名称的租稅，每英亩中国的稅率是六元三角四分或美金一元七角九分，而美国在一九三二年，每亩农田只須納稅美金四角六分”^①。就以田賦附加來說，就已超过原来田賦几十倍，这就是变相地收到很多很大量的地租。（直到清朝被推翻时，田賦附加还未超过正稅的十二分之一，四大家族統治的掠奪性比清朝和北洋軍閥大得很多

① 吴文峰：“中國农业經濟問題之真相”，“新經濟”二卷十期。

了。)此外，还有各种对于农民的强迫劳役、抽调壮丁，和无偿征用土地，等等。这里暂且不去算这一笔账。单说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吧。

在抗日战争中，四大家族开始利用“田赋征实”作为他们的收租形式。据一位同志的计算：“在三十一年，如果以田赋较重的四川为例：稻田每市亩平均收获四市石，其所负担的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和地方积谷及国民党政府在收粮时规定溢收的15%的‘折耗’等项，共计为二石三斗八升，也就是每亩稻田收获的59.5%，要被国民党政府拿去。在湖南，每亩所负担的前述各项额数，以洞庭十县为例，计合收获物的52.79%。在云南，也达到了49%。这里，一九四二年度的数字，还并不包括杂派和经手人浮收中饱的数目……。”^①正如一个作者所说：“田赋征实征借的负担，名义上虽为田地所有人，实际上则直接或间接、一部分或全部分、都将转嫁到农民身上。大地主把它的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农民，而中小地主又把它的一部分负担转嫁给它的佃农。……虽则‘四川大地主之出粮者不到半数’……(见上海‘和平日报’六月十一日社论)，而四川所交粮赋的总额仍可足额，有时且可超出。同时，所有大小地主们都以政府增加田赋为理由，竭力提高田租。原来收钱的改收实物，正租租额加增之外，还加增押租和附租的租额。从一九四一年实行田赋征实后，后方各省就到处闹着加租撤佃的纠纷。一般地主们所被增加了的田赋负担，就这样地一部分或全部分转嫁到佃农身上。”^②

① 刘明夫：“国民党征粮政策下的人民负担与粮食消耗”。

② 王寅生：“举国粮荒中的田赋征实征借”，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文汇报”。

“慘勝”之后，蔣介石說了：一九四五年在“收復區”，一九四六年在“大後方”，要免田賦一年，這個大封建奴隸主的好大恩惠！可是：這個大封建奴隸主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就是在“免賦”的命令之後，再加上一個命令：“再加紧掠奪吧！”一九四五年在“收復區”（即四大家族新征服區），“名義上雖叨了豁免一年田賦的光，而事實上各縣的強迫獻金獻糧，很有許多要超過了這一年豁免的田賦，並且是真不二價的攤派，捉人封產，鬧得雞飛狗上屋”^①。至于一九四六年的“大後方”呢？“田賦依舊征實征借，且賦額極高，規定田賦每元要征稻谷四市斗，又征借四市斗，再帶征公糧三成，合計每元征稻谷九斗二升，合米五斗有餘，較戰前賦額增加四倍以上，且超過戰時負擔”^②。一九四六年的“收復區”本來是不“免”的，“仁慈”當然也不說了：“江浙田賦最重要的區域，戰前每畝連各種附稅在內，大都約在一元四角左右，合之當時米價，也不過征到每畝一斗五升至二斗而極，現在連帶征公糧積谷等種種在內，每畝須要征到六斗以上，這種變相的加賦，其所加的數量，不但超過了田租的收入（海寧嘉興一帶許多田畝每畝所收租米只有三四斗），並且要超過了農夫從事一年的牛馬生活所得到的實益（每畝收穫量平均不過一担五斗，除去征實的谷，所余的，不夠肥料人工的開支）。”^③

四大家族的所謂“征購”，在絕大部分場合，和沒收沒有兩樣。有个歌這末寫道：“市谷一擔錢值萬，如何官價只二千？”^④，其實這還是“好”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江西“有些

① 查人偉：“田賦征實問題”，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文匯報”。

② 秦柳方：“當前農村救濟問題”，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文匯報”。

③ 同注①。

④ 痛心：“田賦征實病民歌”，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文匯報”。

县份，自县长以下直到乡保长都克扣征购谷銀，农民不得分文，因此名为法币一元征实二斗，实际上，相当于法币一元，农民要交谷十二斗之多”^①。“慘胜”之后，在江苏昆山，“今年市价每担逾五万元，粮价名义上提高至每担一万三千元，但实际上仍照每担五千元发給，故被征之农民所收还之代价，不过十分之一，无異全部捐輸。至征购方法除起初一部分向米商采购約数千担外，其余則按田摊派，每亩六升，不分自耕田和租田，一律由农民繳納。……”^②至于所謂“征借”，就更干脆是沒收。

四大家族的“地钻子”——老爷們的大斗收进，小斗繳出，以及各种殘酷的留难和挑剔，农民送糧的运输費与伙食費，……如果把这一切都算上，那末，农民負担的数字当然就更難于計量了。

当然，四大家族这种收租和沒收的方法，不但极尽殘毒地掠夺了农民，而且也和某些地主——特別是中小地主——有矛盾，因为四大家族在某种場合，可能而且实际上夺取了他們原来的地租部分，甚至对于那种和国民党政治权力沒有关系的无权无勢的地主，就夺取了其地租的全部。浙江“富阳有地主某，所收到租谷共八百余担，全数完了賦谷，尙少一百担，卖去房屋来补足的”^③。江苏昆山“农民已刮得精疲力竭，无可再刮，于是又轉移其目标于地主，責令地主貼补軍糧費每亩法币三百元，以便另行設法采购，并須由地主自行登記，如隱匿不登記者，一經查出，每亩以一千

① 李雪怀：“江西农村經濟現狀”，“中国农村”八卷八期。

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新聞報”。

③ 查人偉：“田賦征实問題”。

元計算罰繳”^①。四大家族是封建土地制度的极端野蛮的保护人，而他們在經濟上的独占性，并要求独占封建制度的一切利益，因此，他們对于地方性的中小地主以至某些地方性的大地主，都带有排它性，吞并性，而且同样地残酷无情。

四大家族对于这种粮食的收租和沒收，很大部分变成黑市的投机商品，以榨取更多更多的商业利潤，而使四大家族的財富因而越滾越大；一部分变成蔣家軍的軍糧；一部由四大家族的层层爪牙所吞飽。用之于蔣家軍，那是为着鎮压人民，进行反革命內战以保护四大家族独占的财产；用之于四大家族的爪牙，那是为着使爪牙們也可以捞些油水，以便于叫他們为四大家族尽“忠”尽“孝”。

但是，上述种种也还不过是四大家族收租的一部分。蔣管区的各种“今古奇捐”和“民国万稅”，不但比抗日戰爭之前沒有少些，而且是越来越多，越发出奇了。例如，四川农村中每年除了征实征借的負担以外，“还得負担一百几十种摊派。……重庆附近的几个县份的农村所負担的各种非正式捐稅，有乡公所办公費，乡公所官兵伙食費，保办公費，警备班津貼，駐軍蔬菜費，駐軍馬干費，駐軍營房材料費，修枪械費，特种保卫費，优待壯丁抗屬費，壯丁安家費，保学校設备費，消防队伙食費，积谷征募費，航空費，飞机費，救国捐，建国捐，各种献金等二十三項。这是比較固定的，还有乡村保甲长的婚姻喪祭，过年过节，总得临时摊派”^②。这种奇捐和万稅，不管若干落入四大家族，若干落入四大家族的各級家奴，已經时常使农民繳出所有而还不足。至于强迫勞役，征丁，派夫，无偿征用土地，也更非抗日戰爭之前所可

①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新聞報”，“讀者之声”。

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重庆“大公報”。

比拟了。

二 全国性的、最大的高利債主

四大家族既是全国性的最大的地主，同时又是全国性的最大的高利貸債主。

中国农民由于受了无穷尽的压榨，就不得不乞求高利貸，以求得苟延自己的生命。抗日战争之前，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調查，全国借錢的农家，占农家总数 56%，借粮食的农家平均占 48%。又据“四川中国銀行會調查一千五百五十六家农户，发现其負債百分率为 61%，而其中三十亩以下者，均在 61% 以上。此外，还有一点应当特別指出的，就是这負債的趋势，是在日益发展的过程中”^①。在蔣家朝廷統治之下，农民的負債是更厉害地发展了。四大家族眼看这样一个发财的“大好来源”，于是急起直追，力爭这个高利債主的地位。

四大家族举办的所謂“农民”金融机关，第一个是江苏农民銀行。这是四大家族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反共反农民之后，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間成立的。“其基金与北洋軍閥孙傳芳有关。一九二六年，孙傳芳为了抗御当时的北伐軍（按：即在蒋介石背叛三大政策之前、国共合作的革命北伐軍），需款甚急，于是下令江苏全省各县征收田亩附捐，每亩二角，可是軍事的迅速失败，使他不及用去而且也不及带去这笔民脂民膏，而这笔款子就做了后来江苏农民銀行的基金。前述田亩附捐在各县有征收完全的，有未开征的，……江苏仍令各县征收，俾可遍設农民分行支行”^②。这是接受

① “中国土地問題和商业高利貸”二百四十四頁。

② 路耕漠：“信用合作事業与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农村”一卷二期。

了和繼承了北洋軍閥封建強制掠奪的事業，而這“農民”銀行的基金便是農民的膏血，其職務便是反對農民的解放。這銀行，這膏血，是由陳家CC系所壟斷，該行總經理即是陳家CC系的干部趙棣華。

在第三章裏面，我們已說到中國農民銀行的來歷，這更是在反對農民的血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而以陳家為基本力量的銀行。“農民銀行掌握了‘農貸’和一般農業金融，輔導‘合作’事業及土地金融的獨占權利，並和中、中、交三行分享國庫、黃金事業等權利。在內戰時期，CC分子曾在贛浙川三省成立所謂‘合作金庫’。從一九四一年起，CC派更進一步地籌設所謂‘中央合作金庫’，但由於大官僚資本間各派的鬥爭，特別是由於前年（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在豫湘桂黔之役的潰敗，曾一時的停頓，最近他們又積極的準備開張，資本半數由‘國庫’撥支，農行出資三分之一。‘中央合作金庫’的董事長亦為陳果夫，而CC重要幹部谷正綱、趙棣華、張厲生、陳布雷咸任董監。（按：事實上其他三大家族都插了一腳。）從此全國近五百的省縣合庫，將成為CC中央合作金庫的子公司，更加擴大了CC的金融體系”^①。

本來農貸是四大銀行都進行的。據“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度農貸報告”，中國銀行的農貸結余總額占四行局貸款總額的39.1%，交通銀行占7.8%，中央信託局占5.8%，農民銀行占47.3%^②。在一九四二年後，農貸就由蔣家朝廷規定為農民銀行獨占的專業。在蔣家朝廷統治之下，四大家族已逐步代替舊時農村高利貸的地位，形成為獨占的新式高利債主。例如：“據一九四一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各

① 徐方略：“CC派大官僚資本”。

② “農業推廣通訊”四卷七期五十七頁。

省調查，各種放款機關分類：私人放款占27%，商店占11%，典當占9%，錢庄占2%，合計占49%。”^①就是說，以四大家族為主體的銀行貸款已占了51%。這種發展的過程是極端迅速的。

四大家族農貸的高利貸性，其一是由以下期限的情況所決定的。這種貸款的期限大都只是一年。“這一年一度的貸款，名曰‘救濟農村’，但結果往往使農民反而受到加重的剝削！為什麼？因為在春荒期間，谷物必然比較昂貴。農民縱能借得少數款項，而他利用此款所能購換的物品（購買力），因之也比較不多。到了秋收以後，還款期近，而農民所能出售的農產品，却正值跌價之期。明白的說，一個忠實的農民，春天向金庫借款五十元，假定只能購谷一石；到了秋冬，必須售谷一石半或至二石，方能將金庫的貸款如期還清”^②。所以，這是很殘酷的高利貸之一種。

四大家族農貸的高利貸性，其二是由借款者的性質所規定的。“這種農村放款，受到好处的決不是農村中最貧苦最需要資金的農民，而大半是有相當田產或較富有的農家，甚至有一部分資金變成農村高利貸者的本錢”^③。四大家族各金融機關或者是首先放款給所謂“農村合作社”，但是，在四大家族統治下，“合作社”不過是“為地主豪紳所利用操縱，徒增高利貸猖獗的氣焰”的機構^④。或者是“首先放給聯保主任，聯保主任再放給保甲長……，轉貸給貧民，以索取更高的利息”^⑤。那些和四大家族統治勢力有關的農村放

① “農業推廣通訊”四卷七期五十八頁。

② “白農月刊”二卷八期十二頁。

③ 千家駒：“合作金庫的評價”，“中國農村”五卷十期。

④ “農業推廣通訊”二卷十期二十八頁。

⑤ “南京平報”，這裡轉錄自陳洪述在“國民公論”一卷八期上的文章。

高利貸的人物，因为得到四大家族农貸的恩惠，就增加了压榨农民的金融力量。

根据上述种种，可見四大家族的农貸，一方面是要从金融方面集中吸吮农民的血液，另方面又是要从金融方面扶植自己在农村統治的社会支柱。四大家族这种企图是很大的，最近蔣介石曾經召集了陈果夫谷正綱这批陈家CC头領，对于“合作”金庫，“指示应切实加强，俾成为实行主义之基本經濟組織”^①。封建的和殖民地的农村，是四大封建头办家族集中财富和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基础，这是蔣介石所知道的。他要他們的“合作金庫”加强，以成为实行法西斯主义之基本經濟組織，就是說，要經過它以重新加强四大家族在农村中的統制。陈家CC法西斯集团，成为蔣家朝廷反动政治的中心，由此也更是很明白的了。

經過四大家族所謂“資金归农”的結果，“使得債務人的債累，一天大似一天，債台一天高似一天”^②。农民負債的更多，农村更穷，因为資金归到四大家族的“金庫”里面去了。

农貸同时产生了各种农业作物被集中掠夺的結果。原来的农貸是“大多集中在少数交通便利之区，或商业性农作物发达的区域”^③，“一般狡猾的人，往往借扩大农貸的机会囤藏粮物，待价而沽”^④。这真是一举两得：四大家族及其爪牙們利用农貸，一方面获得了高利息；另方面則在出借的时候高价卖出农产品，在收回本息的时候又以賤价买进农产品。

①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华化日报”。

② 乔启明：“我国农业金融之展望”，“农业推广通訊”四卷六期六頁。

③ 千家駒：“合作金庫的評述”，“中国农村”五卷十期。

④ “中农月刊”二卷八期十四頁。

所謂“农业仓库”的秘密，接着也就在这里暴露出来了。这只是便利了四大家族及其爪牙——固戶、地主、商販的商业投机的仓库：“一面以低价收买的农产品，押与仓库，待善价而后沽之，更借低利資金的周轉，拿抵押所得的款项，做为重复低价收买农产品的資金。”①

三 几种掠夺农民的农业公司

四大家族在农村中，又是封建的和买办的最大的商业资本家，这点我們在第四章論四大家族的商业独占的时候，已說到了。四大家族还有各种壟斷农业的商业公司，例如，以孔家和陈家为主的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就規模很大：一方面，壟斷國內粮食的买卖，或进行“加工”（該公司設置各種加工的工厂），一方面又壟斷洋米的买卖（一直买到巴西和南美各国），使中国变成外国粮食的市場。又例如：以陈家为主的棉花运銷公司，規模也很大。

除了这类壟斷农产品的商业公司之外，四大家族还有各种有关农业的公司，各种大农場。

华西垦殖公司是陈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名的重要产业之一。这是封建的大地产公司。一个作者写道：“一般垦区，往往重視公司本身的发展，而忽視垦殖，甚至以垦殖为名，实则从事收购土地，获得地权，坐待土地漲价，或者由佃戶分別承垦，而收取高额地租。例如上述华西垦殖公司，在政府和銀行的优惠条件协助之下，即曾在滇越铁路中点，半圈半购的占有耕地十万余市，加以經營，待地价上涨，且仍以类似租佃的关系由垦民領种。現在各省所有水利工程完

① “农业推广通訊”四卷九期三百十二頁。

成区域，往往即有垦殖公司的組織，其用意亦复相同。”^① 滿口孔子、滿口国粹的陈果夫、陈立夫的公司对于农民就是实行了这样的霸道！由宋子文任董事长的甘肃水利林木公司，其“事业”所到的地方，也即“轉為投机牟利之場，或高价收买，或特勢占有，土地集中在在皆是……”^②。

据一九四四年的报道：以陈家为主体的中国农民銀行“直接举办者，有农业企业公司，肥料公司，农具公司，农业机械公司，农业保險公司，中国林木公司等；和各省政府合办者，有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新疆林垦公司，广西水利垦殖公司，浙江林垦公司，福建林垦公司等”^③。至于不以农业为名的，例如，陈家系統下的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設公司，也在农林范围进行活动。但这类公司也大都是带有壟断农业品的商业投机的性质。

蒋介石的儿子蔣經國經營的所謂“新贛南国民经济建設公司”，其业务之一，也是从事对于农业經濟的壟斷活動。

“慘胜”以后，原来日寇在华北和东北掠夺中国人民的一切农业机构，以及掠夺来自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都被四大家族及其爪牙所劫收，变成了四大家族及其爪牙的私有物。日寇在台灣兼并的土地及其所謂“官有地”（据調查：日寇强圈的“官有地”占人民私有地的二倍），也都被劫收为蔣家朝廷的“官有”。

上述四大家族一切的农业公司以及其所劫收的財产，无疑地是四大家族用以加强他們在农村中的封建的、买办

① 秦柳方：“抗战中的垦殖事業”，“中国农村”八卷九期。

② 魏宝珪：“溝渠灌溉區之扶植自耕农”，“人与地”三卷七、八期。

③ “財政評論”十一卷三期。

的、軍事的統治和搜括。孔家祥熙等最近又在筹备“中国农业机械特种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企图壟断农业的生产工具的生产，从而企图进一步地操纵农民的生活命运。

四 农业經濟的衰落和殖民地化

在四大家族及其爪牙的荒唐劫掠之下，中国农业生产力在可怕地衰落下去。农村中的劳动力大量减少，生产工具和耕畜大量减少，灾荒变成常态，饥民到处都是，而乞丐和游民也大量增加了。一九一八年全国耕地面积的統計为十三亿一千四百四十七万二千一百九十亩，到一九二八年已是十二亿四千八百七十八万一千亩了。一九二二年的全国荒地面积为八亿九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亩，到一九三〇年已是十一亿七千七百三十四万零二百六十一亩了^①。抗战和“慘胜”以来，更有許多省份陷于千里无人烟。据本年八月間报載：“河南全省土地为一亿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一千亩（按另一官方統計为九千三百四十九万九千亩），現在荒地达三千七百零八万五千亩，即占耕地总数30%（按另一統計約占40%）；湖南全省耕地为三千五百零八万六千二百五十亩（另一官方統計为五千零二十万六千亩），現已荒蕪 40%，即一千四百五十万亩（据另一統計荒地应为二千零八万一千六百亩）；广东全省耕地为四千二百四十五万亩，現亦荒蕪 40%，即一千八百九十八万零八百亩。仅以上三省抛荒，即达农地五千八百万亩。”^② 这是四大家族肆无忌憚的劫掠的結果，反映了蒋介石統治区农村的悲惨图景。美貨的大倾銷，其工业品既促进了中国民族工

① “中国耕地面积漸減的傾向”，“东方杂志”三十卷十八号。

②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天津“益世報”。

业的崩溃、其农业品也正在加速蒋介石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崩溃(目前特别明显的，例如美棉的压倒华棉)。

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所谓“中美技术合作”，只是使中国农民的奴隶命运再加上一条新的锁链，而且是更加强了一条殖民地奴隶的锁链。一个报纸论到“长江水电计划”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像现在农村中那样的生产关系不能改善，农村中反人民的势力不能铲除，一句话说，如不能实行真正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则长江水闸就是能灌溉一千万英亩，除便宜了少数的地主以外，对于广大的农民又有多少好处？而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则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未等水闸完成，恐怕可能受灌溉的土地就要被豪强者兼并一空。”^① 这些都说得很好。应该补充的，就是说，中国农民被四大家族的出卖，那时就会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隶。

中国农民需要农业的技术改革，但如果不能从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不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一切的梦想都只能是落空的东西，连发展工业的梦想都在内。这就启发了中国农民奋斗的真正道路，也即是启发了中国全民族奋斗的真正道路。

①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秦风工商日报”社论。

七 新聞和出版及其他獨占

蔣家朝廷在政治上所設施的統制文化，奴化教育，愚民政策，思想有罪，……等等恐怖制度，在這裡不准备加以很多的叙述。这里准备說的，主要的，是四大家族在物质上对于新聞事業和出版事業的獨占。

大家都知道：在蔣介石統治區，中央社乃是四大家族控制全國新聞言論的最大的“宣傳”機關。事實上，四大家族這個中央社所報道的“新聞”，絕大部分都不是新聞，乃是根據四大家族命令而閉門造出的一堆謊話；利用新聞的物质獨占傳播出去，并由政治的力量強制報紙登出來。世界原來曾經有幾個最大的和最無恥的造謠公司，德國納粹戈培爾的“海通社”，日本法西斯的“同盟社”，和中國四大家族的“中央社”可稱鼎足而三，而根據我們親身的經驗來看，中央社造謠的卑鄙下流，把是認為非，把非認為是，不惜對於一切真實的東西加以極端狠心的，完全出乎人性的顛倒和毀謗，只有中國俗諺所謂“狼心狗肺”一語，可以形容之。這是代表人類中一小角落的最黑暗和最凶惡的內心深處。凡是受命令而代為發布這類新聞的人，如果那人還存在着若干良知，那人一輩子就將受最痛苦的良心的譴責，因為他對事實犯了罪，對人民犯了罪。

四大家族建立了龐大的報紙獨占網。根據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國民黨中宣部新聞處長的广播：全國民黨統治區報紙總數約九百至一千家，其中屬於國民党中央、省、縣黨

部所办者約四百家，軍队政治部报纸二百七十家。四大家族及其系統(在这方面，主要是陈家CC系)所占的报纸竟达三分之二以上。不仅如此。在那些所謂“私人报纸”当中，除了一些真正民营的企业之外，亦有不少在实际上为四大家族及其爪牙所控制或收买，而作为四大家族的傳声筒。四大家族及其爪牙对于一切異己的报纸，时常找寻机会和阴谋，或者封闭，或者强制吞并和改組。

在日寇投降之后，蔣家軍所到之处，敌伪的新聞机关和报纸，也都被四大家族及其爪牙所劫收，在他們彼此之間，同样地进行了一番爭夺战，而全国規模最大、历史較久的上海“申报”和“新聞报”，已成为陈家CC系的財物。

据報載：美国有一个教授說：“世界上有官僚新聞之出現，此种新聞之特色，以借政府勢力壟斷新聞及广告，利用官僚財力压倒民間報紙，欲造成新聞托拉斯，據調查報告，此类新聞報紙以中國為最著。”^①這說法却是真的，而这也同样地是四大家族的杰作之一。

再次，我們說到出版。

四大家族及其系統(在这方面，也以陈家CC系为主)早就拥有或控制很多的出版机关，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大东书局，拔提书店，青年书店，等等。中国原来最大的书局之一——中华书局，在抗日戰爭时期，事实上也归入孔家和陈家的掌握。据一九四四年四月間報載：当时有一个出版的大托拉斯計劃：四大家族的“中央出版事業管理委員會，将改組为中国出版公司，預定資本为一万元，主要业务包括：出版、广播、电影、行銷等項。聞独

①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南京“大剛報”。

立出版社，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中国文化驿站，中央广播电台等文化机构，均将纳入公司之内，俾加强组织，推展业务”^①。又据一九四五年八月闻报载：在重庆印刷业中，“官营”厂家已约占四分之三^②。

“惨胜”之后，四大家族的各种出版机关分别劫收了各种印刷所。四大家族以“经济部部长”的钓饵从商务印书馆钓出了王云五，使他充当了蒋家朝廷的一个配角，而却很轻易地把这个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国印书馆接受了。

除了前述新闻和出版的独占之外，在其他文化事业方面，四大家族又在经营独占的电影公司和独占的广播公司。前者例如在蒋家“国防部”辖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陈果夫筹组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孔祥熙筹组的“中国电影企业公司”，后者例如陈果夫所发起组织的“中国广播公司”。

四大家族统制“文化”和独占文化的物质机关，这是说，文化在蒋介石统治区在遭受着扫蕩的悲运。这四大家族是极端野蛮的家族，他们在绞杀自由及文化的血腥基础上发展起来，继续以自由及文化为大敌。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愚蠢，对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毫无所知，可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代表。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这本东西极端鄙薄，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却受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欢迎，这就证明了中国人民在觉醒的过程中已获得了高度的文化意识。中国人民的前进却是不可阻止的。纵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及其爪牙在人民中竭力宣传当奴隶之“可贵”，并独占各种文化的物质机关，强迫人们读他们钦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国定

①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扫蕩报”。

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华西晚报”。

教科书”，要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个人的臉上都貼上一張法西斯国民党的党徽，但是，十九年的历史告訴我們：他們这种企图必然繼續破产，必然只是象征着四大家族統治的行将迅速的沒落。中国人民的觉醒將繼續冲破四大家族的文化統制和文化的物质机关的独占，而高举着解放与文化的旗帜，繼續展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新篇。

八 四大家族的財富

“全国財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①，“財富偏在”，“我們这国家，一点儿积蓄，已集中到少数几个人的身上去。一些幸运儿，已便便大腹，肥得不成样子了”^②。这已是全国公认，即使偏袒四大家族統治的人也不能加以否认。前面一切的分析說得很明白，全国財富是集中在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手里，“財富偏在”在四大家族。

当然，四大家族的龐大財富共有多少，是很不容易知道的。四大家族对于自己的財富，从来是諱言的。特別是四大家族的主要財主蒋介石对于自己的财产，更是保持极端秘密。他們有共同的大家庫（或叫做“公家庫”），而各个家族又有自己独立的小家庫，并且互相爭夺把大家庫变成自己的小家庫；即在各家族的小家庫中，也还有更分立的小家庫，例如宋家的宋子文和宋子良，蔣家的蒋介石和宋美齡。他們掩护自己财产的方法是很多的，比如，应用各种假名或由自己的亲戚朋友或亲信的部屬出名。他們的財富不但在中国有，而且散在世界各国，特別是現金大部轉化为外国貨币，存在外国的銀行里面。这种存款的数字，人們所傳的数字不一样。美國華盛頓州民主黨議員沙瓦治曾指出：在战争时期中国官場要人在美国的存款达到十万万到二十万万美元^③。实际的数字，恐怕还要大。当抗日战争开始不久，

① 張綱伯文，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文汇报”。

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天津“大公報”社評。

③ 据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塔斯社电。

倫敦即有此項消息：“朗布拉號于昨日到达朴資茅斯，載有中国战区富人裝送到的銀元及貴重物品甚多，計值三百万鎊之多，这些东西运到英國來，是为了保证安全。又最近从香港出运的白銀，約值三千万英鎊之多，其中有三分之二已换成黃金。”^①当然，在英國，历来蔣家朝廷要人的存款一定也是相当龐大的數字。不仅在美国和英國，“而且在南美巴西、瑞士，都有大量的存款”^②。所有这些在外国的存款，无可疑的，主要都是蔣、孔、宋的。除了这种存款外，蔣、孔、宋还在外国建置有各种产业，例如一个報紙記載：“几位发了財的中國大亨，在南美沿亞馬森河两岸，购买大块地皮，其長約等于重庆到巴東，在这块地皮上面，有橡樹園，有畜牧場，有制革厂。”^③在美国，有一个叫做“中國飛機廠”，和美國軍事机关合作，乃是以宋美齡为主的产业。

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諸方面所独占的財产，以及他們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統計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关于中国每年国民收入多少，有各种不同的估計，有的认为約为一百万美元，有的认为約为八十六万万美元，有的认为約为六十三万万美元，而以最后这个數字較为可靠。按照第一个数字，那末，根据四大家族已有十九年的統治历史看來，其每年資產的积累，就占每年国民收入的 10.05%；按照第二个数字，那末，就占每年国民收入的 12%；按照第三个数字，那末，就占每年国民收入的 16%。事实上，四大家族以強力吞并了人民許多財产，又劫收了本来是中国人民血汗的

①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倫敦電。

②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參政會旁聽記。

③ 鈕本立：“談当前的經濟政策”，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商务日报”。

結晶、而應該為人民所有的日寇在中國的財產，因此，他們獨占的財產所包括的，就不限于這十九年中的國民收入。其次，四大家族占有所借的內外債的絕大部分利益，而這種內外債又要用此後長期年代的國民收入去償還。所以，四大家族獨占的財產，不但剝奪了我們中國人民這十九年中的收入，而且還剝奪了我們前一代，並剝奪到我們的後一代。在我們這生產力落後的國家，“農業生產為構成國民所得之最主要成分”^①。所以，四大家族這種龐大的財產積累，最主要的，乃是掠奪自中國農民，其次，當然是掠奪自中國工人。就是說，四大家族的財富完全是中国農民和工人的血汗所凝成的。

根據蔣家朝廷在人民中的各種直接間接的賦稅及其他形式的強制的掠奪，時常甚至達到這樣的規模，即每年國民收入至少有50—60%，都被蔣家朝廷所掠奪，而這裡所掠奪的，不僅有農民和工人的剩餘勞動，並且包括有農民和工人各種不同分量的必要勞動（即農民和工人為維持自己生活所化費的勞動）。但是，四大家族為保護其統治，他們擁有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軍閥、官僚、特務等吸血機構，有包括正式軍隊、憲兵、警察、地方保安隊等約四五百萬人的武裝暴力，從保甲起的一千數百萬官僚，百數十萬特務；四大家族的財富越大，就越覺得孤立，就越需要更加擴大這種保護他們財富的機構，因此，這種機構就和他們的財富成正比例的發展。例如：據報載，蔣政府的官員比一九三七年已增加了70%^②。又據報載：“中央公務員，在滿清末年不過

① 方顯廷：“中國之國民所得與工業化前途之展望”，“新經濟”十二卷四期。

②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一万人，民国初元，亦不过二万人，抗日战争前中央公务员只八万人，現在公务员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已达二十七万人，公役十三万人，近月以来，添設机关不少，如西北武汉等行營，各綏靖署，物資局等，截至四月十日止，中央公务员将达三十万人，公役十五万人。养官役五十万，足等于养兵二百万。”^①如按照蔣政府中央一級这种增加的数字來看，那末，全蔣管区官員的增加，比一九三七年就不只增加了 70%。这就需要极龐大的財政支出，而在他們这些机构当中，彼此上下其手，也占有很大的数目，因此，也就不可能把所掠奪的国民收入的 50% 或 60% 全部变为四大家族单独的所有物。但是，只就上面他們财产的数字，已够龐大了。这已是中国有史以来任何帝王无可比拟的財富了。

四大家族生活的豪华，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所沒有的。蔣宋美齡的豪华，这早已是全世界聞名的了。現在就单举在抗日战争期間孔家小姐結婚一件小事來說吧：“有人曾就孔小姐飛美舉行婚礼所耗約略計算，得了下面一个統計：（一）孔小姐乘机飛美之消耗（暫以一架飞机計算）可以救济两千以上的河南饥民，使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更可以設備一些維持生活的简单用具；把孔小姐婚礼的一切开支和原先損坏的六大箱嫁衣一并計算起来，那么一万个饥民可以破涕为笑了。（二）把孔小姐結婚所耗和因趕制嫁衣工作的財部妇工队的工夫去制造前綫战士所缺乏的服装，大約中国师两师人的軍衣不发生問題，去制兵站医院伤兵的衣服，那么五十个兵站医院的伤兵每人有一套新衣可着。（三）依这笔款子开办一所設備頗完全的大学，那么在决定了校长之后，只聘教授出通告招生就行了。”^②

总之，像秦始皇、隋煬帝、唐明皇、宋徽宗、慈禧太后这

①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西安“經濟快報”。

② 武絕翔：“談孔二小姐飛美結婚”，一九四四年四月長沙“大公報”。

些中国皇帝那样有名的豪华，比起现代这个封建买办的新式王朝——四大家族的豪华，就望尘莫及了。

四大家族的财富和豪华正是中国人民陷于极端贫穷、饥饿和殖民地的标志。

如果把四大家族掠夺自人民的两百万万美元左右的独占财产变成中国人民的财产，并移用于发展人民的工业和农业，中国人民便将获得无尽的幸福。但是，四大家族能够这么做吗？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坚持法西斯独裁和反人民内战，便是最无情的答复。在经济上，请听一下孔财翁的语言吧：

当两年前人们对孔祥熙攻击的时候，孔说：“我本来有钱，做了官自然也积聚点下来，我自己又省吃省用，这才有多少钱，一般穷小子自己不会弄钱就攻击我，太无聊了。”^①这是一种说法。

但这还是说有多少钱，到后来，就越说越没有了。当人们传说上海滩最华丽的沙逊大厦已作价卖给孔祥熙的时候，孔对记者表示说：“我根本无钱买房子。”^②这又是一种说法。

这是说，不管人民怎样穷死，饿死，或亡国，但是，他们还是第一要钱，第二要钱，第三要钱，因为他们就“根本无钱”呵！

中国人民再不能够让四大家族来任意吸吮自己的膏血了，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消灭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官僚资本独占制度，把四大家族独占的财产变为人民公有的财产，而利用这种财产作为创造人民自己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

① 何指：“孔門四杰”，“新世紀”第二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② 上海“周播”十三期。

九 四大家族的統治是 中国的耻辱和灾难

回溯前面所說的东西，这里把四大家族經濟独占的特点，再重复地概括如下：

第一、近代中国的官僚資本，也即是封建的、同时是买办的資本；它是大地主大买办在經濟上的联結物，而四大家族和中、中、交、农四大銀行在經濟上的独占，则是代表它最高度、最集中的发展，是中国半封建的或封建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制度最后的产物。

第二、四大家族的經濟独占是在中国半封建或封建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农业經濟基礎上，对于农民，小生产者，以至民族工业，进行了空前大規模和空前集中的掠夺。

第三、四大家族的經濟独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軍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他們长期独霸国家的財政权力，任意盜窃国庫，对人民极端好战，毫无顾忌地采用各种极端野蛮、极端反动的掠夺手段，以达到其发财又发财的目的。

第四、四大家族經濟独占的范围极其广泛，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到文化事业的物质机关，但其独占不是发展生产，而是极端破坏和摧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完全腐朽和完全寄生的独占。

第五、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完全是外國獨占資本——帝國主義的附屬物，是外國獨占資本——大洋行在中國的支號。

這一切就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在政治上的總出發點，就是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和反革命內戰的總出發點，就是蔣介石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中國之命運”的總出發點。

這樣，就不難明白了：為什麼四大家族所實行的主義，按照毛澤東的指出，是叫做“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為什麼四大家族的所謂“國家”，按照毛澤東的指出，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

一位美國民主派的議員說得很對：“蔣介石代表為城市匪棍、投機分子、秘密警察、納粹顧問所支持之封建地主，并為美國方面無條件撐腰。”^①

一個外國人在中国辦的雜誌也說得很對：“在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繼續進行的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的漫長過程中，孫逸仙博士的國民黨已變成了官僚資本的衛城。國民黨的若干領導分子都已變成了龐大的‘財政巨子’，控制著全國的經濟命脈。”^②

這樣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集團，當然要把中國變成內戰的國家，變成秘密特務和“警管制”的恐怖的國家，他們既創造了一個法西斯“訓政”，又準備創造一個法西斯“憲政”。

這樣的封建買辦法西斯集團，當然也只能夠充當外國反動派在中國的“奴隸總管”，他們對人民嗜殺成性，專對人

① 德拉西語，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塔斯社紐約電。

② “密勒氏評論報”，譯文引用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文汇报”。

民好战，横暴至极，但在外国帝国主义面前，却只能是最驯服的奴才。

“九一八”后，蒋介石这样說：“國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他要我們那一天死，我們就得那一天死！正如俗傳人的寿命操之于閻王，他那一天那一刻勾簿要我們死，那一天就可以差使一般小鬼来拿去我們的命。”^①“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集团又便匆匆忙忙逃入峨嵋山，大发国难财，而对于日寇的魚肉淪陷区人民，对于人民的流血斗争，袖手旁观，并且望着日寇向解放区扫蕩，实行杀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則引为大乐。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打到鴨綠江邊，蒋介石就忙着声明“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状态”。当中国人民在八年中受尽苦难和牺牲而获得胜利的时候，这批法西斯虎狼就使用其七八年中在峨嵋山养精蓄銳的力量，在美国反动派援助之下，下了山来，以新征服者的派头，搶夺人民胜利的果实，独占大片江山，要做美国反动派的儿皇帝，以巩固和加强他們所霸占的財富。为此，这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就要和人民无情作战，这四大家族的主席蒋介石就支出那一切为袁世凱都不敢出卖的国家主权，以取得美国反动派的援助，截至执笔时候为止，可以数出的大項目，就是：

第一、支出中国的領土权，让美国军队駐在中国，給美国以陸軍基地；

第二、支出中国的領空权，让美国飞机自由“巡邏”全中國，給美国以空軍基地；

第三、支出中国的領海权，让美国海軍自由游弋中国的

^① 蒋介石：“国家兴亡决于剝削”，“剿匪文献”第一輯第三卷，邓文仪主编。

- 領海，自由駐防中国的海港，給美国以海軍基地；
第四、支出中国的政权，坚持把中国的內政問題的最后
决定权交给美国；
第五、支出中国的軍权，以軍队美國化代替“軍队國家
化”，放在美国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
第六、和美国合作訓練特務，让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更便
利控制中国的內政；
第七、放棄保护关税，使民族工业破产；
第八、制定便利外資獨占的“新公司法”，让外国財閥及
其中国走狗自由在中国境內壟斷中国的經濟；
第九、支出中国的內河航行权，让外輪摧毁本国的航
业；
第十、支出中国的漁权，接受麦克阿瑟的决定，让日本
漁船在中国沿海捕魚。

蔣介石的本領，蔣介石的“驕傲”，就是在于他能够以“中国人”和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資格，出卖吾国与吾民，不惜支出全中国的主权去換得向人民作战的武器，去換得美国海陸空軍在中国領土內支持他反人民的內戰和寡頭独裁制度，而其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在于保护四大家族在中国的經濟独占，保护四大家族的私有財富。

四大家族十九年的統治給了中国最大的耻辱和灾难。“好話說尽，坏事做尽”，这是中国人民对于蔣介石的通評。他們在中国历史上的“創造”，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最可怕的恐怖和痛苦。这种以喝人民的血为快乐的最可耻的腐烂人物，无可疑地，将被写在最可耻的历史簿子上面，“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四大家族一心一意要把中国变成奴才化的国家，并以

龐大的財政从事这样的“建設”^①。然而，四大家族的統治，究竟是教訓了人民。十九年了，人民所受的教訓是很够的了。十九年中，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义大旗下，中国人民的力量和觉醒在曲折的道路上进一步地发展起来。中国人民要求終結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統治，要求終結封建奴隶主和外国大洋行买办的政治經濟制度，而由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掌握自己国家和生活的命运。中国人民已有自己广大的解放区，开始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正形成一个最偉大的民族民主統一陣綫。在四大封建买办独占的家族統治下，人民已不能够照旧生活下去，人民只得起而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再沒有路走了，除了获得解放。工人、农民、小資产阶级、知識分子、民族資产阶级，以及一切有正义有血气的男和女，就是說，全民族，都一致集合站在这个陣綫上，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追求民族的独立、政治的和經濟的民主制度，为着完成一个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資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正在勇往前进！在蔣家朝廷各种統治机构下服役的大多数人，不論是文的或武的，

① 关于国民党財政支出有以下材料可供参考：据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民主报”載：教育部高等教育經費，以实行党化教育之學校所占比例最大，国民党中央政校相当于十个大学之經費总额，經常費每年一万多六千万，临时費亦达一万多六千万，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學校經費与临时費均达三万五二千万元，國立大學中經費最高之中央大學亦仅达九千万元云。

据九月十日上海英商杂志“新聞通訊”載称：上海市政府今年度預算中，警察費三倍于教育費。該杂志評論此事道：“沒有任何东西可以比上海市政府的預算，能更好的說明中国目前統治集团的反民主性質。”該杂志并进一步揭露道：“然而，甚至这惊人的对照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在教育費当中，埋伏着一大筆款項是給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学生当中的—种补充警察与盖斯塔波的控制体系。”

如果他們一旦了解他們只是为四个封建买办家族服务而压迫人民、并且也压迫他們自己的时候，他們也就会觉悟过来，站在人民一边，而向独夫反抗。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乃是这种全体人民的自由大斗争的主力军。这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就将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辟道路。

四大家族的統治，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彻底腐烂的統治，这种腐烂的統治，既在人民中极端孤立，其統治的各方面不但注定、而且正在催促自己的灭亡，不管有什么外国反动派的撑腰，然而終归沒有法子可以抗拒中国人民偉大的、青春的、旋乾轉坤的力量的冲击。人民的胜利是一定的，无可避免的。

中国人民在大步地踏上自己解放的路，这路不是别的，这路就是毛澤东“新民主主义論”和“論联合政府”所指出的路！

书　　后

这本小册子的材料，收到一九四六年九月份为止。

帮助我搜集材料的，有陈真、吴俊揚、何均諸同志，陈真同志并为此特別在整整三个月中，夜以继日地工作。写作时候，王学文同志及其他同志提供过有益的意見。謹謝謝他們！

作　　者